

韶關文史資料

第四十九輯

工农红军在韶關 专辑

梁观福 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關市委员会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一九年十月

《韶关文史资料》编委会

顾 问：王青西 王德雄 陶学权

主 编：沈妙光

副主编：彭长伟 刘炎生 黎阳升 庞国华

编 委：陈伟清 刘 杨 佟 虎 荣笑虹 王心钢

钟雪玲 段志坚 罗 燕 宋良锋 李步德

邓 华 邓海清 潘小坤 郑鸿沛 温荣华

邱小华 郑则泉 林钟钦 钟振辉 张 海

沈利明 胡剑咏 崔宗林 罗源兴 高 忠

潘允标 廖功文

编 辑：陈 军

目 录

概述	1
第一章 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韶关	1
一、起义军余部“穿山西进”到韶关	3
（一）起义军潮汕失利余部西进赣南	3
（二）起义军余部与范部合作移防韶关	6
二、联系党组织开展农运与农暴	10
（一）联合农军惩处土豪劣绅	10
（二）开展曲江农运支援西水农暴	14
三、开展练兵运动探索游击战术	24
四、脱离范部南下受阻向西挺进	32
（一）朱范合作暴露，朱德率部转移	32
（二）攻打仁化县城向西进军	37
五、策划部署湘南暴动，赢得坪石大捷	39
（一）扬家寨会议策划湘南宜章暴动	39
（二）攻打胡凤璋匪部	45
（三）痛歼敌军许克祥部，赢得坪石大捷	49
（四）部署湘南总起义挥师北上	56
第二章 红四军、湘赣红四团游击韶关	63
一、支持仁化游击斗争	65
二、粉碎“会剿”，红四军游击南雄	68
（一）红四军游击赣南转战南雄	68

(二) 开展革命宣传, 支持地方武装斗争·····	71
(三) 县委提供情报红军化险为夷·····	73
三、“发展苏区”, 红四军进攻南雄县城·····	76
(一) 红四军进攻南雄城的历史背景·····	76
(二) 攻占南雄城进行的几项重要活动·····	80
四、湘赣红四团游击连县、乐昌·····	85
第三章 红五军、红三军团转战仁化、南雄·····	89
一、“向外发展”, 红五军游击仁化·····	91
(一) 红五军游击仁化的背景·····	91
(二) 筹措军需开展革命宣传·····	94
(三) 铁的纪律温暖百姓心·····	96
二、红五军转战南雄·····	98
(一) 直奔县城开展革命宣传·····	98
(二) 筹措军需镇压反动官吏和豪绅·····	100
三、红三军团扩大苏区转战仁化·····	101
(一) 转战仁化的背景与征程·····	101
(二) 转战仁化的主要活动·····	104
第四章 红七军主力北上远征转战韶关·····	109
一、从广西右江向广东北江进军·····	111
(一) 向外发展挺进广东北江的艰难历程·····	111
(二) 向广东北江进军小部队入连山·····	116
二、进军连县筹集给养继续北上·····	119
(一) 进军连县的时间和行动路线·····	119
(二) 开展革命宣传进行给养筹集·····	123

三、	拟建根据地，激战乳源梅花圩·····	129
（一）	利用乳源梅花有利条件拟建根据地·····	129
（二）	血战乳源县梅花圩·····	133
四、	强渡武江分兵仁化、乐昌向苏区挺进·····	140
（一）	成功渡江部队经仁化向苏区进军·····	140
（二）	渡江受阻部队北撤经湘南入苏区·····	145
第五章	红一方面军激战南雄、水口·····	149
一、	南雄、水口战役的历史背景·····	151
二、	主战场前夕的几次战斗·····	156
（一）	大余池江战斗·····	156
（二）	南雄梅关战斗·····	157
（三）	大余战斗·····	159
（四）	红军佯攻南雄城·····	161
三、	水口战场两军对垒勇者胜·····	163
四、	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大力支持·····	173
五、	南雄、水口战役的教训与意义·····	176
（一）	“著名的恶仗”及其教训·····	176
（二）	南雄、水口战役的历史意义·····	182
第六章	中央红军长征穿越韶关·····	187
一、	突围长征过南雄·····	189
（一）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南雄·····	189
（二）	激战乌迳向粤赣湘边挺进·····	194
二、	进攻仁化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202
（一）	进攻仁化城口的部署·····	202

(二) 奇袭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204
(三) 城口休整与铜鼓岭战斗·····	210
(四) 仁化红山的红军情结·····	214
三、翻越乐昌大山向西挺进·····	217
(一) 翻越乐昌西进的历程·····	217
(二) 军民鱼水情·····	227
四、部分红军队伍迂回奋战连县·····	231
(一) 红六军团西征某部过连县·····	231
(三) 红三十四师余部迂回连县·····	235
第七章 红军游击队赣粤湘边三年游击战争·····	237
一、红军游击队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239
(一) 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建立与油山会师·····	239
(二)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	241
二、红军游击队赣粤湘边三年游击战争·····	254
(一) 中共赣粤湘特委的建立和红军游击队的成立·····	254
(二) 赣粤湘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	256
三、红军游击队湘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258
(一) 中共湘粤边工委和游击队的重建·····	258
(二) 湘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	261
四、红军游击队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266
(一) 粤赣湘边国共合作抗日新局面的形成·····	267
(二) 红军游击队改编整训开赴抗日前线·····	270
附录：大事记·····	274
主要参考书目·····	299
后记·····	306

概 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处粤赣湘要冲的韶关（亦称粤北），是工农红军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向外扩大发展的重要通道和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反抗反动武装的重要战场。期间，南昌起义军余部、红四军、红七军、红五军、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曾先后转战于此，红军游击队也曾在此坚持了三年之久艰苦卓绝的粤赣湘边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军余部和多支红军劲旅转战韶关，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和建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历程，在组建红四军、发展壮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地方革命斗争的开展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南昌起义军余部和红军转战韶关，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留下了许多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和富贵的精神财富。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随后，起义军按照前委决定南征广东，建立根据地，试图再次北伐。10月初，激战于潮汕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失利，朱德率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激战大埔三河坝

后东撤饶平茂芝，得知起义军主力失败，决定起义军余部穿山西进向赣南挺进。

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起义军余部在赣南安远、大余、崇义进行思想整顿、队伍整编和整训，使部队基本稳定下来。起义军余部在崇义整训时，朱德获悉同学范石生部驻扎湘粤边，为了解决部队物资和装备供应的困难，以便使部队得到补充、休整和发展，经党组织的同意，以原建制不变、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为原则，决定部队前往湘南汝城与范石生谈判建立合作关系。11月21日，朱德在汝城与范石生达成合作协议，起义军余部改用范石生部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该团团长。随即，范石生给该团发给一个月薪饷和弹药、被服。朱范的合作，为起义军余部以后的发展和革命活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2月10日，朱德、陈毅率起义军余部800余人，打着一四〇团的番号移防韶关到达仁化县董塘圩，联合农军开展打土豪活动。期间，朱德接到参加广州起义的指示率部南下，部队来到曲江韶州火车站时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便在曲江城郊暂驻下来。几天后，起义军余部北撤到曲江犁铺头圩（今属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驻扎。期间，朱德通过中共北江特委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并按照党的指示开展北江农民暴动，曾两次派出部队配合支持曲江西水农民暴动，从而推进了北江农暴中心之一的曲江农暴的开展。与此同时，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探索中国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朱德组织部队开展练兵运动，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

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后骚扰敌”的28字游击新战术。

1928年1月3日，朱德与范石生合作之事被暴露，起义军余部按照党的指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南下英德、清远开展农民暴动。次日，起义军余部到达仁化和曲江县交界的周田受阻，折回返仁化攻打县城，随即将仁化农军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独立团，并把起义军中8名军人留在该团作为军事骨干，为正在进行的仁化暴动后来成为广东“农民暴动中最伟大的战斗”，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月7日，起义军余部离开仁化经乐昌到达乳源县梅花圩大坪杨家寨（今属乐昌市）。在此，朱德召集起义军余部负责人与乐昌、宜章县党组织和农军负责同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举行湘南宜章暴动。12日，起义军余部依然挂着一四〇团的旗号，在胡少海的引领下进驻宜章城，智取宜章取得成功，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即，起义军余部改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宜章暴动后，盘踞乐昌坪石的胡凤璋匪部对将要进行的湘南总起义造成威胁，朱德两次率工农革命军在乐昌农军配合下，攻打坪石将其击溃。1月下旬，国民党独立三师师长许克祥率6个团，企图消灭工农革命军，从韶关、乐昌到达坪石，以坪石为据点向宜章进攻。至2月1日，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主力一个团，在乐昌、宜章农军的配合支持下，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将许克祥部击败，缴获大批的武器弹药和被服，史称“坪石大捷”。随后，朱德和陈毅

在坪石和皈塘相继召开特别会议和联席会议，研究部署湘南总起义的计划方案，并将乐昌农军组建为“工农革命军乐昌独立营”。这两次会议是决策湘南总起义的重要会议，为湘南总起义指明了方向。会后，朱德等率部向湘南挺进，组织湘南总起义，几个月后转战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转战韶关所进行的活动，为后来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

1929年至1932年，多支红军劲旅先后转战和游击于韶关的南雄、仁化、连山、连县、乳源、乐昌县等。为粉碎敌人的“会剿”和红军向外发展以及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1月中下旬，为了粉碎国民党“会剿”，解井冈山之围，毛泽东、朱德根据“柏露会议”的精神，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地区向赣南游击，在大余与敌军激战受阻后，分两路向广东南雄东北部地区转移。1月25日，朱德率红四军一部挺进南雄油山坪田大石埂，与敌军展开激战，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击溃敌军一个团，随后在夹河口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一部会合向乌迳进军。会合后的红四军到达乌迳黄术岭，与中共南雄县委和游击同志会合，召开群众大会。会

上，毛泽东、朱德分别讲话，宣传革命，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此时，粤军两个团分两路向红四军驻地迫近，企图消灭红四军。这一险情被南雄县委派去侦察的游击队员获悉，立即报告县委向红四军报告，毛泽东、朱德立即率红四军向江西信丰转移，30分钟后敌人包围了黄术岭。南雄县委提供的情报，使红四军化险为夷，为保护红四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红四军离开乌迳时，送给南雄县委枪支弹药一批，支持地方武装斗争，当时毛泽东还指示南雄县委要大力发展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推动了南雄武装斗争的开展。

1929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按照中共湘赣特委关于向外发展扩大苏区，从发展中求得恢复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率红五军主力1000余人离开井冈山游击湘南后，相继占领韶关的仁化县部分地区和南雄县城。红五军游击仁化、南雄期间，为了筹措军需，在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配合和大力支持下，缴获商团枪械500余支，子弹3万余发，没收豪绅粮油一批，筹款约6万元，在南雄县城，地方党组织配合红五军组织地方缝衣工人赶制军服1000余套，这一批军需的筹措，对红五军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红五军游击仁化、南雄期间，积极利用印发宣传资料、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仁化、南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彭德怀分别在会上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和纪律，号召群众拿起武装与敌人斗争。在仁化，红五军还联合民众公审地方恶霸。红五军占领南雄县城时，与中共南

雄县委取得联系，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与游击队一起破狱释放“政治犯”。红五军在仁化游击时，严明的纪律和关心爱护民众的行为，深受民众好评，群众纷纷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至今当地还传颂着许多军爱民的感人故事。

1930年3月，毛泽东、朱德根据红四军前委关于游击赣粤闽边区、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暴动、建立红色区域、打通赣粤闽三省赤色联系的决定，率红四军军部和一、二、四纵队指战员，由赣南大余向粤北南雄进军。4月1日，红四军在南雄游击队的配合下，歼灭梅岭新路口和珠玑石子岭的敌军两个营，随即占领了南雄县县城，为期一个星期。

红四军占领南雄县城后，为了宣传革命和发动群众，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在县城先后召开3次群众大会。会上，毛泽东、朱德分别讲了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动员群众联合起来，建立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革命，号召青年参加红军。在筹措部队的给养工作中，红四军在南雄实行保护中小商人新的筹款政策，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收缴了6户反动豪绅财物4万余元，另外还组织地方缝衣工加工了服装一批。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朱德还组织红军，把俘虏过来的几百名敌军，集中在县城进行训话会，公开宣布红军“不枪毙逃兵的制度及可以准假回家的办法”。这一“制度”和“办法”的宣布，对后来壮大红军队伍和瓦解敌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红四军在南雄还制定了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随即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和地方武装由南雄回师江西，向信丰进军。红四军这次游击南雄，接通了赣西南苏区的联系。从

此，南雄党政军和武装斗争归属苏区管辖和领导，南雄已经和赣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34个苏区县之一，当时南雄县有近300名游击队员参加红军，为苏区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向外发展向湘粤边挺进与江西朱毛红军汇合的指示，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率领下，从广西左江踏上北上的征途。在北上征途中一度受李立三攻打柳州、桂林、广州“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1931年1月2日全州会议后，红七军前委审时度势，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作出了出广东连州、北江，至湘粤赣边与江西朱毛红军取得联络的行动方针，继续北征。

1931年1月中旬，红七军3500余人从广西贵县、湖南江华，进入广东连山、连县。红七军挺进连县，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休整和解决给养问题。为此，红七军转战连县的近10天时间里，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并有效地利用红七军中连县籍的教导队长冯达飞，进行宣传发动等工作。红七军进驻连县县城期间，国民党连县警卫队纵火焚烧县城，红七军组织军民奋力把大火扑灭，从而感动了县城的民众，说：“国民党杀人放火，共产党救火救人”，“红军是仁义之师”。红七军在连县期间，在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筹得现款数万元，大米万余斤和其他食品一批。当地的惠爱医院还免费为红七军100多名伤病员治病疗伤。

1月底，红七军离开连县继续北上，于2月1日在中共湘粤工委同志的引领下，到达湘粤边界的乳源县梅花圩（今属乐昌市）。随即，红七军在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配合下，着手在

梅花圩开展建立根据地工作。次日，粤湘国民党军4个团，向红七军发起进攻，血战梅花的战斗打响。红七军坚持了5个小时，毙伤敌人1000余人，红军也伤亡700余人。战斗中，梅花人民群众参加支前工作，100余名农军参加战斗。2月4日，红七军放弃在梅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把几百名伤病员交给地方党组织安置后，向乐昌进军前往江西。4月5日，红七军强渡乐昌、乳源交界的武江河时，被敌人截断为两部分。渡过江的部队由邓小平和李明瑞率领，经仁化进入江西。未渡过江的部队由张云逸率领下北撤乐昌，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经湘南向江西挺进。同年4月后，红七军两部在江西遂川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为中央根据地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4月，按照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的部署，彭德怀、滕代远率领西路军（红三军团），占领赣南上犹、崇义后，为扩大湘赣苏区，向湘南、粤北进军。4月25日至5月初，红三军团相继占领仁化的长江、扶溪、城口和董塘的部分地区，试图包围仁化县城。随后，粤军调兵多路围攻红三军团。5月5日，红三军团全部撤出仁化，向湘南汝城进军。

红三军团游击仁化期间，为了筹措物资补充供给，在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配合支持下，筹款30万（银）元和物资一批，还购买大批药品和食盐，并把没收土豪劣绅的大批棉布，集中在长江广州会馆，请来几十名工人赶制服装5000多套。这批现款和物资，对于发展壮大红三军团起了重要作用。红三军团在仁化活动时，不仅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还协助当地恢复党组织和地下交通站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党组织

和革命斗争的开展。

三

1930年秋起，中央红军（亦称第一方面军）不断壮大，以赣南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也不断扩大和发展。对此，蒋介石调动大量的兵力，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多次的“围剿”。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后，为了保苏区南大门，与粤军在赣边展开了著名的“南雄、水口战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穿越韶关南雄、仁化、乐昌、乳源、连县等县。红军长征后，留守部队和游击队在赣粤湘边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2年5月，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陈济棠按照蒋介石关于入赣“剿匪”的指令，趁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扩张实力之机，派19个团进犯赣南赣县、南康、大余和粤北南雄等县。粤军的这一举动，严重地威胁苏区的“南大门”。为了有力地打击粤军，巩固中央苏区，以便尔后集中红军主力向北发展，中央红军于6月中旬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关于“解决入赣粤敌”的指令，命令东路军红一、五军团和西路军回师赣南分别向信丰、大余地区开进，进攻粤北南雄，以调动入赣粤敌回援，在运动中歼灭粤敌。

粤军发现中央红军主力回师赣南，遂以一个师6个团的兵力由南康向大余集中，企图抗击中央红军。针对粤军的部署，中央红军3个军团，于6月底至7月初，先后集结于南雄、

大余县一带并主动出击，在池江、梅岭关、大余县城发起进攻，共击溃粤敌多个团，控制了赣粤边梅岭关要隘。随后，陈济棠派重兵增援南雄、大余两地夹击红军主力。7月8日至10日，中央红军对进至南雄水口之敌发动强攻，击溃敌军10个团，南雄、水口战役结束。至此，南雄、水口战役，经过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战斗，共击溃敌军15个团，毙伤敌近3000人，红军伤亡2000余人。在南雄、水口战役中，中共南雄地方组织发动游击队和民众，积极做好支前工作，为红军作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南雄、水口战役，是一场恶仗、消耗战，在当时红军急需发展壮大情况下看，与敌人打成消耗战，对红军不利，得不偿失，但依然有它的历史意义：粤军入赣援蒋大大受挫，以后一段时间内，粤军主力不敢向赣南冒进，中央苏区南翼基本得到稳定，使中央苏区在后来的第四次反“围剿”中，消除了后顾之忧；粤军入赣受到重创，加深了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促成了后来陈济棠与中共的谈判达成协议，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穿越粤北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上旬，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8.6万人，撤离中央苏区实行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派代表与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粤北”等协议，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起到了重要作用。10月22日，中央红军突破在赣南的敌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红军先头部队由江西信丰进入粤境南雄县界址、乌迳一

带。次日，红一军团侦察连在乌迳新田击溃敌军一个连，成为红军长征入粤第一仗。29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11月1日进至湘境汝城和粤境仁化城口地域，并通过敌军设在该地的第二道封锁线。随即，红军由南雄出发沿着赣粤边向西挺进。

10月31日至11月6日，红军左、中翼部队相继进入仁化长江、城口。11月2日，红一军团前锋奇袭城口，突破敌军第二道封锁线，红军在城口休整期间，于铜鼓岭击溃粤敌一个团，为红军继续西进排除了一大障碍。11月6日起，红军陆续由城口经红山向乐昌麻坑、九峰、大王山挺进。

红军进入乐昌，为了打通西进道路，在大王山、九峰山一带的茶料、桃竹坑、樟姑岭一带，与粤敌展开战斗，把敌人牵制在九峰山鸦鹊以南一带，掩护中央红军安全通过九峰继续西进。随后，红一军团兵分两路经三界圩等地前进，抢占宜章、乐昌交界的白石渡。至11月13日，红军大部分胜利突破了敌军在宜章、坪石间的第三道封锁线。11月14日，红军全部撤出乐昌向宜章挺进。红军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后，红一、九军团一部南下连县天光山地区沿粤湘边向西进发，与湘军、粤军激战，于11月23日顺利通过三水，与主力部队会合直奔潇水。长征后卫部队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于11月下旬在全州、灌阳一带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后，遭强敌阻截，余部退往湘粤边的江华、兰山、连县等地开展游击斗争。

红军长征经过韶关各地，宣传革命，纪律严明，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1935年1月，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南雄油山成立。2月，留

守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按照中央的指示分9路突围转移到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3月底至4月初，项英、陈毅和蔡会文等，先后率部到达赣粤边的油山会师，从此，赣粤边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4月初，项英、陈毅在南雄油山大岭和大余长岭召开会议，研究开展游击战争相关问题，决定分兵游击。4月中下旬，蔡会文率部到湘赣边向湘东、粤北一带发展游击区，与游世雄部会合于湘南、桂东东边山，建立中共赣粤湘特委，并成立赣粤湘边游击支队。随即，特委把红军游击队分成8个大队，前往赣粤湘边包括粤北仁化、南雄、乐昌、始兴等16个县开展游击战争。5月，谷子元、李林、林长春等，聚集散落在广东乐昌境内的20多位同志，重建中共湘粤边工委，接着恢复中国工农红军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后改为武工队。从此，以广东乐昌、乳源、连县和湘南宜章为中心的粤湘边三年游击战争迅速开展起来。1935年3月至5月，担负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任务的赣南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在湘粤边连县、江华、临武等地开辟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

以挫败敌人“清剿”“封锁”进攻、发展壮大红军游击队为主要目的的赣粤湘边游击战争，发展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重点转移到抗日宣传。当时，赣粤湘边红军游击队在中央分局项英、陈毅领导下，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推动了赣粤湘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随后，赣粤湘边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向皖南挺进，投入抗日战争。

第一章

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韶关

(1927年12月—1928年2月)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南下征战广东潮汕失利，朱德、陈毅率起义军余部激战三河坝，接着隐蔽北上，穿山西进，转战赣粤湘，后来挺进井冈山与毛泽东部队会师。南昌起义军余部在粤北的活动，是起义军艰苦转战上井冈山的重要历程，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和建军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起义军余部在韶关活动近两个月，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新征程。期间，起义军不仅开展农民暴动，实施练兵，还策划“湘南起义”，创获“坪石大捷”。韶关成为朱德游击战术的形成地和“湘南起义”的策源地，为探索中国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组建中国工农红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推动当地武装斗争的开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昌起义部队南进和上井冈山路线图

一、起义军余部“穿山西进”到韶关

（一）起义军潮汕失利余部西进赣南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

1927年8月1日，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胜利第二天，朱德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8月5日，起义部队全部的撤离南昌南下，计划转到广东依靠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基础及海港，取得外援，重整旗鼓，再行北伐。国民党军阀钱大钧为防止起义军南下广东，纠集七千余人扑向瑞金、会昌。8月3日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南下先遣队到达瑞金后，于25日在壬田击败敌军。随后继续南下，与叶挺率领的起义军联合，于30日攻克会昌。会昌战斗胜利后，起义军陆续南下经长汀、上杭，于9月19至20日先后到达广东大埔县境的三河坝。此时，根据9月5日军委会的决定，实行分兵：朱德率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约2500余人驻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向的敌人；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头进

军。

9月28日，起义军主力部队攻占汕头、潮州后，英、日、美、法帝国主义派军舰到汕头海面，帮助国民党反动军队炮轰起义军。30日，敌军攻陷潮州，并进犯汕头，起义军死伤惨重，于10月1日撤出汕头，向普宁转移。3日，周恩来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和中共地方组织负责人在流沙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起义军立即撤向海陆丰；非武装人员由港口分赴香港或上海。至此，起义军进攻广东宣告失利。

10月1至3日，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2000余人，与国民党军阀钱大钧部激战三天三夜，消灭敌军1000多人。由于敌强我弱，为保存革命实力，朱德率起义军于4日撤出战斗，经湖寮、百候，向饶平茂芝转移。

10月6日，朱德率起义军到达饶平茂芝，起义军第十二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着从潮安突围的四百余人亦到达茂芝，并带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消息。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朱德于次日上午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一个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干部会



茂芝会议旧址——全德小学

议。

会上，朱德根据粤湘赣边界地区敌人兵力薄弱，是“三不管”的地带，而且还是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地方这些实际情况，作出了起义部队掩蔽北上，“穿山西进”，向赣南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天下午，朱德率起义军余部离开茂芝后，经柏松关，进入福建的平和、永定、上杭等地，向赣南地区挺进。

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起义军余部进入赣南地区，部队出现思想混乱、士气低落、军心不稳、纪律松弛、离队人员增多等现象，队伍从2000余人减至800余人，部队面临瓦解的危险。针对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为了稳定部队的思想，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朱德和陈毅在赣南对部队进行整顿：安远县天心圩思想整顿、大余队伍与组织整编和崇义县上堡军事整训，史称“赣南三整”。

历史证明，起义军到赣南实行“三整”是十分必要的。

粟裕曾回忆说：部队从饶平撤到赣南时，

“环境异常恶劣……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凶恶的敌人，甚至部队本



“赣南三整”之一的大余整编旧址

身能否保存下去也成了问题”。朱德在赣南组织实施的“三整”，对稳定和保存南昌起义军革命火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部队加强了内部团结，力量得到了恢复，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为部队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朱德曾回忆说：从此“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起义军整编后，为了缩小部队的目标，起义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改名为王楷（朱德别字玉阶，故改此名）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

（二）起义军余部与范部合作移防韶关

起义军经过“赣南三整”，虽然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稳定了军心，提高了士气，但是，部队仍然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给养无法解决。当时，已近隆冬，而起义军的干部和战士，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的单衣已经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经常饿肚子；有的负了伤，不少人得了疟疾，没有药，得不到治疗。更严重的是，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得到补充。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设法进一步巩固起义军，保存这支革命火种，就成了当时一个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严重的问题，朱德、陈毅等，除了依靠部队党组织，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外，还在部队中不断进行革命前途宣传教育。与此同时，朱德在赣南崇义上堡获知范石生部驻防湘粤边境的情况，于是设法与范部取

得了联系，决定利用范石生与蒋介石的矛盾，向起义军党组织提出了与范石生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建议。当时朱德认为，要保存革命火种，也要外部条件，也要朋友。对此，杨至诚后来在《艰苦转战》一文中回忆说：当时朱德对我们讲“我们要找朋友，要保存自己，发展斗争，没有朋友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很累，但办法还是有的。在这一带活动的是滇军，我熟悉，他们和蒋系、桂系是有矛盾的。我们只要能很好地掌握这个矛盾，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时过半月，范石生接到朱德的信，立即复信由他部队中的一名共产党员韦伯萃带上，前往赣南崇义上堡与朱德联系，叫朱德前去湘南汝城，与范部的师长协商合作之事。当时范石生给朱德的信十分真诚，信曰：

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日唯（即曾日唯，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处一晤。专此恭候。

此时，起义军党组织又对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一事进行讨论，朱德向陈毅、王尔琢详细介绍范石生的情况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处境，认为从各方面来看，同范石生合作是

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有利于隐蔽目标，补充休整，壮大力量，待机发展。朱德向全体党员讲明了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和目的，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在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原则下同范合作。



朱德与范石生谈判旧址——汝城县储能学校

11月21日，朱德受党组织之委托抵达湘南汝城与范石生谈判时，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不得干涉。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三项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称第十六军四十七师140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140团团团长；（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

12月初，朱德率领打着范石生部140团番号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离开资兴经汝城，向韶关挺进，于10日到达仁化董塘。此时，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也正在加紧发动广州起义，并设法通知朱德率部参加。因此，朱德部队从汝城南下广东的原因，史籍和相关资料记载，便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

是朱德在汝城接到中共中央（亦有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离开汝城南下参加广州起义而进入仁化。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朱德在汝城随范石生部移防韶关而率部南下进入仁化。据历史文献和当事人回忆文章看，后一种说法应更为可信。

关于朱德部队接指示参加广州起义一事，朱德本人于1962年6月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有过记述。他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们接受了党的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行至途中，听说起义已经失败，我们就在韶关停下来。”文中，朱德虽然没有说在12月的某日或在某地方，接到参加广州起义的指示，但从当时的历史文献和后来的回忆文章得知，应是部队来到粤北仁化时的事。

192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说，朱德部队自从三河坝撤出后进入江西再西进湘南期间，中共粤省委、江西省委、湖南省委乃至中共中央都派人寻找和联系，“但一切都是徒劳，始终未得赶上你们”。也就是说，朱德部队撤出三河坝进入广东仁化之前，尚未与地方党委以上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当年跟随朱德的同志回忆，朱德与地方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是他离开汝城到达仁化后，党组织要求他率部参加广州起义也是在仁化时。

赵镕当时任团部秘书，他在《回忆朱德所部在曲江的活动》一文中说：“我们在湖南与范石生搞了统战关系，范帮我们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这期间，我们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与广东省委也没有接上头。”他在《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又说：“大约在（1927年）十二月十日前

不久，部队到达广东的仁化，就在这里，朱德同志幸运地和广东北江特委联系上了，特委同志对朱德同志说：中央有指示，第一，要你参加北江特委；第二，要你率南下部队参加广州起义，这样，朱德同志便成了北江特委三委员之一。”

杨至诚在《艰苦转战》一文中说：“（1927年）十二月十日，部队到达仁化，在这里与广东党取得了联系，并接到中央的指示，要我们兼程南下，参加广州起义。”

李奇中在《回忆朱德部队在曲江的活动》和《在湘南》文中分别说：“范部又回到韶关。朱德率部随范到韶关”；在“广东边界上（即仁化），党中央来信，要朱德和陈毅率部于十二月十五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朱德在仁化接到要参加广州起义的指示，应不是中共北江特委转给的，朱德成为中共北江特委三委员之一，也不是在仁化的事。当时，北江最高的中共党组织北江地委已经解体，指挥北江革命运动的机关是北江农暴委员会，临时中共北江特委于12月20日才被中共广东省委宣布成立。因此，朱德在仁化接到中共中央或中共广东省委要他率部参加广州起义的指示，应是北江农暴委员会转给的，朱德参加中共北江特委并成为委员之一，应在他去到曲江即12月20日后的事。

二、联系党组织开展农运与农暴

（一）联合农军惩处土豪劣绅

朱德率部随范石生部南下，不仅仅是为了跟范部移防，

更主要的是以范石生部的番号作掩护，更好地实现他保存革命种子和继续进行革命的意愿。因此，朱德部到达仁化城口前后，朱德与陈毅等领导人商量，决定沿途宣传革命，动员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并得到了当地农军和民众的响应。在厚坑，朱德派部队部分指战员，与当地部分农民自卫军一起，逮捕了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彭挺生。

朱德率部离开城口继续南下，于12月10日进入仁化县城西南12公里的董塘镇。

董塘，是仁化县农民运动开展最早也是最为活跃的地区。大革命失败后，董塘农民运动受到反动派的镇压，处于低潮。朱德部队的到来，又给董塘农民运动的开展带来了生机。

朱德率部到达董塘的当天，住在董塘区农会领导人刘泰丰在董塘圩开办的“泰丰店”，并很快与蔡卓文和邹耀胜等地方党组织和农军



朱德、陈毅在董塘住宿和召开会议旧址——泰丰店

负责人取得联系。朱德率部到达董塘的消息当天就在当地传开，许多农会会员和农民自卫军知道朱德部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队伍，纷纷前往部队驻地，控诉董塘反动武装和土豪劣绅的滔天罪行，并迫切要求给予严惩，农军干部也向朱德提

出了严惩的初步计划。当时，朱德答应“派人协助。”农军的这次计划和行动，朱德后来称之为“农民革命”和“打土豪”。

根据当地的要求和计划，朱德在到达董塘的当天晚上，就于农民干部邓祝三的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抓捕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打击当地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会上，农会领导首先介绍了当地农运情况和土豪劣绅的分布状况。接着，朱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各地要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举行武装暴动，镇压地主豪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土地所有权。会后，朱德连夜派出部队，配合董塘农民自卫军，分别到董塘及附近的石塘、厚岭、历林、安岗、麻塘、狮井等地对土豪劣绅实行抓捕。

这次打击反动武装和土豪劣绅行动，共抓捕土豪劣绅谭学云、李胶平等33名，他们的枪支也一并被收缴。这批土豪劣绅被集中关押到董塘后，朱德立即召集陈毅和部分军民干部，开了一个短会，研究次日召开惩处土豪劣绅大会事宜。

12月11日，惩处土豪劣绅的群众大会在董塘禾坪岗草坪上举行。大会宣布将谭学云、李胶平等二十四名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当场枪决。

禾坪岗大会后，在董塘抓捕土豪劣绅的行动继续进行。12月12日，朱德部队与当地农民自卫军一起，在董塘的岩头村，又抓捕和处决了谢克刚等三名土豪劣绅。

朱德部队与当地农民自卫军联合，抓捕和严惩土豪劣绅的行动，在仁化影响极大，原来被反动派和当地反动武装解散

的区、乡农会，很快就恢复起来。重新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卫军，不断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清缴民团枪支，一度处于低潮的仁化农民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对此，国民党仁化县县长黄齐明感到十分害怕，惊惶出走，躲到广州迟迟不敢回去。



朱德在董塘召开群众大会旧址——董塘禾坪岗

是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加紧策划和发动武装起义，并派出人员前往湘、粤边界联系朱德，要其按中央的指示率部到广州参加起义。此时，朱德正率部由赣南前往湘南和随范石生部移防南下仁化途中。结果，朱德率部到达仁化董塘开展革命活动时，才接到中共北江农暴委员会转来的中央要求他率部参加广州起义的指示。

据此，朱德于12月12日决定率部离开仁化，南下参加广州起义。12月14日，朱德部队正准备上火车南下，忽然有消息传来，说广州起义迫于12月11日提前举行，并于13日失败，部队已退到东江。于是，朱德决定继续与范石生部合作，设法与

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曲江开展革命活动。

（二）开展曲江农运支援西水农暴

朱德部队南下广州参加起义终止后，便在曲江城东河墨水会馆附近和西河天主教堂驻扎下来。



起义军驻扎的曲江城西河（今属韶关市武江区）的天主教堂旧址

朱德在部队的住地解决后，马上着手进行寻找和联系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朱德在仁化时，曾与北江农暴委员会的中共党员有过联系，得知江曲东河坝依然有中共地方党组织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于是，朱德决定先去

朱德在天主教堂驻扎的第二天，召集部队领导开了一个短会，决定带领小部分人员到东河坝寻找和联系地方党组织。当时，部队穿的是国民党的制服，朱德担心地下党组织和民众不明真相，难于接近，于是决定化装成农夫前往。

身穿农夫服装的朱德和随行人员去到东河坝乡村后，来到一个名叫刘福的家里。刘福是当地早期的中共党员和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曾是1926年朱云聊主办的北江农军学校工作人员和北江农军司务长，1927年冬负责东水农民运动。朱德见刘福是个老实人，便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我叫朱

德，我们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转战到曲江的部队，想到此寻找和联系党组织。刘福是个有心人，当朱德部队在东河坝驻扎时，纪律严明，毫不惊扰群众，觉得与其他国民党军队有很大的区别，就估计是一支革命的军队。于是，刘福也向朱德介绍了目前当地党组织和农民运动的情况。

随即，刘福叫人通知叶凤章、邓其森、孙靖等人到他家开会。会上，刘福向朱德介绍说：“他们都是当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原是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有的还参加过南昌起义。”朱德高兴地说：“可找到你们了，我们还是战友。”然后，朱德向大家详细分析了南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勉励大家不要因暂时的失败而悲观，只要扎扎实实地组织群众，恢复党和农会组织，继续开展武装斗争，革命不仅有希望而且一定会取得成功。在会上，朱德还通过他们了解到中共曲江县委重建和北江农暴委员会计划在北江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的一些情况。

据《粤北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简况》记载，经过朱德这次在东河坝的宣传活动，当地很快秘密建立苏维埃政府，并组织领导当地民众进行革命斗争。

朱德部队虽然得到范石生的同意驻扎在曲江县城附近，但不时也受到范部一些人的监视。朱德考虑到部队与范部同住一地不方便，并紧靠城区，目标太大，不利于外出活动。于是，几天后，朱德便将部队转移到曲江城北 15 公里的犁铺头圩。朱德和大部分部队驻扎在犁铺头圩李达财当铺，一部分部队驻扎在犁铺头附近的狮塘村。



犁铺头圩旧貌



起义军余部指挥部旧址——犁铺头当铺

朱德率领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又是南昌起义后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因此这支队伍驻扎犁铺头后，不断受到中共党组织的关注。中共各级党组织都想方设法与朱德取得

联系，希望和要求其部队在广东进行土地革命，支持和配合当地开展农民暴动。

朱德部队驻扎犁铺头后的第二天即12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为了便于领导北江农民暴动，决定暂时成立中共广东北江特委（下简称北江特委），任特委书记的叶文龙在赴任途中牺牲，改任卢克平为书记。北江特委所在地在犁铺头，很快就与朱德取得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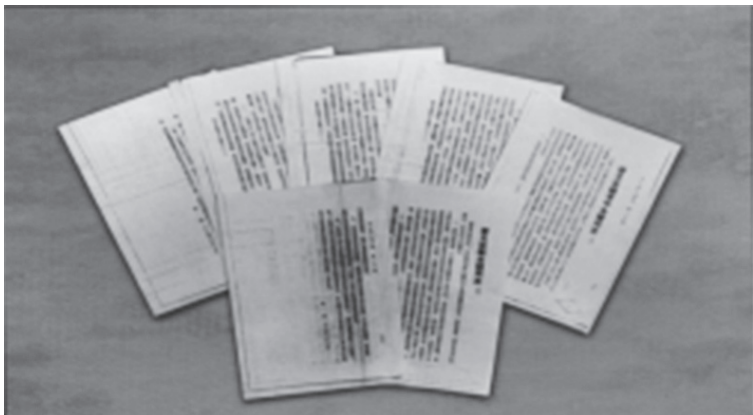
关于中共北江特委当初与朱德部队联系的情况，后来赵镕同志在《谈宜章“年关暴动”前后有关几个问题的旁证材料》中说：“那时，我们老早就想与地方党组织联系，正在打听地方党组织的情况，不久，我们便找到了北江特委。在与北江特委联系之前，特委的同志本来也早想来接头，但看到我们打着国民党军队一四〇团的旗号，在未弄清实情之前，不敢公开正式地见我们。当部队在犁铺头住了几天，亲眼见到我们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军纪很好，和国民党的军队大不相同。在了解真情后，北江特委出来找我们了，记得朱德同志还参加了北江特委，作为特委委员之一，便于工作。”

中共北江农暴委员会和中共北江特委，得知朱德部队来到曲江后，很快就将情况上报中共党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对朱德部队来到曲江极为关注，并很快与朱德联系，还多次发文对朱德部队的活动进行指示。其主要内容有两大方面：一是为避免被消灭的危险，应尽快脱离范石生部；二是联合北江农军开展农民暴动。

12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在批准中共北江特委成立时，指示特委要奉省委的命令，要求朱德部队“马上设法从敌人军中（范石生部）拖出来与现在的武装汇合”，“马上改编军队，

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军中即成立师委会。”“使部队的武装成为北江土地革命的主要副力。”“军队移动到某一地方，帮助农民群众起来暴动”，“目前活动范围就在花县、清远、韶关一带。甚至剩下只有一支枪，都要执行这种任务，帮助北江的土地革命起来，严厉的与地主阶级作战。”

朱德部队在犁铺头期间，中共中央连续给朱德及其全军官兵发出两封指示信。



中央给朱德及其全体官兵的两封信

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信中，要求朱德率领部队从范石生的军队中分化出来，立即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变更了前一封信的计划，提出朱德率领部队脱离范石生部后，应“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

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这是你们队伍存在和发展的唯一途径。”要求朱德“立即与广东省委接洽，直接受广东省委的北江特委（大约在韶关）的指导，完成你们对北江农暴应尽的责任，其余一切可参照前信斟酌实行。”这两封信由李鸣柯带到江西，转入湖南。但是，李鸣柯几经转折，均未能找到朱德及其部队，只好返回上海。朱德虽然没有接到上述两封信，但说明中共中央已知朱德部队已来到粤北，对朱德部队是十分关注的。

远在江西井冈山的中共党组织，也十分关注朱德部队的情况。早在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朱德率余部西进赣南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到井冈山的毛泽东，便于10月初派何长工到湘粤打探朱德部队的情况。

12月中旬的一天，当何长工在广东韶州火车站得知朱德部队驻扎在曲江犁铺头时，便前往与朱德会面。交谈时，何长工向朱德报告了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情况和他这次受命下山的目的和经历。朱德也向何长工谈了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和北撤赣南时曾派毛泽覃上井冈山，以及当前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要求他在北江协助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农民暴动的情况。第二天，何长工临走时，朱德给他一封介绍信和一些盘缠，并希望他回井冈山后，与毛泽东联系，说我们正在粤北开展农民暴动。

朱德部队驻扎曲江期间，不仅受到上述中共党组织的关注，前往朱德驻地进行联系；据赵镕回忆，朱德也不断加强与党组织联系，“有不少地下党负责人来找过朱德”。又据何长工在《伟大的会师》一文中回忆说，他在曲江犁铺头与朱德“谈

话中，不断地有人来找他（朱德），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看样子将要有什么行动。”

朱德率部驻扎犁铺头期间，遵照党的指示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据粟裕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

经过朱德部队的宣传发动，犁铺头以及部分村庄恢复了农会。当时，农会规定各村的地主，每收租十担要交五十斤谷做农会经费，大长了农民志气。

朱德在犁铺头期间，不仅开展宣传发动、恢复农会，还率部配合支持西水农民暴动。犁铺圩紧靠武江河边，对岸西北20公里一带称为曲江西水，包括重阳、桂头和一六等地，共有10余乡，1200多户，有近7000人口。

此时，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相继回到家乡西水的农军，秘密重建农军，恢复党组织。不久，西水重阳的农民纷纷要求农军镇压当地的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农会根据农民要求也在暗地里制定计划。于是，一场以重阳为中心的西水农民暴动即将爆发。

此时，中共广东省委正在发动全省各地开展农民暴动，中共北江特委已经成立，也在组织北江农民暴动。而朱德部队也接到广东省委要求参加北江农暴、扩大和深入北江土地革命的指示。

西水是曲江范围内反动势力较大的地区之一，而农民武装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反动派的镇压，与反动势力相比显得强弱悬殊。为了取得朱德部队对西水农暴的支持与配合，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曲江县委委员、农运领导人欧日章，在农暴前一天即 12 月 21 日，前往离重阳十余公里的犁铺头与朱德联系。当时，朱德正在组织部队训练。欧日章见到朱德后，马上说明来意，朱德听后认为：参加土地革命支持地方开展农民暴动，既是革命军队的职责，也是当前党组织对部队的要求。于是，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并派出一名军官随同欧日章去重阳商量次日暴动计划。

12 月 22 日一大早，朱德派出的一个连到达重阳圩，并很快与欧日章派去的农军取得联系。当地民团不知是共产党的部队，还以为是上峰派来的国军驻防重阳。上午 9 时许，欧日章率领重阳欧屋、水心、乐夫、青水塘等村 100 多农军和数百农民，手持步枪、鸟枪、大刀和锄头等，与朱德部队的一连官兵汇合，迅速出发，包围了大沙洲下村，向该村的反动地方武装和民团突然发起进攻，拉开了西水农暴的序幕。

大沙洲下村的地主武装毫无防备，惊慌失措，很快被打得东躲西逃。战斗不足半小时，全村被暴动的军民所包围，打死地主 1 人，俘虏 5 人。俘虏的 5 人



西水暴动指挥部

中，有朱亚富等4人是平日鱼肉乡民、杀害农军家属的反动分子。

当时，被抓的4个反动分子刚拉出村口，就被前来的民众团团围住，并不停地喊：“枪毙他们！枪毙他们！”在民众强烈要求下，反动分子被愤怒的农军当场枪决。此次暴动还烧毁了地主不少房屋，地主的36头耕牛和谷米7000余斤以及财物一批也被农军没收，同时还缴获地主的长枪10多支。

战斗结束后，没收到的粮食和财物，大部用于救济贫苦农民。而朱德部队的一个连却带着战斗胜利的喜悦回到驻地犁铺头。

暴动的初战告捷，不仅鼓舞了当地农军的志气，也沉重打击了重阳一带的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使他们感到极为恐慌，很快与周围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准备联合对付农军和广大的农民。

28日上午10时左右，国民党重阳乡乡长冯佩赞和民团头子雷丰霖纠集列村、芹村和黄沙岭等地的地主民团1000多人，围攻水心、暖水和青水塘3个村庄，企图镇压和消灭前不久进行暴动的农军和农民。

指挥西水农暴的欧日章见状，一面指挥农军与地方民团对峙，一面派出农军欧春苟等突围，前往犁铺头请求朱德派部队增援。

派出的农军到达犁铺头后，向朱德报告了暖水和青水塘农军抗击反动武装的情况，并说反动民团可能也要请国民党军队来镇压我们农军。朱德听后，马上问前来的农军：“民团还

有多少枪械武器？他们怎样镇压农民，杀死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他们怎样要求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援助？”随后，立即答应派一个连的兵力给予支援。

当时，反动头子冯佩赞组织地方武装四次围攻暖水和青水塘，都没有得手，气得发疯，狂喊：“攻下青水塘，扫帚也要过三刀。”于是，派出地主朱乃昌去韶关（曲江县城），请国民党正规军前来支援。犁铺头是重阳到韶关的必经之路，朱乃昌来到犁铺头时，打听到这里驻有国民党第十六军的一四〇团。于是，朱乃昌迅速去找该团团部，请求朱德派兵镇压青水塘农军。此时，请求朱德派兵支援青水塘战斗的农军刚走，朱德正准备集合部队前往，见朱乃昌来到团部说明来意，便将计就计，慨然应允朱乃昌的请求，立即派一姓朱的军官带着一个连随朱乃昌出发，前往青水塘。

当天下午4时许，朱德派出的部队来到青水塘村对面的横岭脚村时停了下来。此时天正下着小雨，部队的指挥官拿出



西水暴动青水塘炮楼旧址

纸和笔，要朱乃昌将村子的地形和民团的兵力部署一一标明。当朱乃昌划好图递给指挥官时，即刻被几名战士捆绑起来。

接着，部队分两路向包围暖水和青水塘的民团发起猛烈攻

击。坚守在村里的农军，看到援兵已到，直扑敌阵。在农军和援兵里外夹击下，民团被打得鬼叫狼嚎，四处逃窜。往芹村方向逃窜的民团，受到援兵的追击，有的半路被击毙。冯、雷反动头子率残部狼狈逃窜时，雷丰霖的侄子也被击毙。

这次战斗，不足两小时，反动民团 10 余人被击毙，100 余人被打伤，一批武器被缴获。

朱德部队这次将计就计，打败重阳暖水和青水塘反动民团的战斗故事，至今依然在当地民众中广为流传。朱德两次派部队参加的曲江西水暴动，在朱德部队离开曲江后，依然继续在坚持，为期一月有余的西水农暴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武装，震动了粤北，成为北江农暴的重要战例。

三、开展练兵运动探索游击战术

朱德率部来到曲江后，继续与范石生部合作，并再次得到范石生军需方面的补充。朱德部队驻扎在犁铺头，有范石生的掩护，暂不受敌的袭击，算得上是稳定了下来。在这宁静安全的环境中，不仅有利于朱德部队在当地开展农暴活动，也有利于对部队进行较为正规的军事训练。朱德部队转战途中，在赣南虽然进行过一些整训，但毕竟是仓促和简单的。因此，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使部队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朱德决定在犁铺头开展练兵运动，对部队进行一次较为正规和全面的军事训练。



犁铺头当铺后楼——朱德当年的住址

在这次军事训练中，朱德不仅亲自拟定训练方案、内容与方法，口述和审定训练教材，还亲自授课和作示范，授课不仅生动，而且易懂，赢得全体官兵的敬佩。

关于这次军事训练，《朱德年谱》（新编本）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为练好兵，先根据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亲自编写出《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两类教材。教材规定将旧式疏开队形改为递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构成阵前纵深的和交叉火网而在战斗上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并减少密集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敌人火力杀伤。还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作战原则。教材编好后，以教导队为试点进行训练。在训练中，把全队

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经常到现场亲自指挥，亲自讲解，亲自示范，反复强调要士兵熟练手中的武器，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同时，还要求指挥员在战斗中要知己知彼，重视对于敌情的搜索和侦察工作，不摸清敌人的情况不动手；“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

对于这次军事训练的经过，有一些当事人作过回忆，李奇中就是其中之一。李奇中当年为朱德部中的第一营营长兼教导队队长，他曾写有一篇题为《朱德同志教我们战斗》一文，较为完整地概述了训练的全过程。该文登载于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驰骋南粤卷巨澜——朱德同志在广东的革命活动》一书。现把全文录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部队利用十六军一四〇团这一番号作掩护，求得休息和整训的机会，在得到了部分物资补充以后，便离开湖南，向广东进发。当时，原想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但刚进入广东境内，就听说广州起义失败了，于是部队便在粤北韶关的犁铺头驻扎下来。

犁铺头离韶关约有三十多里路，是个大圩场，比较富庶。这里离湘粤两省交界处不远，同时广东军阀也还没有发觉我们，情势比较稳定，部队便决定在这里休整一下。

经过了失败的折磨和长途转战，现在能够有这样一個休整的机会，自然是十分难得的。但是究竟怎样休整呢？我们心里都没有底。开头几天，部队除了理发、洗澡等杂事之外，就是照例的出出操，还有就是由政治指导员陈毅同志讲讲话，谈谈形势，整顿思想。而在这些日子里，我每次到朱德同志那里去，或是从他窗前经过，总看见他坐在那里，在纸上写些什么；写一阵，停笔凝思一阵。

有一天，教导队刚出早操回来，传令兵就跑来找我：“李队长，朱夫子叫你去一趟。”不知是因为朱德同志任过教育团团长的缘故，还是因为他那较大的年纪和慈祥的长辈风度，当时同志们都亲切地管他叫朱夫子。我连忙去了。一进屋，就看见教导队的副队长蒙九龄同志和一区队长（越南人，名字记不得了）早已在那里了。

朱德同志象往常一样，和蔼地招呼我们坐下，简单地问了问队员们的情绪和生活情形，然后笑着问我们：“部队已经休息了几天，应该进行一些军事课目训练呀，如何进行训练，你们考虑过没有？”

被朱德同志这一问，我觉得自己的脸一阵发烧。心想，真是，教导队就是训练干部的，怎么没想到如何进行训练这回事呢。我只好红着脸回答：“没有。”

“咳，怎么能不考虑呢？”朱德同志略带责备地说：“就现在的形势看来，我们象这样安定的机会并不多。敌人总要打我们，我们总是要打仗的。可是以后要打什么样的仗，仗怎么打，大家并不了解。我们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他们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这几句话虽然说得很平易，却精辟地指出了我们将来的处境和必须进行的准备。他看得是那么远，我不由得思索着他的话：

“敌人总要打我们，我们总是要打仗的……”。可是一想到这仗该怎么打？拿什么来教给部队？又不禁有些茫然了。蒙九龄和那位区队长也在低着头默默地思索着，大概他们的心情和我一样。

朱德同志见我们没有说话，就温和地笑了笑说：“现在考虑也还来得及。我们来研究一下吧，看学什么好。”

我说：“学当然该学，可是……就是没有教材。”

“教材是人编的嘛。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说着，他拿了几张纸，分放在我们面前说：“我考虑了一下，先谈谈，你们记下来研究研究，再教给同志们。”

“现在，敌人是强大的。我们的大革命失败了，才开始搞自己的武装，人少，枪也少。要想战斗打得赢，以少胜多，就要根据我们的条件，讲求

新的战术……。”等我们准备好，朱德同志从桌上拿起一叠写满字的纸头看了看，便讲起来了。

当时，朱德同志讲得很多，事情经过了近三十年，许多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开始是从接敌运动的队形讲起的。他要求我们在讲授战术动作时，要抛弃旧的一套队形，采用新的战斗队形。例如将旧的疏开队形改为电光队即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密集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敌人火力杀伤的可能性；又如散兵队形由一字散兵线改为弧形的和纵深配备的散兵群，以构成阵前纵深的和交叉的火网而在战斗上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等等。在战术上，他特别强调知己知彼的重要，要求指挥员重视对于敌情的搜索和侦察工作，不摸清敌人的情况不动手。在战斗动作上，他反复强调士兵除了要熟练手中武器以外，一定还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记得在讲述每一个问题时，他总是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重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

显然，对于这些问题，朱德同志是经过了长期思索的。他很有兴致地给我们讲解。等我们把要点记清楚了，他便给我们逐点详细解释：他平摊开一双大手，在桌面上比划着，抓起随手拿到的东西，摆给我们看，或是拿过我们手里的笔，在纸上画出

草图，讲给我们听。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被这些新鲜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些东西，我们在旧的操典中，甚至在黄埔军校学习时都没有学到过。就以电光形（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来说，它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这在以后的多次战斗中得了验证。

这样，整整一个上午，我们都在记录着这些新鲜的战斗要领。在讲述告一段落后的休息闲谈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向朱德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新东西是从那里学来的？”

“是从外国学来的，也是从战斗里学来的。”

朱德同志笑了笑回答说，“可是，我在江西军官教育团那么久，关于军事教育我却没有参加半句话。要知道，教会了他们，他们是要用来打我们的！”

“那你讲什么呢？”蒙九龄同志憋不住问道。

“讲政治呀。我给他们讲道理，讲革命。我在那里的任务就是讲道理嘛。”说到这里，朱德同志略微提高了声音：“现在不同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就要有革命的战术，来进行革命战争。”

当天，我们三个人便仔细地讨论了朱德同志讲授的内容，把记录整理出来。于是，新教材的第一课便产生了。以后，朱德同志又口授了第二课，第三课……

我们三个人根据朱德同志的多次讲授和在实地教练中的体会，并请参谋长王尔琢同志帮助，陆续编写出部队训练的临时教材，经过朱德同志审定以后，整个教导队便在朱德同志亲自领导下，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我清楚地记得，开课的第一天，正是粤北微寒的时节。早晨，教导队全体一百多名士兵出罢早操，整齐地站在操场里。朱德同志来了。他穿一身灰布军装，老长的胡子剃掉了，看来好象比平时年轻了许多。他站在队前，缓缓地扫视了大家一眼说道：“同志们，我们闹革命，要有革命的意志，也要有革命的本领。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开始军事训练了。”朱德同志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他说：“你们都是革命军队的骨干，学好了，就可以把本领传到整个军队中去。”

接着，他亲自讲授了第一课。讲完后，又带着我们走到预定的演习场，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他自己担任进攻连的连长，组织士兵按照新的队形演习动作。演习中，有的人动作不正确，他便亲自卧倒在泥地上作示范。部队演习结束时，他已是满身泥土了。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便在朱德同志指导下教课。接着，我们又将教材抄发到各营，并派出教

导队的学员到各营担任教员。经过短期训练，我们的战术水平迅速提高了。教导队的同志们都初步掌握了新的初级指挥技能，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我军优秀的指挥员。朱德同志口授的教材，也在全团推广教学。这些教材直到上井冈山以后，还是部队战术教学的重要材料。



狮塘村练兵场旧址

四、脱离范部南下受阻向西挺进

（一）朱范合作暴露，朱德率部转移

1928年元旦，朱德与范石生合作之事暴露，蒋介石即电令广东李济深。李接电后马上电告范石生，要他迅速查办，马上解除朱德部队武装，逮捕朱德。同时又密令十三军军长方鼎

英部从湖南进驻粤北，监视朱德部队与范石生的动向。

范石生得知“恶令”消息后，1月3日，派秘书杨昌龄送信给朱德，告知“恶令”的实情，敦促朱德率部火速离开曲江犁铺头，并派军中人员送去路费和子弹。范石生当时写给朱德的密信很有诚意，大意曰：

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里的“一”是统一天下的意思）；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的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爱莫能助。

蒋介石下达“擒朱”的恶令后，范石生虽然没有执行，但朱德却有被“擒”的危险，其部亦有被缴械的可能，这也就意味着南昌起义军余部像似又将面临一场新的劫难。为了继续保存这支革命队伍，朱德在接到范石生的密信时，很快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停止部队集训，做好离开曲江的战斗准备；二是尽快与地方党组织协商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

关于南昌起义军余部脱离范石生部后去何方向问题，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起义军余部脱离范石生部后，即决定去湘南。此说，应与事实不相符；二说是按照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的指示和建议，去广东东江地区的海陆丰与广州起义军余部会合，后在途中受敌阻拦才转移湘南。这一说法的依据来源于一些当年与朱德一起的老人的回忆录。如赵镕的《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李奇中的《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红四军创建前的一些回忆》、《在湘南》、《朱德同志与湘南起义》；杨至诚的《艰苦转战》

等。这些回忆录认为，朱德接到范石生要他尽快离开曲江的密信后，立即召集部队负责同志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和讨论起义军余部的去向和发展问题，北江特委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说我们的部队与范石生合作之事已暴露，要求大家提出意见，看看怎么办？北江特委的同志主张部队去广东东江，与广州起义军余部会合，在海陆丰发展，朱德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征得大家的意见后，形成了三项决议：一是放弃去雷州半岛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另外寻找适当地点发动革命运动；二是按照北江特委的意见，先去海陆丰与广州起义部队会合后再作安排；三是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脱离范石生部，以“野外演习”的名义立即离开犁铺头。

回忆录还说，1928年1月3日晚，朱德率部迅速撤离犁铺头，朝东向仁化进发，经曲江、始兴、南雄准备前往海陆丰。不料，部队从仁化经曲江周田湏水（亦称湏江）边时，与敌军相遇，不能前进。这时，部队既不能东去，也不能停留。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敌人交锋，朱德立即决定把部队带回仁化，再谋对策。

据历史文献记载，南昌起义军余部脱离范石生部后，并不像前面所说的去广东东江海陆丰，而是按照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求，继续留在粤北前往英德、清远一带，帮助发动农民暴动，也是在途中受敌阻拦而由仁化转去湘南。

1928年1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四）中说：“北江朱德部队已脱离范石生，因军事的关系须绕道南

雄、翁源，方能到英德、清远等目的地。”朱德部队“到英德、清远等目的地”的目的是什么？1928年1月10日的《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关于省委全体会议情况》（三）中提到：“省委全体会议已于1月1日开始，5日结束”，会议决定在北江的“英德、清远一带发动农民群众暴动”，“决定暴动到割据的局面都以清远为中心”。由此可知，朱德与范石生合作之事暴露后，广东省委已指示和要求朱德部队，去北江英德、清远一带发动农民暴动。

至于朱德是否按照广东省委的指示和要求而行动，1928年1月18日的《中共北江地区暴动和朱德部队脱离范部情况》（五）中说到：“朱德已接到省委命令脱离范部，……脱离后赴仁化，本拟绕道始兴到英德，被十八师苏世安部所阻，遂转赴坪石，……现已到坪石，拟先取乐昌，解决许（克祥）部后（现乐昌只有许克祥一个团余人），即到目的地（英德）帮助农民暴动”。1928年6月15日，杜修经在《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中，也说到朱德部队到韶关后的情况：“自然北源的敌人查明了他们的行动而攻击他们，同时得到了广东省委调他们的命令，曾开动走向目的地，结果因没有办法通过而转回了”，“向宜章进发，而割据了宜章”。

以上文献史料说明，朱德部队脱离范石生部后的去向，是前往粤北的英德、清远一带帮助发动农民暴动，应该可信。至于上述回忆录所说的前往广东东江海陆丰与广州起义余部会合的去向，也许是误记。而后来史学界在著述朱德这段历史时，

同样坚持这一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朱德部队脱离范石生部后到达仁化与曲江交界受敌阻拦，与上述回忆录与历史文献记载却是一致的。

起义军余部在仁化与曲江交界受敌阻拦回到仁化驻扎后，朱德立即召集负责人开紧急会议，再次商量部队的去向和发展问题。关于这次会议对部队去向和发展问题的提出、讨论和决定，不少当事人有过回忆。

李奇中在《红四军创建前的一些回忆》一文中说：部队受阻后，“部队究竟开到什么地方去呢？初步决定把队伍开到仁化再行计议。部队在仁化宿营，朱德同志又召集负责同志商量今后去向。龚楚建议先将部队开到湖南宜章县所属的莽山洞，再徐谋良策。莽山洞是界临广东北江西部，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好地方。因为龚楚是乐昌人，其妻是宜章人。我也是湖南人，地形比较熟悉，所以首先附议龚楚的意见。经过大家讨论，遂决定先开到莽山。”李奇中《在湘南》的回忆录中，还有类似的说法。他说：“在仁化开会商量时，我也参加了。龚楚是乐昌人，他老婆是宜章人，他说广东这个地方不能去，只有到湖南宜章的莽山洞去，那是一座大山，去那里一下再说，我们同意了。”

对于部队这段去向问题的历史，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亦有过回忆，也充分肯定了龚楚的建议和做向导所起到的作用。他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湖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综上所述，朱德在宜章举行暴动，是在曲江脱离范石生部，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和要求率部前往英德、清远途中受阻后，回到仁化召开会议决定去向，才决定部队北撤乳源梅花的；并非朱德率部到达饶平就有“直奔湘南”，就有发动宜章暴动的计划和意向；这也应是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从三河坝战斗失败后，转战到乳源北部，然后再组织发动湘南宜章暴动的真正历史。

（二）攻打仁化县城向西进军

朱德上次在董塘派出部队与当地农军抓获一批土豪劣绅并进行严惩之后，仁化反动民团乘朱德部队离开仁化之机，对县城附近的农民运动实行镇压，并抓捕一批农军干部和农民关押在县城监狱。事后，当地党员干部和农军负责人正设法营救。此时，朱德部队返回仁化，他们得知部队驻扎在董塘便派出人员前往。他们向朱德汇报当前仁化农运情况后，把仁化反动民团关押农军和农民的事作了详细的介绍，请求朱德派部队攻打县城，营救被关押的人员。为此，朱德在驻扎董塘的当天晚上，召集仁化县党组织、区农会、农军负责人开会，讨论攻打仁化县城有关事宜，并决定次日进行。

1月5日，朱德率部分部队与董塘及县城附近上百名农军进攻仁化县城。县城附近的几百名民众也被农军发动起来，纷纷拿着大刀、长茅和锄头前往参加。当时，县城反动团队毫无准备，县城很快就被朱德部队和农军以及参战民众所占领。随后，县城监狱被攻破，救出被关押的农军和农民40多人，同时还缴获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一批，现款2000多元。



南校场旧址

是日下午，朱德与农军干部在县城南教场召开群众大会，陈毅在会上讲了话，号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参加土地革命。会后，朱德为安全起见，率部回到董塘。

朱德率部攻取仁化县城回到董塘的第二天，召集部队中的领导成员和当地农军负责人开会，决定重新组建地方革命武装。会上，朱德认为当地农军要适应土地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有必要重新组建，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将当地和附近的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仁化）独立第四团”，此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组建后的独立团约一千人，团长刘三风，下设四个营，谭广泉、冯安、伍牛仔、李翠基分别任一、二、三、四营营长。该团成立时，只有四百多支枪，朱德深感该团武器紧缺，决定将部队中的部分枪支和子弹赠送给独立团。

为了鼓励全团指战员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朱德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独立团成立时，还赠送一面红旗给独立团。另外，为了加强对仁化独立团的领导和充实独立团的军事力量，朱德还将部队中的腾铁生、杨开平、石生根、蒋国杰、范卓、孙德隆、刘海、何大修等8名军事人员，留在独立团。随

后，朱德按照紧急会议的决定，率部离开仁化经乐昌前往乳源。



工农革命军独立团成立旧址—董塘董劝书院

五、策划部署湘南暴动，赢得坪石大捷

（一）杨家寨会议策划湘南宜章暴动

1月7日，朱德率部到达乳源北部的梅花区大坪杨家寨。关于部队进驻的杨家寨这一地方，朱德后来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回忆说是“宜章县的杨家寨子”。据后人调查考证，应是乳源县梅花大坪杨家寨，而不是宜章县五都岭的杨家寨子。这两个寨子都地处乳源县和宜章县边界，朱德先是率部进驻乳源县的杨家寨，后又曾率部路过宜章县五都岭的杨家寨子。



杨家寨全景

乳源县梅花杨家寨，是个拥有300余户1000多人的大村落。地处逶迤险峻的南岭南侧，位于乳源、宜章县交界，四面皆山，山中有一块较大的平地，似是一个天然的屯兵之地。这里不太与外面通消息，对于山外，这里又是一个盲区。但是，这里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早，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因此，这里也成为共产党人理想的寄栖之地。“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宜章县农运领导人杨子达和乐昌县农运骨干杨高林、李光中和李二德等都先后隐蔽在这里，开展秘密活动。

朱德部队进入梅花乡驻扎杨家寨时，部队有在乳北建立以梅花区为中心的湘粤边区根据地的打算。据1928年1月21日《中共北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所述：当时“湖南有不少同志在军中，在梅花一带，乐昌属都积极主张到湖[南]去，湘军

正在尽力对付桂系，湖南空虚，可以在郴州、来阳一带农民基础较好的地方活动”。

上引这段话可以说明，朱德部队进驻杨家寨之初的去向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湘南宜章县不少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基本在乳北一带活动，他们熟悉和了解此地的情况，主张朱德部队在梅花一带建立湘粤边区根据地。为此，当时部队还派出人员，去争取梅花区区长邓光汉，为部队做了一些筹粮和打探情况的工作。而乐昌的同志却主张朱德的部队应向湘南发展。从他们的主张和理由看，的确也比较充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与部队从仁化计划北撤乳源时的意图基本相同。这也正是后来发动宜章暴动的重要理由之一。

为了尽快研究和决定部队今后的军事行动，朱德在杨家寨文奎楼（又名贤观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向湘南发展在宜章进行暴动的问题。参加会议有陈毅、王尔琢、龚楚、蔡协民、杨子达、李光中、胡少海等。



文奎楼

会议首先由宜章、乐昌党组织负责人杨子达、李光中以及胡少海等人，汇报宜章、乐昌县地理民情和敌我双方的情况。李光中说：“坪石有九个农会和二个工会，马上可组织起几百人的队伍，协助暴动。”李二德补充说：“坪石的土匪头

子胡凤璋已知朱德部队脱离了范石生部，并对朱德部队有所防范。”杨子达说：“宜章目前没有国军驻守，民团还不知道朱德部队已脱离范石生部，有利于朱德部队进驻。”胡少海接着说：“宜章的反动民团曾要求我到粤北搬兵，企图想镇压当地农民暴动，这也有利于朱德部队进驻宜章开展活动。”

朱德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将湖南特别是湘南以及粤北的形势和去湘南开展武装斗争的有利条件作了分析：湘桂新军阀混战，李宗仁、唐生智正酣战于湘北，湘南敌人的统治力量相对较弱。桂军黄绍竑与粤北张发奎也在粤北相持，这就给湘南留下一个真空地带；眼下已近年关，正是地主土豪僱租逼债的当口，也是穷苦农民需要我们组织他们进行斗争的大好时机；湘南又有大革命工农运动的基础，大家也同我一样主张去湘南大干一场。于是，决定尽快摸清宜章的情况，做好各种准备，去宜章发动暴动。这一决定，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同意。

会议后的第二天，朱德率部从杨家寨到达梅花圩，住在孔圣会馆。当时，宜章籍的中共党员陈东日带领10余名赤卫队员从宜章栗源赶来与朱德接头，并向朱德等人反映了宜章的敌情：县城没有正规军驻守，只有400人的民团，且无电台，无接通广东的电话线，消息闭塞。朱德进一步掌握宜章敌情后，决定部队向宜章莽山洞进发。

部队到达莽山洞后，朱德一边安排部队进行休整操练，一边召集部队负责人和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以及县委员毛科文、高静山等举行联席会议，再次商议宜章暴动的具体计

划。会上，集中商议和拟定如何在宜章发动暴动的战斗方案。根据讨论的意见，朱德、陈毅进一步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暴动计划：以胡少海出身于宜章有权有势富豪家庭，本人从事革命尚未暴露身份，没有参加过本地的阶级斗争，宜章官绅对他还不怀疑等特殊条件，让他带一支先头部队以“协助地方维护治安”的名义，先进驻宜章，取得地方官绅信任，再接大部队入城，并请全城反动头目赴宴，实行“一网打尽”，进而占据宜章城。这一计划，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并制定了如何智取宜章的具体方案。

联席会议结束后，朱德从部队中的老兵里挑选了两个连精兵，作为先头部队，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四〇团旗号，由任副团长的胡少海带领，于1月11日下午开进宜章城。胡少海进城后，不仅派出士兵到处张贴布告，还主动登门拜访官吏豪绅，声称部队进驻宜章目的是“防共防匪”，并告知县长杨孝斌：“王楷团长”率领的大队伍明天赶到县城，还准备宴请县长大人和其他官员。杨县长抢着说：“你们是来维持宜章治安的，还要你们宴请，这万万使不得，不能反主为客，明天王团长到来，县衙门为各位接风洗尘。”

1月12日下午2时，从莽山出发经栗源堡的朱德部队开进宜章城，并在女子职业学校设立司令部。紧接着，部队在布防设营的名义下，在县城各要道布置岗哨，宣布临时戒严。

是日下午4时许，县长杨孝斌在县参议会（即前清明伦堂）二楼设宴，为一四〇团长官“接风洗尘”。朱德、龚楚、胡少海带着14名干练的卫士，带上驳壳枪，前往赴宴。



智取宜章后，朱德所设指挥部旧址

宴席开始后，杨县长和前县长黄得珍等主要官绅，频频举杯向朱德他们敬酒，表示欢迎之意，不时还夹杂几句吹嘘他们“铲党”的功劳。

与此同时，陈毅、王尔琢与熟悉

县城情况的陈东日一起，指挥部队悄悄地包围了挨户团和保安队所在地及警务局，部队的特务大队包围了县公安署和宴会大楼，作好了战斗前的一切准备。

参议会宴席酒过三巡，大厅里的一名跑堂突然一声长叫“鱼来啦！”这是约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的信号。朱德见时机已到，立即起身，掷杯于地。随朱德前来的卫士听到响声后，忽如猛虎扑羊，缴了县衙门哨兵的武器。陈东日等带领一小分队战士迅速闯入宴会大厅，端枪齐呼“不许动！”把杨孝斌、黄得珍等20多人全部捆绑起来。“你，你，你们是什么人？”杨孝斌吓得结结巴巴地问。朱德把桌子一拍，宣告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就是朱德！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平时鱼肉百姓，反对革命，屠杀工农，十恶不赦，是劳苦大众的死敌，现在通通扣押起来，听候人民的公审！”

就在同一时间，陈毅、王尔琢指挥部队解除了挨户团和保安队、警务局的武装，共缴获步枪350支，驳壳枪10支，俘400余人。接着，部队打开监狱，放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无辜民众，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劳苦大众。此时，工农革命武装的红旗在部队司令部升起，宣告智取宜章县的胜利，点燃了宜章年关暴动的烈火，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1月13日上午，朱德部队与宜章县委在县城北门广场举行数千人参加的年关暴动胜利庆祝大会。会上，朱德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将部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朱德在会上还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当地军阀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会接受群众的意见，经公审，处决了县长杨孝斌、挨户团副主任刘秉钧等几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

此后，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在湘粤边，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二）攻打胡凤璋匪部

宜章暴动的胜利，不仅震动了湘南，也震动了与宜章相邻的乐昌坪石。盘踞在坪石的匪首胡凤璋害怕朱德部队攻打坪石，占领自己的地盘，便在坪石修筑工事，四处调集匪兵，加强坪石的防卫。

朱德部队夺取宜章后，湘南各县和粤北乐昌共产党组织，纷纷派人来宜章与朱德联系，请求工农革命军前去发动暴动。乐昌共产党组织，对胡凤璋在坪石和梅花的为非作歹、残

害百姓的罪行早就恨之入骨，此时的胡风璋又有企图进攻朱德部队的计划，如不对胡风璋进行军事上的打击，切断其与外界特别是湘南宜章等地的联系，将会影响整个湘南起义的实施，于是派出人员前往宜章向朱德汇报。朱德听了乐昌党组织的意见后，也认为扫清宜章外围的敌人，对在湘南进行全面起义十分必要，于是决定派出部队攻打盘踞坪石的胡风璋匪部。



老坪石圩旧址全景

1月13日，朱德派出的工农革命军两个营以及部分宜章农军来到坪石附近，与李光中率领的坪石皈塘数百名农军一起分三路直逼坪石，迅速控制了武江沿岸的码头和坪石环山的制高点。

此时，胡风璋部正在坪石街两侧修筑和加固工事。胡风璋根本没有想到朱德的工农革命军来得如此之快，还有众多的农军。工农革命军与农军多次向匪部的据点发起猛攻。匪部

也凭借坚固的工事死撑硬守，但也只顽抗了四天，死伤数十人。胡风璋见自己的援兵没有来到，败局难予挽回，只好率残部退出坪石。

2月1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在坪石歼灭前来进犯的敌军许克详6个团后，为在湘南继续组织发动起义，率部撤离坪石回到宜章。

此后不久，胡风璋乘坪石空虚之机，收罗他的残兵败将，再度占据坪石。胡风璋不仅在坪石街四周修建碉堡，设卡增哨，严密把守着坪石圩的所有通道，还变本加厉地鱼肉百姓，残害民众。

对此，坪石民众恨之又恨，纷纷要求当地革命武装设法消灭胡风璋这股土匪。中共坪石支部根据民众的意见和要求，派李光中专程赶去宜章向朱德、陈毅报告，并请求朱德派部队前来坪石再次攻打胡风璋匪部，同时还向朱德说明：对攻打胡风璋，乐昌独立营和当地民众已做好准备，参加战斗。

此时，朱德在宜章正准备率工农革命军向湘南郴州进发，听了李光中的报告后，马上召集部分领导人开了一个短会，作出了先消灭坪石胡风璋匪部，尔后再进军郴州的决定。

2月10日，朱德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二十八团向坪石出发。乐昌坪石和皈塘的农军2000余人，在李光中和李家泉的组织率领下，积极配合工农革命军的行动。

工农革命军和农军逼近坪石，胡风璋令其所部向坪石左侧的乐昌农军扫射，企图一下子将农军打散。朱德立即指挥部

队一面打掩护，一面从坪石街两侧进攻胡凤璋的司令部。

当工农革命军发起进攻时，李光中、李家泉指挥农军，在工农革命军轻、重机枪的掩护下，顶着厚厚湿湿的棉被和八仙桌，轮番向胡凤璋佯攻，并组织大家不断高呼：“消灭胡匪帮！”“活捉胡凤璋！”同时，农军还在铁桶里燃放鞭炮，壮大声势，震慑土匪。

在农军佯攻的同时，工农革命军进行实打，不断向胡匪发起猛烈的进攻，几小时后便摧毁了胡匪在坪石街口的所有工事，工农革命军和农军迅速占领了坪石圩的一大半街道。

胡凤璋见势不妙，率部分匪徒跑上中街地利公司楼顶的炮楼作垂死挣扎。

工农革命军和农军把胡凤璋重重包围。胡凤璋的大儿子胡汉南闻其父被困，率匪兵前来营救，行至坪石街附近的皈上岭，被工农革命军和农军阻击，胡汉南当场被击毙。匪兵们见状大惊失色，丢下胡汉南的尸体，纷纷仓惶逃窜。

此时，驻扎在坪石街二十里处的胡匪营长欧水发率队前来坪石增援，赶到坪石附近得知胡汉南送掉了性命，又见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封锁严密，不敢轻举妄动，躲进树林里。

事后，胡凤璋得知欧水发没有帮助攻打朱德部队的事时，给他定了一个“按兵不动，贪生怕死，贻误战机，见死不救”的罪名，枪毙于坪石胡凤璋司令部附近。

被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围困在炮楼的胡凤璋，依然命令部下死守炮楼，并说：“你们无论如何也要给我顶住，谁要是临阵脱逃，老子就枪毙他！”匪兵们不敢不依，只好拼命打

枪。

工农革命军和农军这次进攻坪石，持续激战了几天，沉重地打击了胡风璋匪部。当时，朱德考虑到工农革命军要北上郴州继续在湘南发动起义，还考虑到坪石胡风璋匪部主力大部已消灭，决定把工农革命军二十八团撤出坪石返回宜章，留下乐昌农军在坪石继续歼灭胡风璋残部。

随后，被困的胡风璋，趁工农革命军撤离坪石之机，在匪兵的掩护下，逃出炮楼离开坪石。农军见胡风璋逃跑，便结束了战斗。

（三）痛歼敌军许克祥部，赢得坪石大捷

宜章暴动的胜利，使蒋介石和湘粤两省的反动当局大为惊惧，“剿杀朱德部队”也成了反动派当时的“重要任务”。

湖南省主席、军阀何健奉蒋介石之命，调一个师的兵力进驻湘南郴县准备攻打宜章。广东省主席、军阀李济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时，觉得“切不可小睨宜章的事态，等闲视之，必后患无穷。”于是，他立即密电驻防粤北乐昌的国民党军独立三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把部队尽快移驻坪石。湘粤反动派企图形成南北夹攻宜章之势，一举消灭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

面对强敌的来犯，朱德与陈毅、王尔琢等领导人，对迎敌的战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当时，朱德指出：敌人兵力数倍于我们，武器装备精良，后方实力雄厚。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不可采取南昌起义军南征广东时那种硬拼的方法，同

敌人拼消耗。应该扬长避短，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打法，去战胜敌人。这一战略打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至赞同。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朱德等领导人还与中共宜章县委的领导人进行了商讨，作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实行战略转移，将工农革命军撤出宜章县城，在山区开展游击战，粉碎敌人进攻的战略决策。

1月21日，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率部主动撤出宜章县城。

第二天，湘军何健部詹筠松团进占宜章城，未遇工农革命军抵挡，便以为大功告成，于是以“克复宜章”为名向上级报功请赏。当时，何健唯恐军阀唐生智乘虚而入，命令该团撤出宜章回到衡阳驻守。由于何健的撤兵，使朱德部队减轻了北部的压力，更有利于集中兵力攻打南来之敌许克祥部。

朱德率部撤出宜章县城后，隐蔽在城西南几十公里内的碓石、黄沙、圣公坛、岩泉等一带山地，待机歼敌。期间，工农革命军一边争取时间休整，扩充兵源，一边发动群众，协助地方革命武装攻打地主豪绅和反动武装。另外，部队还派出人员到宜章周边和坪石附近侦察敌情，并在各处放出“工农革命军打回广东去了”的空气，以迷惑敌人。

许克祥，湖南湘乡人，1890年生，湖南讲武堂毕业后，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1927年5月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在反共反革命中立了功，升为师长，史称他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当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离开宜章县城不几天，许克祥奉李济深之命，率全师人马，从乐昌北上扑到宜章，企图剿灭工农

革命军。

许克祥来到宜章城不见工农革命军，担心朱德会不会搞“调虎离山”，去端自己的老窝坪石，立刻命令部队撤出县城，重新部署兵力：把指挥部设在坪石，留两个团驻守；将两个团成一字长蛇阵分布在坪石、长岗岭、武阳司、栗源一线；自己率另外两个团向岩泉进发，企图分几路寻找朱德部队，决一死战。

1月30日傍晚，朱德在圣公坛接到当地农民武装送来的情报：许克祥已到了岩泉，气焰十分嚣张。许克祥率两个团进驻岩泉后，不断派人四处打听工农革命军的行踪。由于当地群众不说实话，许克祥根本弄不清朱德的部队究竟躲在何处。于是，他又自吹自擂说：“自潮汕一战，朱德成了惊弓之鸟。他在宜章得手，是由于守兵麻痹受骗之故，非战之罪。当今我许某大军一到，朱德自知不是敌手，故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了。你有胆就把部队带出来，我就不相信我六个团，就打不过你一个团。”

其实，朱德率部撤离宜章县城后，通过各种方式，已了解到许克祥的兵力部署。当许克祥的兵力到达岩泉时，朱德连夜与陈毅、王尔琢以及宜章县委领导人研究进攻许克祥部的作战方案，一致认为歼灭许克祥部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是革命军经过休整，战士体质增强，士气高涨，而敌军连连扑空，锐气已减；二是许克祥部队摆成长蛇阵，有利于我军击其要害，进而各个击破；三是工农革命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地方党组织和强大的农军配合参战。于是决定先擒王，兵分两路，奇袭

岩泉，消灭敌军精锐，再猛打猛追，掀其老巢坪石。于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海率领，迂回敌后，阻击增援之敌，截断许克祥部的退路；另一路由朱德、陈毅率主力直捣岩泉，得手后两路军联合进攻坪石。

1月31日拂晓，朱德率工农革命军从圣公坛向岩泉圩出击，宜章县的工人纠察队及黄沙和筐篱等地的农军2000余人配合参战，乐昌坪石农军配合攻打许部的左翼。一小时后，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进入敌营周围，胡少海率领的一队革命军和农军也进入指定地点。

这时是早上8点，许克祥部早餐哨音刚叫响，朱德、陈毅率主力部队出其不意突然发起进攻，敌军阵营顿时大乱。胡少海、谭新率领的另一路队伍同时从侧面杀入敌军阵营，前来助战的农军同时在四面山上和圩内呐喊助威，燃放鞭炮助阵。顿时，岩泉圩内枪声大作，“杀”声冲天，正在吃早饭的许克祥部队突然间腹背受击，许部实力最强的贺国光团，很快被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击溃。

随即，许克祥率残部急忙抢占西南高地，一边与工农革命军对抗，一边仓惶地朝栗源方向溃逃。朱德按照原定的猛追猛打的作战方案，命令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

许克祥率残部逃至栗源，驻扎在栗源的许克祥的两个团匆忙赶来救援，遭到工农革命军和附近农民赤卫队以及坪石农军的重重包围和猛烈的攻击。许克祥见驻栗源的两个团死伤惨重，败局难挽，又率残部往武阳司、长岗岭方向逃跑。

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到武阳司河边时，朱德令部队和农

军在此宿营，一面总结当天作战的经验，一面部署第二天的作战方案。

此时，许克祥则在长岗岭聚集起溃逃的两个团兵力，欲与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决一死战，并狂言：“我退驻长岗岭，周围山岭丛叠，居高临下，你朱德想再来攻打，只有活活送死。”



坪石大捷老坪石武阳司战斗旧址

2月1日天刚亮，朱德在河边集结部队作战前动员。他说：“许克祥已退到河对面的长岗岭，想居高临下，阻止我军前进，我们要发扬昨天猛追猛打的作战精神，彻底消灭许克祥部。”接着，朱德和陈毅指挥工农革命军主力立即从武阳司过河，从正面大路向许克祥部发起强攻。

在这一带负责配合阻击敌人的乐昌农军，在李光中、李家泉的率领下，扛着土枪土炮一边沿路破坏许克祥部的运输线，一边协助工农革命军主力部队，进攻许克祥部。

许克祥部挡不住工农革命军和农军的凌厉攻势，很快就

慌忙后退。胡少海率领的一部工农革命军，在当地农民武装引领下，抄小路抢先占领长岗岭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向许克祥部展开猛烈的攻击。紧接着，工农革命军的主力 and 农军前后两面夹攻，迫使许克祥部逃退两难，被打死的官兵不计其数，残部四处夺路逃生。经过激战，许克祥的两个团几乎被工农革命军和农军歼灭，此时，许克祥设在坪石长岗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工农革命军和农军突破。



坪石大捷老坪石长岗岭战斗旧址

随后，许克祥率残部离开长岗岭往坪石逃跑，朱德命令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分三路追击。坪石和皈塘的农军以及部分民众，也拿起棍棒、柴刀、鱼叉、鸟枪等武器，在李光中和李家泉的组织 and 带领下，配合工农革命军追击许克祥部。

许克祥在逃往坪石途中，还派另一个团来增援，结果还

来不及摆开阵势，就被自己溃散而逃的人马冲乱。这时，王尔琢指挥部队从左右两侧迅速包抄过去，许克祥部无力抵抗，只好赶往坪石圩，企图与工农革命军和农军作最后一搏。

坪石是粤北重镇，为湘粤交通门户，许克祥的师部和教导团、补充团以及后方仓库就驻设在这里。

工农革命军和农军进入坪石，朱德立即命令部队抢占四面高地，迅速包围炮楼，向许克祥部发起猛攻。许部仓促应战，已是措手不及，一听八角楼方向枪声大作，都吓得丢魂落魄，只顾逃命，在溃逃中自相践踏，狼狈退出坪石，朝东南黄圃方向逃窜。

至此，在坪石的许克祥部又被工农革命军和农军摧毁。许克祥见大势已去，为保全性命，抛开卫兵，独自逃出坪石，跑到武水渡口，剥掉军装，换上便衣，跳上一条破旧的木船，顺着武水，往九峰方向逃跑。

战斗以工农革命军和农军的完全胜利而结束。战斗中捣毁了许克祥师部和后方仓库，俘虏许部官兵1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各式手枪100余支，重机枪10余挺，迫击炮、过山炮30余门，子弹1400多箱，马13匹，药品、被服不计其数。这就是史称著名的“坪石大捷”。

参战的工农革命军和农军战士在战斗结束时，编了首顺口溜唱道：“许克祥，好大方，乖乖送来炮和枪，不要收条不记账，当了运输大队长，革命人民心高兴，赏他个雅号‘许送枪’”。据当年跟随朱德上井冈山的一些老同志后来回忆，毛泽东诗词里头讲的“黄洋界上炮声隆”的那个炮，就是这次坪

石痛歼许克祥时的胜利品。

朱德一生打过不计其数的仗，而在坪石痛歼许克祥这一仗却给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事隔30年后的1962年，他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还能如数家珍地谈起当年追



“坪石大捷”缴获的迫击炮

歼许克祥的那种痛快淋漓的场面：“听说打许克祥，士气空前高昂，个个争先恐后。许克祥把他的五个团摆成一条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边走，一边打，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地都打烂了。”“这一仗打得很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还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朱德还风趣地说：是“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四）部署湘南总起义挥师北上

为了更好地在湘南广泛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朱德于坪石战斗胜利的当天晚上，在坪石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和发展问题。会上，朱德首先提出：要抓住机

会，抓紧扩大战果，立即挥师北上郴州、耒阳，发动湘南总起义。与会的同志对朱德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讨论。会议就湘南总暴动的几项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

（一）关于党政方面

1、普遍建立湘南各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

2、策动农民向地主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3、策动工人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而斗争。

4、普遍组织各职业工会，各县成立总工会以领导工人斗争。

5、保存党的地下组织，但须有部分党员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党的地位。

（二）关于军事方面

1、趁湘、桂军阀内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对北面取攻势，扫荡郴县、耒阳、永兴等县的敌军和民团，向衡阳游击，以开展苏维埃运动；对南取守势，以巩固宜章政权。

2、把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党代表龚楚）留守宜章，保卫胜利成果，发展革命形势，并监视坪石、韶关敌人的动态。工农革命



特别会议召开的老坪石圩
共和街78号旧址

军第一师向北发展，由朱德、陈毅指挥，乐昌独立营和俘获的许克祥士兵，全部编入胡少海的第三师。

（三）关于俘虏处置

1、立即由宜章人民团体发起进行慰问。

2、由工农革命军军政人员进行政治宣传，揭发敌军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发动俘虏检举潜在俘虏营内的敌军军官，并宣布我军宗旨。

3、由朱德对全体俘虏讲话，并宣布：愿参加革命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视。如要求回家者，给予必需的旅费遣返。

会议中的上述决策，成了尔后湘南总暴动的方针。

坪石特别会议，是决策湘南总起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湘南总起义作出了部署，指明了方向。没有这次会议，也就没有湘南总起义。

特别会议后的第二天，朱德在皈塘李氏祠堂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朱德作了今后斗争与发展的主题报告。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以及各省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整个局势动荡不安，这是我们力图发展的大好机会。



联席会议旧址

朱德高度评价了坪石战斗所取得的胜利，鼓励大家发扬坪石战斗的精神，为取得湘南总暴动的全面胜利而努力奋斗。他说：坪石这一仗，在政治上狠狠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在军事上打了个大胜仗，我们可以利用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壮大自己。早在打进宜章城时，“我们的人马不足两千，现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决心大干一场”，“实现整个湘南总暴动。”

坪石大捷，是在南昌起义军自广东潮汕失败后，余部在朱德率领下总结教训，改变战术，即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实行革命军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农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朱德称坪石“这一仗打得很好”，战斗中缴获到了许多武器装备，帮自己的部队“起了家”。因此，朱德在坪石战斗结束时，也认为很有必要对这一仗进行总结和庆祝，以这一仗的胜利，进一步鼓舞工农革命军和农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志，于是在联席会议结速时接着举行祝捷大会。

当时，坪石战斗虽然战胜了敌人，但坪石随时也可能有被敌人反攻的危险，而距离坪石15里的皈塘村，便是坪石农民运动较早的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地方较为隐蔽。于是，中共坪石支部的领导，向朱德建议，把部队转移到皈塘去，在那里举行祝捷大会。朱德同意了这一意见，于2月2日，率工农革命军以及参战的宜章和乐昌农军，离开坪石圩前往皈塘村，召开坪石战斗祝捷大会。对此，赵镕在《跟随朱德同志

从南昌到井冈山》中有过回忆：“当天下午就在这里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祝捷大会。四乡农民肩扛梭镖大刀，臂系红带子，昂首高歌进入会场，河边大草坪上坐满了黑压压一大片人群，大家出神地静听着朱德同志那动人的讲话。”



祝捷大会旧址

祝捷会上，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指出：坪石大捷，充分证明了反动派貌似强大，神气十足，但内部却很虚弱，它是可以被

打败的，而人民的力量是无限的，尤其是组织武装起来的革命力量更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这支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就是一支战斗力强、英勇善战的队伍。

接着，朱德不仅赞扬了工农革命军和农军在坪石战斗中的英勇奋战精神，还号召农友们继续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推翻反动政府，同时又对许克祥进行了嘲笑：“昔日屠杀工农，何等威风，今日却被我们打败还给我们送来大批枪和炮，成了‘许送枪’。”

会议最后，为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和乐昌土地革命以及武装斗争的需要，朱德根据中共坪石支部所提的“必须在坪石地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才能保卫已经取得的革命斗争胜利

果实”的意见，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乐昌独立营”。该营由乐昌坪石、皈塘的农军组成，李家泉任营长，李光中为党代表。

坪石大捷时，湖南湘军与桂军的混战依然未结束，湘南驻军还是空虚。于是，朱德决定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尽快在湘南发动起义。为此，在祝捷大会后接着召开工农革命军领导人与宜章、乐昌地方党组织干部和农军负责人联席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今后斗争与发展的主题报告。据赵镕后来在《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一文中回忆说，当时朱德在报告中指出：“要趁湘桂军阀内战争无暇南顾的时机，主力部队立即进军郴州、耒阳，全面发起湘南地区年关总暴动”。会议确立了在湘南总起义的总方针和行动步骤。会后第二天，朱德率部离开乐昌坪石的皈塘，向湘南郴州挺进，组织发动湘南总暴动。

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在湘南各地中共党组织和农军的配合下，朱德率部先后占领了郴州、永兴、资兴、耒阳等县。在桂阳、桂东、常宁、汝城、安仁、衡阳的大部分地区，也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革命风暴遍及20多个县，100余万人口，从而形成了湘南起义的高潮，有宜章等七个县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湘南苏维埃政府也建立起来，标志着整个湘南暴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8年3月初，粤、桂、湘三省之间的军阀混战结束，他们勾结起来镇压湘南暴动，从南、北、西三面对湘南地区实行联合“会剿”。

面对这种情况，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的湘南特委，为打破军阀的会剿和粉碎地主豪绅的破坏阴谋，实行“左”的烧杀政策，断送了湘南暴动的大好形势。对此，朱德后来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回忆说：湘南暴动时，“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了湘南。”

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决定率主力部队退出湘南，向江西井冈山地区转移，于同年4月28日，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砬市胜利会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来改为红四军），实行武装割据，开始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第二章

红四军、湘赣红四团游击韶关

(1929年1月和1930年4月)

广东仁化、南雄县位于粤湘赣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井冈山根据地和赣南苏区革命斗争向外发展的重要地区，受到红四军的关注。仁化暴动失败后的1928年底，仁化的革命斗争转为游击斗争，对此红四军极为重视，并在人力、物力给予支持。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向外扩大发展红色区域，1929年初和1930年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先后两次游击南雄，打击敌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筹措给养等活动，对扩大红军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推动地方武装斗争，使南雄县成为中央苏区，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红四军游击南雄经过的梅岭关楼

一、支持仁化游击斗争

仁化县地处粤、湘、赣“鸡鸣三省闻”的广东北部边陲，与湘南汝城、赣西崇义交界，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井冈山根据地向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1928年上半年至1929年秋，仁化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建立健全，以及游击斗争的开展，深受上级党组织和红四军的关注和支持。

1928年3月至1929年9月，中共北江特委、中共广东省委多次发出指示，要求仁化党组织注重加强与南昌起义军和工农红军第四军，以及赣南特委的联系和沟通，建立通往汝城、乐昌、南雄和赣南的交通线。期间，仁化地方党组织与红四军取得了联系，有力地推动仁化游击斗争的开展。

1928年仁化暴动失利后，担任仁化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蔡卓文，带领工农革命军仁化独立四团的队员，前往仁化董塘渐溪山开展游击斗争，并与红四军军长朱德取得联系，得到了朱德鼓励和支持。同年9月，朱德派出使者到渐溪山联络仁化县委。据1928年10月29日《中共北江特委将仁化县报告转告省委——仁化石塘被围攻及与朱德同志联系情况》文中记载：

“朱德现在江西遂川，已派人来找我们，指定胡螯与龚楚带武装六百多杆，在桂东南洞等待我们报告情形即马上来仁，并指定工农革命军第十一师到坪石一带，叫我们将广州状况报告他好定计划南下。”“朱已派人来找我们，同时又派人去通知欧日章，叫我们部队无论如何不可解散灰心”。欧日章受中共广

东省委和红四军前委指派前来渐溪山游击区指导工作，主持改选成立新的中共仁化县委和革命委员会，选举蔡卓文为县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刘振平、谭熙亭、谭昭沅、谭日升、谭世宗等为县委委员。中共仁化县委进一步的健全，对仁化游击斗争的领导和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年底，渐溪山的游击队，从10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

随后，红四军派李立基和军代表徐敦（徐鼎）到渐溪山。徐鼎传达了苏区党和中央红军对仁化的深切关怀。根据红四军前委指示，将驻渐溪山的广东省工农革命军北路赤卫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独立团。由蔡卓文、刘振平、李载基、李立基等担任领导，徐敦指导全团工作。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独立团成立，成为广东省第一支成建制的红军^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独立团成立后，在粤湘赣边坚持游击斗争。

独立团成立之初，出发到湖南汝城，攻打汝城南乡大村，抓到了国民党乡联防团头子朱百万，勒令他交出银子2000两。第四独立团回师途中，又袭击了国民党第十六军的一部分，俘获敌军排长一人。根据群众的要求，第四独立团在渐溪山一带先后惩办了五文乡恶霸地主数人。由于敌强我弱，部队化整为零，大部分随徐敦转移与红四军会合，部分留在渐溪山游击区。

^①仁化县史志办公室编著《红军与仁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5月版，第35页。

1929年2月，广东北江办事处主任欧日章率领第四独立



淞溪山游击根据地所在地

团红军40多人撤往曲江县西水一带进行游击活动。3月11日，第四独立团一部几十人转移到周田灵溪山、长连山（原属曲江，现属仁化）一带活动，在关屋背崩江，惨遭国民党军第十五军补充团第三营第七连袭击，血战两小时，红军牺牲10余人，然后向深山撤退。4月，第四独立团在周田的鸡笼、新庄、水地遭遇国民党一个连的军队，即时发生激烈的战斗，战至中午，敌被击退。红军谭东芹等2人牺牲，4人受伤。4月至6月间，红军一部在灵溪山游击活动中，先后在鸡笼、新庄、水地、上道罗坑、枫湾、三斤塘、坝子墩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13次，缴获敌人步枪9支，手榴弹10个，红军邹倍胜、谭朝仔等3人牺牲，伤4人。战至1929年秋，第四独立团分散转移至南雄县、曲江县、乐昌县、湖南汝城、江西崇义等地游击。

1930年2月至3月，刘振平等重新恢复仁化游击队，在淞

溪山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第四独立团坚持斗争到1930年春夏，由于敌强我弱，处境十分困难，红军第四独立团研究决定，将部队分散，转入地下活动，坚持斗争。

二、粉碎“会剿”，红四军游击南雄

（一）红四军游击赣南转战南雄

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赣军先后三次进行“进剿”，都被红军粉碎，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7月初至11月初，国民党纠集湘、赣两省大批军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两次“会剿”。朱德和毛泽东在认真总结敌军第一次“会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后，组织红军抗击，粉碎了敌军第二次“会剿”的计划，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得到恢复，改变了八月以来的不利局面。12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八百余人，转战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从而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惊恐万状，蒋介石电令湘、赣两省组织六个旅三万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军事“会剿”，于次年初分五路进攻井冈山，企图消灭红军。

在国民党重重包围中，红军物资贫乏，经济极其困难。为粉碎国民党军“会剿”解井冈山之围，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以及红四、红五军代表联席会议。



“柏露会议”旧址

会议传达和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六大”决议案，并决定取消红五军番号，将已到达井冈山的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四团（对外仍称“红五军”），还决定以“攻势的防御”方针，将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和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第三次“会剿”结合起来，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突围，由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到外线牵制、打击敌人，并相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四团留守井冈山，巩固边界政权，万一井冈山被敌突破，则突围出击与红四军主力取得联系。

1月14日，朱德与毛泽东率红四军军部、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特务营、独立营3600余人，从井冈山茨坪、小行湖出发，取道遂川的大汾、左安向赣南大余出击，以开辟和扩大

根据地。1月22日，红四军占领大余县城。24日拂晓，国民党军金汉鼎、李文彬和刘士毅三个团向大余逼近。红四军在朱德的指挥下，在金连山、东山岭阻击来敌，激战一天，仍未能打退敌人进攻。为了保存实力，红四军前委决定部队分两路边打边往南雄油山方向转移。

决定作出后，前委书记毛泽东率红四军一部，向南雄的上、下杨梅和邓坊往大塘方向转移。部队行至梅岭角湾村与敌人相遇，经过短促的战斗，打退了阻击的敌人，然后取道东山岭背、黄坑、上下杨梅，直下小梅关、东山门、钟鼓岩，向东经邓坊的蓝田、益田，到达油山的茶田，占领了十里岭，对占据在白石埂的敌军形成了包围，击败敌人的一个团。



朱德在南雄上朔村住过的房（彭忠妹家）

朱德在南雄上朔村住过的房（彭忠妹家）

朱德率领部队绕过了水坑，占领了过水坑与坪田坳之间一座更

朱德率领的另一支红四军部队，从江西大余经南雄广亭坑、上兰田、下兰田到达油山寨下、上朔村宿营。

敌军李振球团长获悉红四军已向南雄油山转移的情况后，为防止红军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在广东发展根据地，便率领一团兵力抢先占领红军必经之地——南雄油山坪田坳的大石埂，企图以一条旧壕沟为阵地，伏击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堵截并消灭敌人，25日凌晨，

高的山头，反将敌人团团包围，随即居高临下，与敌人展开激战。战至中午，敌人不支，纷纷潜逃，红军获胜，收缴到一批武器。



坪田坳大石埂战斗的旧址

大石埂战斗结束后，朱德率领部队赶到夹河口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队伍会合。随后，一同经上朔到达锦坡，前往乌迳，一边休整，一边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然后，红四军在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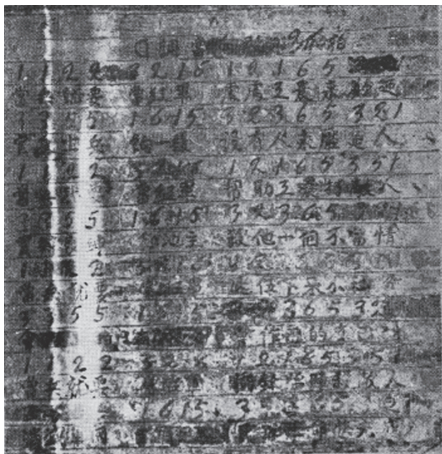
朱德的率领下离开乌迳，经官门楼、界址圩，挥师北上，向赣南信丰挺进。

朱德、毛泽东这次率领红四军进入粤北南雄开展游击战争，受到了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关注。当年5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就红四军工作给毛泽东、朱德去信，赞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冲破敌人围攻的战斗精神，并认为红军这次进入粤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力量”的做法是对的，是有利的。还希望红军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取得更多的经验和胜利。

（二）开展革命宣传，支持地方武装斗争

红四军这次游击南雄非常注重革命宣传工作，对地方游击斗争也大力支持。红四军到达油山寨下、上朔等村宿营

时，便立即到村中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宣传红军队伍的性质，号召群众加入红军参加武装斗争。至今，上朔村一祠堂门的墙上，还留存着红军开展革命宣传的《当红军歌》标语：



录文：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饷一样，没有谁来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买办豪绅和地主，杀他一个不留情；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愁贫，会做工的有工做，会作田的有田耕；当兵就要当红军，冲锋陷阵杀敌人，消灭军阀和地主，民族革命快完成。

红四军来到锦陂时，又在村中开展宣传工作。当时，毛泽东看到村里房屋被烧毁了，问群众说：“你们这地方是谁烧的？”群众说是国民党军队烧的。毛泽东说：“以后要国民党还债。”当时，红四军在井湾村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朱德讲了话，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毛泽东在会上说：“穷人要闹革命，红军也是穷人，要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我们穷人才有饭吃，才有衣穿”。为了帮助当地赤卫队发展，在开完群众大会后，朱德在红军中拿出10支枪送给井湾赤卫队。次日，毛泽东、朱德又

在下锦陂与部分群众座谈，开展宣传工作，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然后朱德给下锦陂赤卫队送了4支枪。

红四军离开锦陂后，来到乌迳桥渡安及附近的黄木岭宿营。当晚，闻讯赶来支持红军的中共南雄县委及游击队领导也到达黄木岭，与红四军会合，这是毛泽



红四军在黄木岭召开群众大会旧址

东、朱德与南雄县委的首次接触。在此，红四军与南雄县委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在会上分别讲了话，宣传土地革命主张，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支持南雄地方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在群众大会结束后，朱德决定将五响步枪10支和子弹一批，送给南雄县委。当时，毛泽东还专门对南雄县委的同志说：要大力发展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

（三）县委提供情报红军化险为夷

红四军这次游击南雄，得到了中共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和群众的大力配合和支持。

红四军游击南雄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纪律严明，秋毫无

犯，深受群众的赞许和支持。红军所到之处，许多民众纷纷给红军送去蔬菜、柴火和铺草，有的民众还把家里的水桶、盆、勺、碗等生活用品送去红军使用，还有的民众把空屋、柴房、碓屋等闲着的房子让给红军住缩。

朱德率红军一部在攻打油山坪田坳大石埂时，油山游击队和上朔赤卫队，在南雄县委委员、县第六区苏维埃常务委员彭显模的率领下，与红军一道抢战十里岭，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击溃粤敌一个团，取得战斗胜利。

彭显模，1903年生，南雄油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任中共南雄县委委员，1928年2月组织南雄农暴，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委员。1929年1月任赣南西河行动委员会委员，11月任南雄县委书记。1930年后在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被害。新中国建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大石埂战斗胜利后，彭显模和上朔村彭周华、彭毅皮等赤卫队员，配合红军游击锦陂、乌迳等地。途中，不仅为红军当向导，还组织游击队和民众救护红军伤员，有的民众自制担架运送红军伤员。

值得一提的是，南雄县委提供重要情报，使红四军化险为夷。

4月25日，红四军从锦陂转移到乌迳，在桥渡安村和黄木岭宿营，当天晚上红四军与中共南雄县召开群众大会。会后，经过两天连续行军作战的红四军由于十分疲惫，很快就安排休息。此时，粤军兵分两路向红四军驻地黄木岭逼近，企图围歼红军。

这一危及红军的险情，被南雄县委派去侦察敌情的游击队干部钟蛟蟠获悉，立即与县委的领导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毛泽东、朱德立即作出决定，率红四军撤离乌迳，经界址向江西信丰转移。红四军撤离乌迳后的30分钟，敌军包围了黄木岭。南雄县委及时提供的情报，使红四军化险为夷，为保护红四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此，后来出版的《朱德自述》就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在乌迳遇了很大的危险。我走江西一面赶到这里会合。那是一处有很大树林的田坝子。一路上遭受着敌人的截堵。处处打仗，没有一点地方不是。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

红军此次游击南雄转战乌迳，面临敌军包围，化险为夷，钟蛟蟠是立了大功的。1939年，钟蛟蟠牺牲时，中央军委肖向荣在悼念钟蛟蟠烈士的文章中也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这是钟蛟蟠在斗争经历上，比较显著的一件不可磨灭的功绩。”

钟蛟蟠，1899年生，南雄珠玑人。1921年在当地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参加当地农民暴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后加入南雄游击队、红军二十六纵队，参加一、二、三次反“围剿”、水口战役、长征，1939年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遭日军轰炸而光荣牺牲。

三、“发展苏区”，红四军进攻南雄县城

（一）红四军进攻南雄城的历史背景

1930年1月初，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共十四个团，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据此，朱德与毛泽东确定利用三省军队之间矛盾，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计划。1月9日，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由连城进入宁化。在此缴获敌金汉鼎通令，得知敌军这次“会剿”方略为以十二团兵力分作七路围攻新泉后，决定撤离闽西，向江西急进，以“打通闽赣粤三角联系，扩大闽西赤色区域”。随后，朱德率部进入江西。1月下旬，朱德出席在东韶召开的中央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毛泽东决定立即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2月下旬，朱德与毛泽东指挥红四军，于吉安、吉水一带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歼灭该敌大部，俘虏1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取得了古田会议后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

3月上旬，蒋介石与阎锡山发生战争，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松“剿共”，并电令张辉瓒任江西“剿匪”总指挥，“所有

驻赣部队概归节制”。当时，江西全省只在吉安、吉水、永丰一带驻有国民党成关耀、朱耀华、邓英3个旅及唐云山残部，而驻地赣南的国民党金汉鼎师已开往福建，企图和刘和鼎师夹击卢兴邦部，进占福州，因而出现赣南、闽西空虚。

据此，毛泽东、朱德于3月18日，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并发出《前委通告（第三号）》，决定利用“赣南、闽西空虚”之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并要求红四、红五和红六军以三个月为期，分别在赣南、赣西、闽西等地游击，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通告还对分兵游击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3月20日，毛泽东、朱德根据《前委通告》第三号的分兵计划，率红四军军部和第一、第二、第四纵队，由赣州城向赣南南康县唐江镇开进，国民党地方团队闻风而逃，红四军于3月23日、25日，先后攻克南康县城和大余县城。

3月27日至30日，红军前委书记与朱德在大余县老东门外省立第十三中学校内召开的信丰、南康、广东南雄三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和大余、信丰、南康、崇义、上犹、南雄等县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

27日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贯彻《前委通告》第三号精神，决定28至30日召开西河六县党组织活动分子会议（亦称西河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西河行动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和指挥六县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为扩大革命武装，决定将地方党领导的分散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组建

成西河片区地方红军部队——红二十六纵队；还决定在群众基础和革命环境较好的地方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动员报告并部署了工作。会上，朱德就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发表讲话。会后，红四军将100多支步枪和子弹一批，发给南雄、信丰、南康三县游击队。

南雄县委书记彭显模参加了上述两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西河行动委员会委员。南雄县游击队编入为红二十六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杨白，政委邓事谦。钟蛟蟠任红二十六纵队政治处宣传科科长。从此，南雄县成为赣西南苏区，后来很快又成为中央苏区县。

4月1日凌晨，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大余县城，由南雄游击队中队长彭吉妹带路，越过江西与广东交界的梅关，向南雄进军。

红四军占领大余时，国民党南雄县长梅翊翔惊恐红军攻占南雄，急忙赶到韶关请援兵。国民党即派六十三师教导团吴文献团的两个营开抵南雄：一营驻扎在梅岭新路口一带；另一营驻扎在县城守防。红四军早有准备，天刚蒙蒙亮就包围了驻在新路口的那个营，并很快将其击溃，几乎全营被俘，缴获长短枪数百支。吴文献听到驻守新路口的营被红军包围的消息，急忙调守城的营去支援，结果在珠玑的石子岭，又被红军击溃成了俘虏。随即，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开拔，于下午5时许，又击败守城的敌军，占领南雄县城。

事后的1994年3月7日，肖克上将到南雄视察时，曾回忆



红四军占领南雄的老县城旧貌

当年攻打吴文献团两个营的战事，他说：我们在南雄“一天两仗一百里”，“一天”是指4月1日那天，“两仗”是指在新路口和石子岭打的两仗，从江西大余走到南雄作战的地方正好是“一百里”。



红四军政治部驻地旧址
(今雄州八一街)

红四军占领南雄县城后，军部设在上武庙，朱德也驻在这里，部队多数驻在宾阳门外，政治部设在东门外振昌杂货店（今雄州八一街），毛泽东也居住在这里。

红四军驻扎在南雄县城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群众的爱戴。群众纷纷把家

中用品送去红军使用。

此次红四军游击南雄，引起了中共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当年4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致信北江，要求各县“加紧发动群众斗争和游击战争”，配合红四军的军事行动，开展各县武装斗争。

（二）攻占南雄城进行的几项重要活动

根据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根据地和地方武装的需要，红四军占领南雄县城一个星期，进行了如下几项重要活动。

第一，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参加武装斗争。红四军在县城，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和“明买明卖、公平交易”、“老百姓不要怕，大家开门营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红军官兵待遇一致”、“欢迎加入红军”等标语。

在县城下武庙（今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孔圣庙等处一连三天召开群众大会。朱德、毛泽东、陈毅在会上分别讲了话，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革命的目的，动员群众组织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动员和号召青年参加红军。黄苹将军就是那时参加红军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风趣地告诉大家：

“你们经常讲朱毛红军，朱毛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现在我告诉大家，朱毛是两个人，朱是朱德，毛是我毛泽东。我们是红军第四军，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是打帝国主义、打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是人民的军队”。朱德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进城是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反动军队，红

军是为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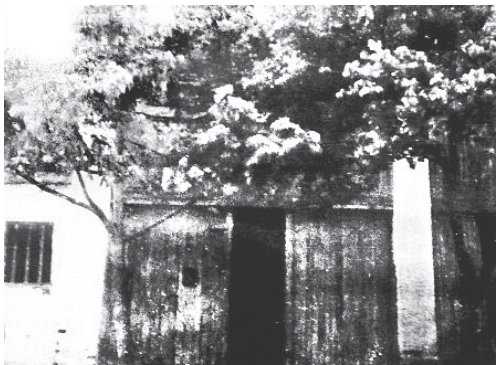


群众大会旧址之一：县城下武庙

第二，筹措给养，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新的筹款政策。红军在县城筹措给养时，积极向商人做好筹款新政策的宣传工作。对城中中小商人免于缴纳，只收缴了6户反动豪绅的财物，筹现款4万元。关于红四军在南雄筹措给养、实行保护中小商人新的筹款政策，1935年1月的《红军第四军状况》（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文有如下的记述：

对城市中小商人，现在已另订了政策。过去城市每一千以下资本的不筹，现在改了，规定每二千元以下的不筹款，二千元以上的按累进比例收。如三千元的筹三十元。四千元的除三十元外再筹他四千元资本的百分之一四十元，合为七十元。五千

元的除筹七十元外，再筹他五千元资本的百分之一五十元，合为一百二十元。余进千的即除累进的花费外，再筹他资本总数的百分之一，余类推。这种办法是适用于内地中小城市。我们这次到大余、南雄都是照这样筹的。



红四军部旧址和举行训话会的地方

第三，宣布红军对待俘虏的制度和办法。红四军占领南雄县城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把俘虏过来的900名敌军，集中在县城关帝庙（今八一路八一小学

内）举行训话会，^①宣布红军“不枪毙逃兵的制度以及以准假回家的办法”。大致内容：一是对逃兵不枪毙；二是对动摇的士兵可以让他“请假”回去，并发给路费。告诉他们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回家或参加农会工作，或做士兵运动，临走时由士兵会专门开会欢送。会后，不少被俘虏士兵要求留下来当红

^①林鸿暖、黎惠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毛红军第四次到粤北活动的调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8页。

军。这一“制度”和“办法”，在“古田会议”前后，红四军就已制定传开，但不敢公开宣布，而红四军到了南雄才公开宣布。

红四军制定和实行对待俘虏的制度与办法的过程，1930年5月的《红军第四军状况》（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文有如下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述：

第二是不枪毙逃兵的来源，是因为从梅县之后，卢新铭部俘虏来的士兵，天天开小差，我们无法，也常常捉来枪毙。每次出发的差不多都要枪毙些逃兵，摆在路上示众，但逃兵仍然无法遏止。同时我们看见很多士兵要逃跑，是因为请不准假才逃跑的。有许多跑回去仍然没有出路，跑到白军去，更是没出路，在红军中过惯了自由的生活，在白军去受不惯那种压迫，想回红军来又不敢回来。反之有许多请假回去的士兵，他过一时期还另外带一些士兵同来了。纵不回来，假如我们红军开到那里去，他就立刻出来见我们，报告消息。如果他是逃回去的，再不敢见我们的面了。因此我们觉得对于那些动摇的士兵，可以让他请假回去，逃跑的士兵也不枪毙他。遂定下不枪毙逃兵条规数条，在理论上也是说明枪毙逃兵是封建制度，是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我们对士兵应该是让他自觉的来当红军，绝不要免（勉）强。凡要请短或长假回家的，先宣

传他，劝他不必回去，如果劝不听时，就准他的假，并给他的路费，告诉他的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回家去作工作，或农民运动，甚至兵士运动，并开士兵会欢送请假回家的士兵。其次是捉到的逃兵，不但不枪毙他，仍旧给钱给他送他回去。同时如果是拖枪逃跑的，看他是把枪拖到什么地方，如果是拖到赤色区域，仍然是没有死罪。其次如果拖枪到敌人那边或去当土匪时，我们就当他是反革命论罪，不在逃兵之例〔列〕。这样决定之后，在群众中有了极大的影响，逃兵也减少了。他如果想走的，可以请假回去。但是下级官长及下级党部甚至一些上级同志，仍然不敢公开宣传说不枪毙逃兵。虽然这种决定已经在士兵中传遍了，但仍然怕在军队中公开宣布，许多同志总以为宣布了，恐怕士兵都要回去，都要逃跑。前委军委经过了很久的斗争，才克服了这些同志，最近在南雄才公开宣布了不枪毙逃兵制度，及可以准假回家的办法。士兵都非常快活，非常赞成，并没有像有些同志的设想，以为宣布后士兵会走一大半。

红四军对待俘虏的制度和办法在南雄的宣布与实施，对后来壮大红军队伍和瓦解敌军均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四，制订了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利用金汉鼎部发生兵变之机，红四军逐渐移师信丰，准备再入于都与红四军

第三纵队会合，并集合红六军第二纵队一同入东江。如不能入于都，则仍照计划至安远、寻乌工作一时期，把寻乌红色区域扩大到安远，使与于都相连接。

第五，烧毁了国民党县政府，抓了一名民愤极大的警察巡官游街示众并将其枪决，打开国民党监牢释放被押的政治犯。

红四军占领南雄县城后，已达到了消灭敌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制定好下一步军事计划的目的，4月7日，红四军离开南雄，向江西信丰进发。当时，南雄游击队主力也随红四军前往信丰活动。在此之前，中共南雄县委组织游击队攻克了雄、信道路的重镇——乌迳圩，迎接红四军过信丰。

4月10日，红四军攻占信丰县城，随后红军接连占领赣南的大部分县，取得了打通赣闽粤红色区域联系起来的胜利，为建立中央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湘赣红四团游击连县、乐昌

1934年春，湘赣苏区派由李宗保为团长、周汉杰为政委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简称红四团），前往湘南、粤北边境开辟根据地，辗转于桂阳、临武和连县一带。

红四团从宜章进入连县，震动了广东国民党当局，派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急赶连县，并急令连县沿途区乡严密防堵，控制交通要道，配合“清剿”。是年3月底，

红四团在宜（章）、连（县）边两广圩被湘南第八区保安团欧冠部截阻，激战几小时后，红四团300余人摆脱湘敌，挺进连县山洲、观头洞，来到荒唐坪圩宿营，团部设在街中段的欧其记家。次日，部队向天光山方向开进，途中在磊角岭处决了在押的三个土豪劣绅。接着，部队先后到达田家乡的敬坳和周家岱，扫荡乡丁，入村收缴土豪枪枝一批，捕捉土豪劣绅七人。



红四团在周家岱村活动和战斗的旧址

不久，粤敌三师在连县警卫队引导下，从姜田、盘海向红四团追击，双方冒雨交火，红四团在大雾掩护下边打边撤，迅速抢占七里练高地，经两小时激战，击溃追敌，随后，红四团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向西进入天光山的梅树冲和板寮一带。

红四团在连县天光山地区多次挫败保安团和粤敌独立三师的“进剿”，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据当年《湖南大公报》报道，临武县县长杨闾宣为之叹曰：天光山“百余

里，形势险要，为临武、星子、蓝山交界之区，若不积极清剿，以绝匪株（编者按：原文如此），实湘粤边境各县心复之患也。……该匪凭险固守，顽强抵抗，我军官兵相机截剿，仍疲于奔命。”

红四团进入连县后的数月里，李林领导的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加入改编为第一营，活动于梅树、天光山、板寮等地的20多个村寨，中共湘粤边工委在当地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为建立游击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也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

为了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在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支持配合下，在险要地域修筑工事。为了扩充部队的力量，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配合下，对活动于当地的邓石喜土匪武装开展统战工作，对其进行改造。为了筹备粮饷和弹药，派人员到县城购买武器。

在开展土地革命中，广泛组织发动民众，惩办土豪劣绅。红四团进入山河、田家和洛阳各乡，根据群众举报，惩罚土豪富户，没收粮食，为民除害。在荒塘坪赶往敬母坳途中于磊角岭将保安团特务长、反共义勇队分队长、甲长等反动官员加以处决。在敬母坳、周家岱打破敌人封锁，在保公所查出户籍田亩册，捉获富户多名，令其交出钱粮和牛猪，并警告他们弃恶从善。

为开展革命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红四团沿途经过各村寨，均写标语、发传单、贴布告，宣传革命道理。在荒塘坪、李仔树脚和南门水写的标语内容有“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红军官兵不打人！”在敬母坳写的标语内

容有“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穷人不打穷人！”“实行土地革命，收缴地主武装！”在周家岱写的标语内容有“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保障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等等。

红四团游击连县时，纪律严明，不扰群众，深受群众的支持。部队到荒塘坪当天正逢圩日，战士们在圩场对人和气，买卖公平。部队经过村庄田野，凡吃了农民的红薯、芋头，烧了柴草都给钱。在敬母坳，因焚烧田亩册引起火灾，红军战士协助群众救火。部队在各村寨宿营临走时，都清扫住地，检查所借群众物品，损坏的赔偿。当时群众感慨地说：

“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部队一到荒塘坪、周家岱等村，农民纷纷拿出房子让红军住。红军在敬母坳时，长工唐亚旺主动协助红军打开门楼和闸门，迎接部队进村收缴地主武装，没收地主的田亩册。红军路过不少村庄，当地民众带路送信。周家岱战斗后，当地农民李茂太、唐亚喜等主动安葬牺牲的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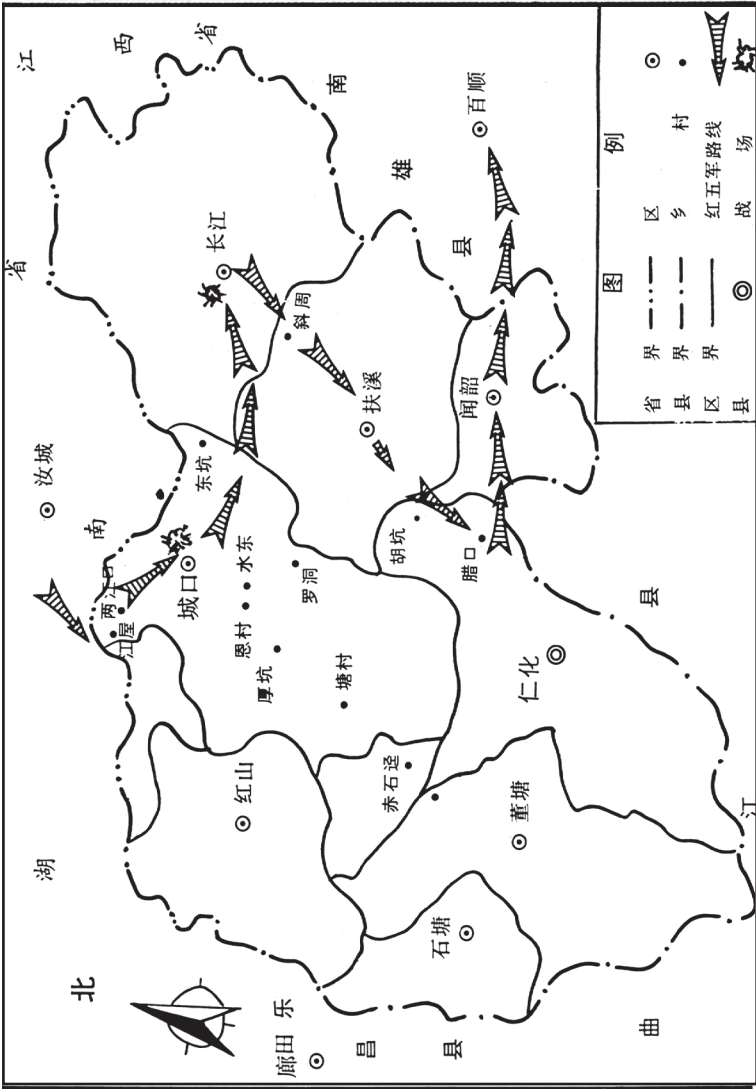
同年7月后，红四团为扩大湘粤根据地，转战湘南宜章和粤北乐昌等地。红四团有70余人转移到乐昌的瓦屋场一带活动时，于7月30日与敌激战3个多小时，打退了前来进剿的敌人。随后，部队为了整休，保存革命力量，撤退到宜章五盖山，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第三章

红五军、红三军团转战仁化、南雄

(1929年5月—6月；1932年4月—5月)

1929年5月下旬至6月初，红五军根据本军委和湘赣边特委关于“向外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的决定，由井冈山挺进湘南向粤北仁化、南雄县游击。1932年4月下旬至5月初，红三军团（亦称西路军）担负着“江口会议”赋予的分兵占领犹崇西进湘南粤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湘赣苏区、使之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的任务，游击粤北仁化县。红五军、红三军团游击仁化、南雄，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在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和民众的大力配合下，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还筹措了一定数量的现款和一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对发展红军队伍、巩固红色区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红五军转战仁化示意图

一、“向外发展”，红五军游击仁化

（一）红五军游击仁化的背景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向井冈山发起进攻。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率领井冈山军民奋力抵抗，因敌众我寡，井冈山根据地被敌占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滕代远按照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决定，率红五军主力500余人向遂川突围，然后转向赣南游击。4月1日，红五军与红四军在瑞金会合。

4月11日，红四军前委与中共赣南特委在于都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部打回井冈山的意见。红五军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于4月底回到井冈山。

在于都得到补充的红五军回到井冈山后，与留守黄洋界的大队李灿、张纯清部以及王佐部队会合一起，消灭地主武装，恢复了革命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访贫问苦活动，救济难民，发动群众，恢复生产，使井冈山恢复了生机。但是，井冈山被敌军摧残严重，特别是在敌军撤退时，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造成缺粮、缺盐、缺药，供给极为困难，严重危及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据此，红五军军委和中共湘赣特委，于5月10日制定了“向外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的方针，以充实红五军的力量，补充供给，巩固湘赣根据地。

5月中旬，彭德怀遵照中共湘赣特委决定和红四军前委关于“乘机至湘南工作”的指示精神，率领红五军主力1000多人离开井冈山去湘南、粤北开展游击活动。他们在湘南连续攻克桂东、桂阳（今汝城县，下同）等地，营救出被国民党关押的大批革命群众，帮助恢复了工会、农会组织。随后，于20日由桂阳出发，首次进到广东省仁化县城口圩。是日下午4时，阴雨绵绵，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到达城口圩北郊时，恰逢地方反动武装都去仙店送葬，圩内空虚，于是迅速抢占了国民党城口区政府、公安局、商团部。23日，为了甩掉湘南胡凤璋匪帮的追击，保存实力，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动撤出城口，经半奢水、老屋、坳背、浒松、沙坪，进占长江墟。27日，又撤离长江，经斜周，占领扶溪墟。28日，撤离扶溪，经白石岭、胡坑到达腊口，欲向仁化县城进军，但闻县城驻有敌军，故改道东进，经闻韶，向南雄进发。



红五军攻占腊口的炮楼遗址



闻韶的临时指挥部旧址——下徐营盘

红五军这次“向外发展”游击仁化，其目的和意图，不仅仅是为了摆脱部队在井冈山的经济危机，扩充力量，补

充供给，“在发展中巩固苏区”，还想在“向外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其路线和地域。红五军认为仁化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试图将仁化作为关系湘鄂赣闽革命前途，保障夺取粤闽革命胜利的关键塞口。对此，1929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曾有如下的记述：

中国革命，在地势上文化上，就现在的革命情形上，都已形成向南渐北的趋势，我们为响应这个趋势，必须先准备力量夺取粤闽为根据地，便于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才能很快的促成中国革命，同时我们为保护和巩固割据的胜利起见，务须先将割据地的周围的工作做好才行。因此有下列建议：

（1）赣委应注意发展萍乡、袁州的组织，尤其是萍袁之间的宜丰、芦溪（宜芦已有小组织）一带，因该地为赣北赣西交通之要津，亦为赣北赣西党所联系的咽喉。赣南之上犹、崇义（已有县委、共六支部）、大余亦须注意发展，该数县与粤北之仁化、南雄的党为取联络上必经之路，只要把这个区域内的工作发展了，就可从鄂南之通山、通城，赣北之铜、修、万以及赣西之莲、永、宁与赣南之信丰、兴国、崇义等数十县都可取得直接的亲密联系，进一步与赣东的党和红军取得联络，形成对南昌的大包围，另一方面可与粤北之仁化、南雄以及闽之长汀等县都可发生关系（2）湘委应迅速派人恢复湖（湘）南工作，与韶关仁化取得联络，因这

区域是湘、鄂、赣、闽革命前途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亦是保障所拟先期夺取粤闽胜利的塞口。

当时，红五军还计划“军拟留一个纵队和赤卫队集中在湘鄂赣边作盘旋式的游击，其余各队在湖南之桂东、桂阳、资兴、永兴，与赣南之上犹、崇义、大余一带发展组织，并与广东之仁化、南雄、韶关取联络，进一步与四军相呼应。”

（二）筹措军需开展革命宣传

筹措军需，补充供给，增强部队的实力，是红五军游击仁化的重要任务之一。红五军在仁化游击活动，时间虽不长，只有9天，缴获商团枪械200余支，子弹3万发，没收豪绅粮油一批，筹款3万余元，购买盐、布和药品一大批，还吸收了一批赤卫队员参加红军。关于红五军在仁化筹措军需之事，历史文献曾有记载。1929年6月15日《申报》报道：“彭德怀所率共军工农红军第五军遭第七师和第十二师打击后已撤离崇义、上犹县，转入湖南汝城一带活动”。“五月中



红五军物资采购地旧址之一——城口老盐街

旬，彭德怀越过广东省界，占领仁化县的城口地区。该部仅有七八百人，四五百支枪，弹药也已耗尽。但该部又在城口缴获民团手枪二三百支和子弹五十箱，而且扩

充了人数”。

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彭德怀部……在（仁化）城口得商团械两百余，在南雄得商团械三百左右，……该部实力已增加四倍左右。”

《彭德怀自述》也有如此的记述：“攻克两城（酃县、桂东）除救出在狱同志外，缴获物资不多。故又决定袭占广东境内之城口。城口是广东省向湘东南出口之小商埠，有三、四百户，在城口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三万发，筹款约三万元。打听到南雄无正规守军，又决定夺取南雄。占领五天。在城口与南雄买了大批药品及盐布，特别是奎宁（治疟疾特效）和阿德林。”

红五军游击仁化，不仅筹措军需，还沿途开展革命宣传、发动群众等活动。

红五军游击仁化时，分别在城口、长江墟的大戏台、扶溪墟的樟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



红五军在扶溪召开群众大会旧址——樟树下

军是人民的部队，是为人民翻身解放而战斗的。彭德怀还在长江的老戏台和扶溪樟头下河坝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宣传红军部队的性质和宗旨、纪律，号召群众拿起武器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开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打倒土豪劣绅、恶霸的斗争。经过红五军的宣传，仁化赤卫队员谭世宗等一批革命青年参加红五军队伍。

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在城口三角坪枪决了三名罪大恶极的恶霸，斗争了一批土豪劣绅，把没收得来的粮食、煤油、糖等，分给劳苦群众。

红五军在仁化特别注重对地方党组织进行宣传。据1929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所述，当红五军了解到仁化县委有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的情况后，便把党中央“六大”有关决议案翻印发给县委的同志，并组织他们认真学习，详细讨论，以肃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在红五军的宣传帮助下，县委检讨了过去“左”倾盲动的表现，承认了错误，从而坚定了贯彻执行“六大”《决议》的信心。

（三）铁的纪律温暖百姓心

红五军游击仁化期间，纪律严明，沿街住宿，每到一个地方，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挑水、搞卫生，与群众谈心。红军吃了居民的粮食和菜，烧了居民的柴，都按当时市价付了银元；借了群众的门板等都清还，损坏的都赔偿，而且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群众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当地至今还传颂着许多红军爱民的感人故事：

故事一：拒绝谢礼

红五军占领城口后，把捉拿的匪首蔡阎王等人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审。一欧姓夫妇来到会场，说他俩的女儿曾被蔡强抢为妾，这次被红军解救。为了感谢红军，特带来一袋银元，送给红军作为谢礼。红军战士说：这是红军应该做的！把“谢礼”送回给欧姓夫妇。

故事二：战士买鸡

红五军驻扎扶溪一祠堂，打扫祠堂卫生，发现一大娘子四处漏水，便将其维修好。大娘拿来三只鸡要送给红军，作为答谢。红军战士在无法拒绝下，只收下一只，并把两个银元放在大娘家里。大娘发现后说：“你们真是穷人的军队。”

故事三：命令赔鸭

红五军来到长江一村旁时，一群鸭子突然窜到队伍中，其中一只很快就倒在队伍前的马蹄下。彭德怀立即下马，并命令通讯员，把赔老百姓的银元，送给从村旁走出来的一位老大娘。大娘说：“这是小事。”彭德怀对大娘说：“我们是红军，是有纪律的。”

故事四：军长赔牛

红五军在闻韶扎营的一天傍晚，一士兵将从树林中窜出来的两头牛，误认为是敌人偷袭，举枪打死。彭德怀得知此事后，感到这事非同小可，命令后勤处拿出100元大洋，赔给牛的主人，农民为之感动。

二、红五军转战南雄

（一）直奔县城开展革命宣传

1929年5月下旬，红五军团攻占仁化开展游击活动后，获悉仁化相邻的南雄县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守，只有民团、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改道转战南雄。

5月28日，红五军离开仁化闻韶（当年属南雄县管辖），进入南雄县百顺、巷石筹地，于6月1日下午直达南雄县城。国民党南雄县长方新听说红军来了，急忙剃须化装逃跑，民团、警卫队亦闻风而逃。红五军未经大的战斗，就顺利地占领了南雄城。



红五军南雄县城军部旧址——上武庙

中共南雄县委得知红五军来南雄的消息后，率领游击队攻打坪岗、里溪、水口一路的民团，然后进城与红五军会合。

红五军进城后，分别驻扎在上武庙（今八一小学）、下武庙（今市人民医院门诊部）。红五军驻扎县城，随即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进行各项活动。

红五军在县城的几天里，与地党组织分别在下武庙、孔圣庙（今市政府大院）、福音堂（现城镇医院）等处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中共南雄县委员周群标主持，彭德怀、滕代远在会上讲了话，着重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宗旨以及革命事业必胜的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群众和地主豪绅剥削贫苦农民的罪行。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进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



红五军在上武庙群众大会旧址

红五军在县城还利用各种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据南雄县城陈继灏老人回忆说：“1929年，我在五凤楼当印刷工人，红军在北六进城，是中午进城的，红军进城之时，五凤楼对面挤满了老百姓。当天下午，红军来五凤楼印文件、布告等宣传品，一个姓胡的红军工作人员来印刷厂校对印刷宣传品，他问我们有多少印刷工人，我们说20多人。红军要我们四、五天内印出几千张布告等宣传品，印完文件后，红军给我们印刷工人

发五个光洋，当时五个光洋很有用，我们很高兴。”

红五军占领县城，与中共南雄县委取得了联系，并宣布成立南雄县革命委员会。据1929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载：当时，红五军发现南雄县党组织存在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便把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印发给县委的同志，宣传党的政策，并组织县委负责同志认真学习，详细讨论，以肃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在红五军领导彭德怀等的帮助下，党组织检讨了过去“左”倾盲的表现，承认过去的错误和不足，从而坚定了贯彻执行中共六大决议的信心。

（二）筹措军需镇压反动官吏和豪绅

筹措军需，补充供给，是红五军转战南雄的一大任务。在中共南雄县委、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协助下，红五军在南雄筹款3万多元。由于地方反动武装在红五军来前已逃跑，因此红军缴获武器只有300支左右。红五军将筹得的款在南雄购买了大批药品、食盐和布匹，还由县游击队召集全城的缝衣工人赶做了一千多套灰布军衣。关于红五军在南雄筹措军需的事，在一些历史文献和回忆录中有过记述。

1930年5月的《红军四军状况》（1927年7月—1930年4月）记载：“五军在南雄时，南雄游击队没收了两家商店，至今商人害怕，也同样传说五军在南雄枪了两家”。1929年7月4日《中共南雄县委给省委的报告》说：“五军来雄……解决经济，……筹得了三万余元，已达目的。”《彭德怀自述》云：“打听到南雄无正规军，又决定夺取南雄，占领了五天。在城口与南雄买了一批药品，特别是奎定（治疟疾特

效)和阿德林”。

红五军在南雄期间，根据南雄中共党组织和游击队提供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联合游击队，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进行一次镇压和打击，枪决了国民党南雄县党部执行委员、县警察署训导董芳辉，以及县政府科长梁绍恒和土豪劣绅钟荣伟、刘伯陶等。同时，还烧毁了国民党南雄县署，并打开监获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和革命群众。关于此事，1929年7月24日的苏联《真理报》曾作过报道：“五月末，彭德怀穿过仁化全县，进入南雄县。六月一日占领了该县县城。……进入南雄的彭德怀部达千余多，县政府机关烧毁，被羁押的人统统放了出来。”

转战南雄的红五军，于6月5日离开南雄，向赣南崇义转移。

三、红三军团扩大苏区转战仁化

(一) 转战仁化的背景与征程

1932年3月中旬，为了总结攻赣不克的经验教训，确定赣州撤围后红军行动方向，周恩来在江口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率第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担负赤化赣江东岸地区的任务（江口会议后，中央局批准毛泽东的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入闽作战）；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东西两路军分别作战，夹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

城市。红三军团的主要任务：占领上犹、崇义，西进湘南桂东、汝城和粤北仁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湘赣苏区，使之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

3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西路军。4月中下旬，为实现西征计划，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相继攻战赣西上犹、崇义和湘南汝城等地。随即，红三军团在崇犹苏区受到国民党军六个师二个旅（其中粤军余汉谋部两个师两个旅）以及航空兵配合围攻，形势险峻，不仅难于推进发展，甚至有被围歼的危险。为了打破被动，闯出新局面，红三军团部决定战略转移，以诱导国民党军回粤镇守，减轻崇犹苏区的压力，以求得发展，扩大苏区。为此，分兵粤北，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仁化县进军。



红三军团占领的仁化长江圩

4月25日，红三军直属队及其属下第五军（邓萍兼军长、贺昌正政治委员、耿万敌任参谋长）的第二师（师长郭

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三师（师长彭鳌、政治委员徐策），每个师三个团共5000余人，由崇义聂都出发，经洛洞直入仁化县长江乡的塘洞。是日中午，红三军团前锋600多人进至长江墟旁与国民党军粤军独二旅杜凤飞团第一营第一、二连以及从扶溪来增援的第二营第七连连续交战。激烈战斗至下午6时，把国民党军击败，占领长江。这次战斗歼敌100多人，缴枪200多支。

随后，红三军团直属队驻长江广州会馆，指挥全军的革命活动。26日，红二师由长江出发，进攻扶溪，国民党军杜凤飞团第二营闻风而逃，退守白石岭。27日，红三师一部由长江出发，经济松、东坑占领城口；同日红二师一部由扶溪出发，经双合水、罗洞、出水东，占领恩村一带。28日，红二师一部由恩村出发，经厚坑、出塘村，前锋占领董塘境内的赤石迳。红军所到之地，占领有利地形，挖掘战壕，构筑工事，形成佯攻董塘、包围仁化，进迫韶关的态势。

红三军团进入仁化，震惊了国民党粤军当局，忙于调兵遣将堵截和围攻。28日粤军第二旅杜凤飞团从周田调回两个营驻仁化城，从乐昌调回一个营驻董塘。29日，粤军独立警卫旅（三个团）从韶关开进董塘。旅长陈汉光亲到董塘指挥，向赤石迳、城口一线窥进。同时粤军第二旅（旅长陈章）从南雄调梁荣球团、罗策群团经百顺、左龙向扶溪进犯。国民党航空第三队飞机配合侦察动向和轰炸。此外，粤军第一旅范德呈部从大余向崇义开进以资策应。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李振球师、叶肇师、张梅新师以及中央二十八军罗卓英师、周至柔

师、王茂德师、李明师在赣南遥为援应。至此，红三军团的西南面、东面、南面受敌堵截，形势险峻，于己不利。鉴于这种情势，红三军团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北面转移。5月1日，红三军团第三师前锋从城口出发，向桂阳（汝城）开进。迄至5月5日下午，尾随的第二师沿第三师前锋路线撤出仁化，进入桂阳、桂东一带作战。

关于红三军团第五军攻占仁化威胁粤北，粤敌迅速集结主力围攻的经过，1932年5月15日的《红三军团政治部关于崇犹西苏区路线和红军情况的报告》有所载：“自我五军之二、三师于四月二十七、八（日），占驻长江、城口，威胁粤北之敌，粤敌主力即迅速集合于大余及其附近，以防我乘虚入粤北，直至现在崇犹两城及唐江、杨眉寺等处均无粤敌。”

（二）转战仁化的主要活动

红三军团占领仁化北部后，根据部队发展和地方工作的需要进行了如下几项重要活动。

1. 筹集物资，补充供给。补充部队供给，是红三军团转战仁化的一大任务。红三军团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筹款30多万（银）元和物资一批，特别是把没收反动资本家的大量棉布集中在长江广州会馆，由苏维埃政府组织几十名缝纫工人，日夜进行加工服装共5000多套，另购买了大批药物和盐。

关于红三军团在仁化筹措军需之事，1932年5月6日《循环日报》有过报道：“据仁化逃难来省商民称：李明瑞部共

匪，于旧历3月20日，攻陷仁化长江圩，21日陷扶溪，22日陷城口。所过之处，苛索饷糈。计长江圩索缴12万元，扶溪索缴10万元，城口索缴7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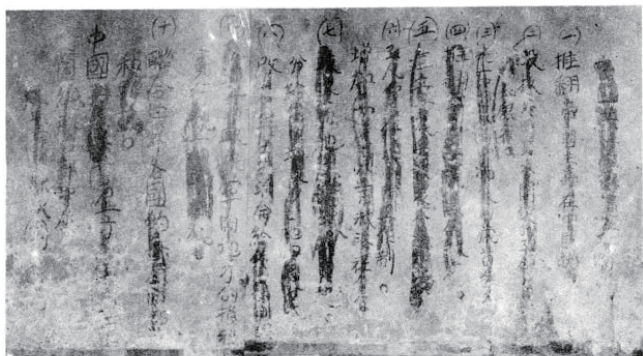
红三军团仁化长江指挥部和临时服装加工厂旧址——广州会馆

2. 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和主张。红三军团进入长江，分兵扶溪、城口及董塘部分地区，所到之处，发动群众，通过谈心、串联摸情况，开座谈会，群众大会，演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中共六大精神，提出“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政府”、“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贫农组织贫农团，消灭地主武装”、“打倒屠杀工农群众的国民党军”等政策主张，在各集镇和村庄墙上写了许多红军标语。如下是当年写在长江刘祠的中共六大《十大纲领》和写在城口恩村的《红五月》等革命标语，现仍很清晰。



在城口镇恩村村民委员会西侧门楼内墙壁上书写的红军标语——红五月：（现存仁化县博物馆）

- 1、纪念“五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2、纪念“五一”拥护苏维埃劳动法！
- 3、纪念“五三”“五四”“五九”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
- 4、纪念“五五”学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
- 5、纪念“五卅”援助上海罢工运动！
- 6、纪念“五卅”拥护无产阶级的领导。
- 7、纪念“五三”“五四”“五九”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 8、纪念“五三”“五四”“五九”打倒出卖革命的国民党！
- 9、纪念红色工农武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拥护世界和平。
- 10、纪念红色工农武装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录文：

- (一) 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 (二) 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企业和银行。
- (三) 统一中国，承认满汉蒙回藏瑶各民族。
- (四) 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 (五)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 (六) 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障。
- (七)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地及少田地的农民。
- (八) 改善士兵生活，发给兵士的田地。
- (九)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 (十) 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
总政治部印发 独立三师训练队(宣)

3. 开展打土豪斗恶霸分浮财斗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部队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像一股强烈的东风，吹遍仁化大地，极大地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群众纷纷起来，协助红军推翻当地区乡保反动政权，捉拿反动官吏、地主劣绅、恶霸、资本家100多人进行斗争和游街示众，没收其财产，将其粮食、布匹、衣物、油、盐、煤油等物品分给贫苦农民、居

民。对其中80多名实行逮捕，押往湘南另行处理。

4. 协助整顿巩固地方党组织。红三军团属下第五军出发时，曾召集团政委及师政委开会，专门讨论如何建立粤北地区的秘密组织及粤赣交通线的建立^①。当时仁化有中共城口特别支部，在红三军团的帮助下，驻在厚坑太平头村的中共城口特别支部及其领导下的驻城口的地下交通站“胜一理发店”得到了整顿，健全厂制度，恢复了组织生活，改进了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措施，坚持为苏区做好交通工作，直至1934年11月为红军长征过城口当好向导后，才停止活动。



城口地下交通站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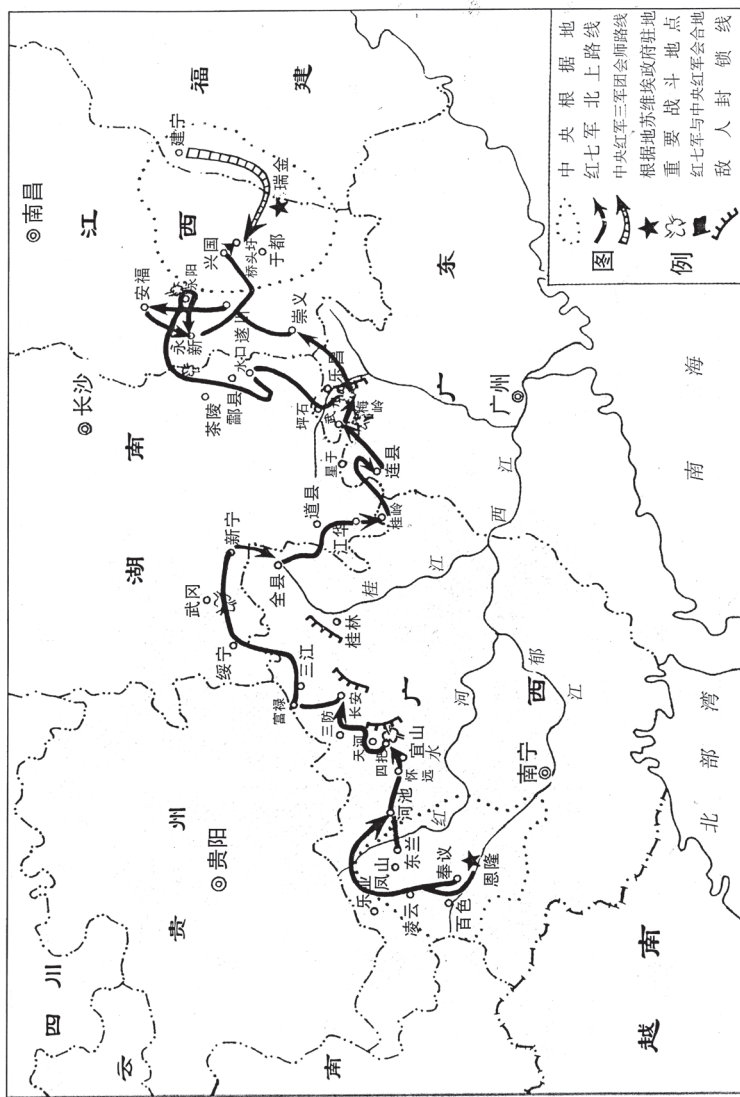
^① 《红三军团政治部关于崇犹苏区路线和红军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四章

红七军主力北上远征转战韶关

(1931年1月—2月)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率领下，从广西右江出发，艰难地踏上前往江西与朱毛会合的征途。次年1至2月间，红七军转战到韶关的连山、连县、乳源、乐昌、仁化等县，韶关成为红七军北上远征的战略通道。途中，红七军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在民众的大力支持下，部队给养和伤员安置问题得较好的解决。在乳源、乐昌血战梅花、强渡武江河，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挺进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一部分。



红七军北上江西会合中央红军路线图（1930年10月—1931年7月）

一、从广西右江向广东北江进军

(一) 向外发展挺进广东北江的艰难历程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一直倍受红七军前委，乃至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关注。

1929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致信红七军前委，传达中央指示红七军“发展的方向，毫无疑问的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①193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指出“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挺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联络，以争取广东先胜利的前途。同时应推动当地广大群众起来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红军第七军必定要向外发展才能实现其主要的任务，他的发展前途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汇合起来，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的先胜利前途。”^②4月20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再次指出：“你们仍须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发展的路线，应从速集中力量，……经过柳州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北江、西江发展”。^③根据中央和

① 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② 广西委党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版，第233页。

③ 广西委党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版，第259页。

广东省委的多次指示，红七军成立时提出了“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的政治纲领。^①不仅如此，红七军前委于1930年6月回师百色，收复右江时，就决定暂在右江苏区活动三个月，扩大红七军，开展右江土地革命运动，保护秋收，然后向湘粤边发展。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在这种错误判断主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央给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和打到广州去，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北上增援武汉。随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多次给红七军前委发指示信，指示红七军：“根据中央的政略路线，……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②但中央的决议和这些指示都没有传达到右江地区。红七军仍坚决执行中央原定

^①广西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版，第105页。

^②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版，第316页。

的“与朱毛汇合”的指令，并对红七军离开后巩固和坚持根据地斗争作了部署。

同年9月底，红七军前委正拟向外游击发展时，中央派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来到右江地区的平马镇，传达“立三路线”和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其实在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批判“立三路线”，停止攻打城市的计划。先期离开南方局的邓岗也不知道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仍然积极地向红七军前委传达“立三路线”。于是，前委决定部队暂停行动。10月2日，红七军在平马召开前委会议。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要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会上，对于如何执行中央的命令，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不赞成攻打大城市，而邓岗、陈豪人等主张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会议最后决定，红七军各部队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以鼓励士气，并在那里召开全军党的代表大会。

10月4日，邓小平和邓岗等率一个营从平马出发，踏上北上远征的征途。11月初，红七军的四个纵队及红八军一纵队全部到达河池。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大会主要议程是：南方局代表邓岗作政治报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红七军前委作过去工作报告；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七军党的任务；选举前委。大会决定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和中央交给红七军的攻打城市任务，提出“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

号。这次党代会，是在“立三路线”指引下召开的，做出了攻打城市的错误决策，并用强制的办法打击不同的意见，给红七军带来很大的危害。

党代会闭幕后的第二天，部队进行整编，全军改编为师团制。军部领导人是：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下设三个师：以第一、三纵队合编为第十九师，师长龚鹤村（兼），政委邓小平（兼），政治部主任许进；以第二、四纵队和红八军余部合编为第二十师，师长李谦，政治委员陈豪人（兼），副师长黄治峰，政治部主任李朴；以右江赤卫军编为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参谋长黄晖（后黄大权），由韦拔群等回右江地区后组建。

1930年11月9日，整编后的红七军全体指战员在河池县三里亭举行阅兵和出征誓师大会。会上，邓小平等军首长检阅了部队，邓岗代表中央南方局宣读训令，授予各师旗帜，并进行出征北上的动员。11月10日，邓岗和军首长率领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东进宜山，准备攻打庆远、柳州。

1931年1月1日至2日，红七军攻占全县县城。这时，尾追的湘军停止入桂，驻桂林的桂军三个团因有长安之役教训，不敢贸然北上。只在全州至桂林沿途赶筑工事，以防红七军南下攻打桂林。因此，红七军在全县休整3天。

红七军北上的任务是执行中央进攻中心城市命令的。在远征近两个月中，虽然主动放弃攻打柳州的计划，但也历经四把、长安、武冈等大小数十次战斗，部队伤亡1000多人，武器

弹药损耗殆尽，加上发生逃跑事件，部队减员近半。严重的挫折使广大指战员对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指示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强烈要求前委回答部队往何处去的问题。

1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关帝庙召开会议，集中讨论是否停止执行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和改变部队进军方向问题。邓小平分析了敌我形势，总结北征两个月的沉痛教训，力主立即放弃进攻桂林的计划，到湘南一带稍休养一段时期，再向粤北小北江发展，以扭转七军被动局面。会上，邓拔奇、陈豪人等经邓小平和张云逸的耐心说服，也转变了认识。于是，前委一致“决议目前不可再战，应有短期时间之休息，并决议经湘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络。”^①具体行动方针是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由硬拼攻坚战略转变到游击战略，沿湘粤边发展，以期建立粤北根据地并相机会师朱毛红军。会议还决定红七军在全州休整三天，将四个团整编为三个团，撤销红五十九团建制，以提高战斗力。会议同时又决定邓岗、陈豪人赴上海向中央报告红七军情况并请示今后行动方针，红七军前委重新由邓小平领导，许进任军政治部主任。3日，邓小平和许进召开了部队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前委会议的新决议和进军湘粤赣边的重大意义。全州前委会议是红七军北上转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红七军摆脱了“立三路线”和攻打城市的错

^①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

误命令。



全州会议旧址

（二）向广东北江进军小分队入连山

红七军主力抛弃“左”倾冒险主义指令后的1月4日，探知桂军一个师从桂林向全州压来，已经离全州约20里，前委当即决定按照向广东北江发展的计划，于第二天拂晓撤出全州，经灌阳向湖南道县进发，7日占领道县县城。后得到湘军准备合围道州的情报，军部命令部队离开道州赶往江华县。

1月9日，红七军到达江华。1月14日，红七军主力翻过湘粤桂边界的老苗山，于当晚到达广西贺县桂岭圩。此时，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两个多月，行程1000多公里，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部队减员一半，只有3500人。为了提高战斗力，前委在桂岭整编部队，缩编为两个团，取消师的番号，干部降级使

用。缩编后，五十五团团长由龚楚兼任，下设两个营，分别由章健、张翼任营长，袁任远、陈漫远任政委；五十八团团长由李明瑞兼任，李谦任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李显任第二营营长，麦农本、黎心诚分别任一、二营政委。编余干部由军部教导大队管理，冯达飞任教导大队长。军部设立参谋处，由黄治峰任参谋处长。缩编后，干部较前充实，战斗力也得到了恢复。

红七军驻扎桂岭圩期间，在当地民众的支持配合下，筹集了一些经费、给养和一批冬衣，对部队休养补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桂岭圩一带的豪绅力量较强，反动民团守着附近的炮楼与红军对峙，威胁群众反对革命。桂系的重兵一旦来攻，对红军很不利。据此，红七军前委决定部队于1月16日撤离桂岭圩，兵分两路，向湖南江华挺进，然后挥师广东北江，执行创建粤北根据地的进军方针。

红七军离开桂岭，向下咸前进，大部队经明灯顶翻过桂、湘交界的大锡界，到达江华县码市，另有约200余人的红七军小部队，行至下咸时因迷路在下咸宿营一晚后，在营指导员黄一平率领下，向板冲、芦冲前进，17日晚经鹰杨关进入广东连山上草村。然后，经万里坪、大小眼、芙蓉山、和洞圩、白石关挺进湖南江华码市与大部队会合。

红七军小部队进入连山，是最早抵达连山的中共武装，时间虽然仅有一天多，但做了不少的革命宣传工作，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原红七军师部传令兵覃应机后来回忆：红军当年经过连山时，一是在鹰扬关一带分几处隐埋了一

批不便携带的武器（小山炮和步枪）；二是通过与国民党连山当局谈判，声明只是路过连山，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因此没有同国民党军队发生直接的冲突；三是向沿途群众宣传不打人、不骂人的军队纪律，以及对商人不动，对普通地主也不动，只打恶霸地主的政策^①。

红七军小部队进入连山，引起了国民党连山当局的惊慌，他们想方设法阻止红军入境。据单昌辉回忆：1931年红军在禾洞前往白石关时，国民党连山当局派人在白石关一带驻守，截击红军。其中陈夏村青年何利印、何利昌、何利才等人有一次遇到红军到来时，按令向红军开枪，但红军一枪不还，只是对着他们喊道：“我们都是耕田人，都是穷苦兄弟，不要打我们！我们是专门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是穷人的军队！”“不要打，打死我们对你们有何益？如果打死了你，你一家大小怎过日子？快回家去吧！”被抽去堵截红军的村民听了红军的喊话，深受感动，很快就分散回家了，并且向村民悄悄传达，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红军喊话”的故事传遍禾洞，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②。

^①参见《覃应机谈红七军过连山》（莫自省、莫新兴采访整理），连山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连山文史资料》第7辑，1990年12月印，第1-2页。

^②参见单昌辉：《在禾洞流传“红军喊话”》，连山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连山文史》第12辑，1998年12月印，第88-89页。

二、进军连县筹集给养继续北上

（一）进军连县的时间和行动路线

1931年1月17日，红七军先头部队离开湖南江华码市，于18日进入广东连县清水、马石等地，在清水圩时对团防局进行打击。此时，经鹰扬关进入连山禾洞到达江华码市的红七军小部队，也与红七军大部队一起挺进清水圩。当时，红七军共3500余人。1月19日，红七军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龚鹤村的率领下，到达离连县县城60里的东陂圩。

红七军抵达东陂，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要不要攻打连县县城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攻打连县县城，就一定要在县城停下来，北江不易通过。他估计北江此时还没有重兵把守。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是可能的。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决定绕过连县县城，迅速赶到北江的乳源、乐昌县和湘南宜章一带开展工作。

1月20日，红七军北上向粤湘边的乐昌坪石方向挺进，路经连县星子圩时，“得报说离此地30里黄沙堡已有湘军千余人到来，……



东陂指挥部旧址

该处有一山城坳甚险，如有千余兵力守住，难通过，故又决定去连州一次，最少可以解决一些经济问题。”^①由此可知，红七军没有马上继续北上而要去连县县城，是因为部队受阻“很难过”去。另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连县县城原是连州府的所在地，为粤桂湘边的经济重镇，是红七军筹集给养较好的立足点；二是连县县城的敌情有利于红军的进驻和活动。据《莫文骅回忆录》所记：“经侦察，敌人正规军都在韶关以南，连州城只有数百民团驻守。军部决定：乘夜西下连州，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1月21日，红七军先头部队按照前委和军部的决定，从星子圩南下于当日下午抵达连县县城外围，并在城隍街城隍庙设立临时指挥部。当晚，红七军大部队到达连县县城，前委马上在指挥部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会上，有人主张伺



城隍庙指挥部旧址

①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

机消灭敌人，补充自己，在小北江建立立足点，最后，大家总结了远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轻装出发去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

红七军进占连县城南商业区，发动民众进行筹措给养时，国民党连县县长叶日嵩命令警卫大队队长莫辉勋率民团1000余人，关闭内城三道城门，并指挥在南门上的民团不断向城南开枪开炮，打伤红军多名。当时，大部分的大商家和当铺主们都逃进老城，使红军筹饷和群众工作难于进行。

为解决部队的给养和休整一个时期，前委决定攻克连县老城。23日，以五十八团为警戒，五十五团从南门和东较场一带向城内敌人发起进攻。正当双方酣战之际，南门楼上的反动警团向城南商业街的民房店铺抛掷煤油和火药包，妄图阻止红军入城。顿时，城外新兴街、青石街、圩场街一带火光冲天。红七军前委和军部见城南大面积商铺和民居被烧毁，以民众利益为重，立即下令停止攻城。经过军民一昼夜的奋战，大火终于在24日黎明时分扑灭。

这时，军部获知敌情：粤军邓辉、黎道明两团和湘军唐伯寅团向连县扑来。于是，前委和军部决定部队撤离连县。



红七军救火时用过的水柜

1月25日早上，红七军开始撤离连县县城，县城警卫队打开城门追击，被红军打回兴贤门，俘敌30余人，缴获枪支20余支。随后，红七军由流沙转入外塘、蔗塘，向西江圩挺进。26日，红七军到达西江圩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是到广东乳源县还是在连县开辟落脚点的问题。争论未果。次日继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向乳源县梅花、太平、杨家一带前进的设想。他说，据了解，那里有赤卫武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会上，就邓小平的这个想法展开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很迅速地出梅花、太平、杨家，攻坪石。理由是：攻连州没有把握，而且即使攻下来后工作也不是容易开展起来的。部队眼下需要群众影响及补充，而梅花、太平、杨家有群众基础，可以补充兵额、安置伤兵，在梅花、太平、杨家，有群众作依靠同敌人打个硬仗。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再攻连州。理由是：部队现在应有攻坚的决心，如能将连州的工作开展起来，政治影响会比攻梅花、太平、杨家大些。攻下连州能得到长时间的休息，物质上也能得到很大的补充。会议最后决定接受第一种意见，出星子圩经黄沙埠到北江。”^①到湘南宜章边界的广东乳源梅花地区创建粤北根据地。

红七军在西江圩，除了召开会议讨下一步行动问题外，还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休整部队，准备与敌军战斗。对此，邓小平的《七军工作报告》（1932年4月29日）曾有记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第179页。

述：“在山地住三日，一面作群众工作，一面休息兵力。但结果又得报告说并无敌人来，故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埠到北江。在星子方知邓辉团亦于是日由星子出发到连州，以至失掉了一大机会。因为在力量来说消灭该团是有把握的。”红七军离开西江圩后，重入星子圩驻扎，30日离开星子继续北上，在连县与宜章交界的风头岭，击溃宜章“铲共义勇队”。到达宜章黄沙埠与湘军唐伯寅团发生战斗。红军击败敌军后，前往宜章岩泉宿营，然后，向广东乳源梅花进军。

（二）开展革命宣传进行给养筹集

红七军进入连县后，国民党连县当局叶日崇县长坐立不安，一面驰电向上求援；一面派出爪牙并督令各区乡的民团，四处大肆造谣惑众，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小孩都要过刀”等等，胁迫群众“逃难”，防止红军“赤化”群众，妄图以反动宣传欺骗群众避开红军，断绝红军的给养和情报来源。

红七军在当时情况下，要开展部队给养筹集工作，必须做好群众宣传发动，取得民众对红军的支持。

红七军进入连县的清水、石马，沿途写标语，发传单，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七军到达东陂时，老百姓几乎逃避一空。东陂是红七军教导队队长冯达飞的家乡。红七军前委决定利用冯达飞关系，组织小分队在东陂开展革命宣传，做群众工作。谭荣胜是冯达飞的好友，他不相信反动当局的谣言，没有离开村庄，冯达飞找到他后，一起联络避走的村民进行宣传发动工作。许多民众和商人得知“文孝（冯达飞的又名）部队

回来了”的消息，纷纷回到村中，并热情接待红军，表示为红军办事，帮助红军解决给养问题。经过冯达飞和其他红军战士的宣传发动，东陂的一些商人和民众，送给红军生猪10只，大米3000余斤。



冯达飞

冯达飞，又名文孝，1899年生，广东连县东陂人。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毕业于广东军事飞行学校，后到苏联航空学校进修，回国后于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总队长、第二纵队司令员。红七军北上远征时，任五十八团团团长、教导队队长。红七军进驻连县，他代表红军与商会谈判筹款筹粮，安置伤员。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后，代红八军军长。长征后任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大队长、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捕，1942年牺牲。

1月20日，红七军北上粤湘边路经星子圩时，得知有湘军千余人挡住北上的去路，便在星子圩驻扎下来。星子圩是连县较大的集市之一，红七军决定在此开展给养筹集工作。红军抵达星子时，见有两个中年人举着“欢迎红军”的横额表示欢迎。原来，星子的民众在国民党当局的蛊惑下，争相逃躲，而一些流氓惯偷就想趁机偷抢店铺的钱物。举着横额的两个中年人是星子的两名店铺主，其实也是聪明人，他们曾听说红军是保护百姓的军队，于是在红军到来时，打着“欢迎红军”的横

额，目的是为了护店，防止那些流氓惯偷抢劫他们铺店中的财物。

红七军进入星子圩，总指挥李明瑞和经理处长叶季壮，在冯达飞的联络下，迅速召见了当地商会会长和有关人员，开展宣传工作。李明瑞对商会人员说：“大家不要怕，走了的人快叫回来，照常营业。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它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和土豪劣绅，让劳动人民得解放。我们对于正当的工商业，是予以鼓励和保护，买卖是公平的，纪律是严明的。”希望商民大力支持红军。



星子宿营地旧址

随后，派去巡逻星子圩的哨兵向李明瑞报告说：洋花街的“永城”榨油铺大门敞开，没人看管，我们已派哨兵看

守。李明瑞听后，马上命令哨兵请商会丁会长，把榨油铺的老板找回来，料理店铺，丁会长听了后，感慨万分。他回忆8年前桂系叛军沈鸿英的部队来犯星子，公开抢劫“顺成”当铺的情景，由衷称赞“红军的确是仁义之师”。

经过红军的宣传发动，商会为红军送来1000余元大洋，生猪10头和大米3000余斤。期间，红七军得知连县县城没有正规军只有几百名民团驻守的情报后，前委接受冯达飞提出部队去连县县城开展筹集给养和安置伤员的意见，决定部队的向连县县城转移。

1月21日，红七军到达连县县城，迅速展开革命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派出的政工人员走家串户，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沿街张贴“工农兵团结起来，建立苏维埃！”“打倒国民党军阀！”、“支持红军！”等标语。

在学宫门前，李明瑞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讲“本军革命之目的，在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解除民众痛苦，望民人毋误听谣言。”还说：“田是农夫耕的，布是工人织的，可是为什么农民吃不饱，工人穿不暖？”希望大家支持红军，推翻反动派的压迫。

同一天，在冯达飞的引领下，李明瑞和叶季壮等，会见了连县商会会长和知名的商界人士，向他们阐明共产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要求他们帮助筹集军饷4万元。后来这些商人见红军进驻县城后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很快给红军送来一些军粮和肉、菜，还有一部分现大洋。冯达飞是连县县城“明汉”米店主人陈老先生的快婿，和工商界好些人士，曾有一面

之缘。陈先生立即表示一定动员商民献款支持红军。

红军在城南向老城区开展筹集给养时，县城警卫队开枪向红军扫射，纵火焚烧城南商业区，顿时火光冲天。对此，民三十八年的《连县志》记载：“时负守望南城基责者为叶蔚仓，以城外新兴街一带，附城搭板屋甚多，为杜防共军乘登，乃投火毁板屋，物燥风高，一时火势蔓延，……一夜之间，铺户数十幢，尽付一炬。”

部分红军战士被县城警卫队打伤时，前委已下令攻城，见警卫队纵火烧城南，为民众利益着想，又下令部队停止攻城。随即，部队组织军民投入灭火。指战员们冒着敌人的扫射，昼夜奋战。在红军的带动下，参加救火的民众也越来越多。经过军民一昼夜的奋战，大火终于在24日黎明时分被扑灭，抢救出煤油、棉纱、布匹百货等物资一大批。

对于这次红七军在连县县城救火的情景，《莫文骅回忆录》有如下一段描述：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吞噬了城南的三条街道，繁华的商业区成了一片火海。

参加救火的指战员，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跳进火海，一包包洋纱、一捆捆布匹、一袋袋药材、一担担杂货，从熊熊的烈火中被抢救了出来。

离火场不远的荣梓巷内的煤油仓库，存放有数千桶煤油，若火势蔓延，油库着火，整个连州城将化为灰烬。战士们奋力抢救，迅速地把仓库里的数

千桶煤油转移到安全地方。

在救火过程中，部队还派出武装人员警戒现场，保护群众财物。当时，有极少数坏人混进抢救队伍，趁火打劫，背着物品往自己家跑，都被红军战士抓住追回。

邓小平在当年的《七军工作报告》说：“在连州因筹款问题逗留了几天，做了一些群众工作。因为敌人放火烧街，我们救火给了城市民众甚至于商人以很大的影响。”红七军的救火行动，感动了整个连县城的商人和其他百姓，他们感慨地说：“国民党杀人放火，共产党人救人救火！”。大火扑灭后的当天下午，连县各界民众组织代表团，带着10头猪和几千斤大米送到红七军指挥部，向全体官兵表示慰问。商会为表示对红军的感激和敬佩，将未交部分的款项，如数送到军部经理处。



惠爱医院旧址

河西教会医局，为红军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召，同意免费接纳近100名红军伤员入院治疗。一部分轻伤者，治愈后归队，一部分经香港，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转到中央根据地。一些热血青年，来到红七军指挥部报名参加红七军。当时，红七军在连县县城，与湘粤边工委连州支部取得联系，红七军赠送步枪20多支给地下党组织赤色游击队。

1月25日，红七军离开连县县城向北进军。26日在西江圩筹集到军饷一万余元，重入星子圩后又筹大米3000多斤。

红七军此次转战连县，筹集给养，部队得到充实，振奋了精神。据莫文骅在《百色风暴》一书中回忆说：“在连州补充了弹药、马匹、药材、布匹、服装等，又筹足了四万现洋。这样，不仅人人穿上了新衣服，而且每个人发了两个毫子。这一下，艰苦、贫困革命部队，大体象个样子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三、拟建根据地，激战乳源梅花圩

（一）利用乳源梅花有利条件拟建根据地

在湘粤边北江建立根据地，然后相机与朱毛红军会合，是红七军北上远征之初的设想。红七军成立后，其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就多次指示，要求红七军必须北上向湘粤边发展，推动北江地方暴动，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

北上远征途中，红七军一度受李立三攻打柳州、桂林、

广州“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全州会议后，红七军前委审时度势，放弃了上述攻打三大城市的计划，作出了出广东连州、北江，至湘粤赣边与江西朱毛红军取得联络的行动方针。连县解决部队给养过程中，红七军多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在粤北建立根据地，取得暂时落脚点后，相机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

1931年1月底，红七军按已定的目标离开连县星子圩北上，途中击溃部分宜章民团和湘军后，在湘南宜章县的岩泉圩和迳口宿营。此时，在粤北乳源县梅花圩的中共湘粤边工委获悉红七军在迳口的消息，即派中共地下党员杨高林组织部分人员，前往迳口迎接红七军到梅花圩。2月1日，红七军在杨高林等人的引导下，经辽水、三和圩挺进梅花圩。



梅花墟全景

杨高林，1895年生于广东乐昌县河南桂花村。早年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27年随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武汉转入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潜回家乡于1930年1月任中共大坪杨家支部书

记，12月当选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委员。1931年初，红七军转战乳源、乐昌，为红七军引路安置伤员。抗日战争时期，在乳源大坪组织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军。1949年7月因病在家去世。



莲花坛古庙

红七军进入梅花圩后，军部设在莲花坛古庙。当时，根据李明瑞的表现和本人要求，邓小平代表前委批准李明瑞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补选李明瑞为前委委员。此时，中共湘粤边工委决定派宣传部长谷子元协助红七军在梅花地区开展工作。从谷子元那里，邓小平得知，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从而更坚定了红七军在粤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同时，邓小平又了解到了梅花地区的基本情况。

梅花圩，是一个约一、二里见方的盆地，住着二三百户人家。周围高山重叠，长着密密的灌木林，是地势险要的山

区，地处湘南和粤北的交界处，与粤北乐昌和连县、湘南宜章和临武相邻。梅花地区也是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大革命失败后，梅花地区一直有党组织、农军和游击队在活动。三年前，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梅花，在此策动湘南宜章暴动，对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梅花地区的基本情况了解后，前委召开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该地不仅地形适宜开展游击武装斗争，也有党组织、农军和游击队，群众基础也好。因此，决定会同地方党组织，在梅花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休整部队，建立以梅花为中心的粤北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

至于红七军为什么要选择梅花作为创建根据地，邓小平在当年4月29日的《红七军工作报告》就明确指出：“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建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很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因此，我们“到北江后即在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

前委会议后，红七军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着手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准备工作。首先，召开军民大会，向红军官兵传达前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着重宣传红军的性质和革命的目的和宗旨，动员当地青年农民参加红军，并拨发60支枪充实农民武装。对于这次军民大会，《莫文骅回忆录》有一段描述：“翌日上午，阳光灿烂，梅花岭下

的围子村，人流如潮涌，军部在该村召开军民大会。军部首长都出席大会，会上，宣传我军的宗旨，并传达前委决定。大家喜形于色，拥护前委在梅花建立根据地的决定。”

紧接着，军事人员到梅花圩周围一带观察地形，测绘地图，构筑工事，拟定作战计划。政工人员有的入村开展宣传工作，在村头巷尾刷写“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倒国民党军阀！”等标语；有的政工人员，开展群众工作，了解居民情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后勤人员开展筹粮筹饷和被服加工工作。

红七军在梅花圩进行各项活动时，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的利益秋毫无犯。炊事班的战士为减少群众的麻烦，就在雪地上露天垒灶生火。战士们见百姓衣服穿得少，便将自己的一些衣服送给百姓御寒。当地群众十分感动，奔走相告：当年朱德部队又回来了。不了解实情逃出村子回来的百姓，见红军纪律严明，帮助百姓，有的把红军战士接到家里做客，有的还主动送柴草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做饭。梅花街的居民林金炳看见红军这样好，杀了一头肥猪送给红军，红军按市价付给林金炳25块光洋。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红七军在梅花地区的群众发动工作，成绩是可喜的。邓小平在当年4月29日的《红七军工作报告》中说：“发动群众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枪六十支）。”

（二）血战乳源县梅花圩

红七军挺进湘粤边震惊了湘粤国民党当局，驻湘粤边的

国民党军企图消灭红七军，纷纷前往粤湘边的梅花圩堵截。2月2日，红七军正在梅花开展建立根据地工作，侦察人员得到情报：粤军一个团从连县星子尾随而来，向梅花进犯。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红七军前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认为以我军现有的兵力，利用梅花圩的有利地形和其他条件，消灭敌人一个团是有把握的，不能错失这个大好的机会。这一仗打胜了，红七军的影响扩大了，在北江立足就不成问题。于是，决定迎击敌人，打一场歼灭战。

具体作战部署：五十五团为左翼，抢占军营下、石墩下和梅花街等地；五十八团为右翼，抢占草家坪、墩头下、桥头、石围一带。



梅花战场一角

中午，敌军邓辉团向红军疯狂扑来，其前卫部队控制红七军五十五团阵地前的一个制高点，掩护两侧敌军进攻。红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当即奋起还击，枪声、炮声震撼山谷。

敌人一次又一次向红军进攻，红军顽强扼守，并以小分队反击，连连击退敌人。这时，援敌越来越多，终于接近红军阵地。在这紧要关头，张云逸军长亲自赶到前沿指挥战斗。警卫连政治委员（后称政治指导员）王天和连长覃亮之，沉着指挥部队，以猛烈的火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覃连长不幸中弹牺牲。大量敌人继续冲到阵前，恰好李天佑连长带着特务连赶到。战士们先用手榴弹杀伤了许多敌人，接着发起冲锋，敌人退缩回去。

这时，湖南的唐伯寅团和陈龙团，也从坪石方向追来。至此，敌人共有3个团，兵力大大超过了红军。他们凭着人多、武器好，轮番向红军冲锋。

红七军特务连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山头白刃飞舞，杀声震天。正在这时，章健营长（整编前是团长）率五十五团一个营，从左侧奔杀而来；李显营长率五十八团二营，从右侧直压过来，很快把敌人打垮。

敌人正面进攻未遂，重新组织兵力，扑向我左侧高地。坚守在高地的章健营长，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正在指挥部队粉碎敌人第六次冲锋时，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章健营长不幸牺牲。

此时，右翼阵地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邓小平政委亲自到五十八团指挥战斗。李明瑞总指挥命李显营长向敌左侧反击。这时敌人也企图从左翼突破，双方在进攻中遭遇，战斗十分激烈。经过肉搏战，终于把敌人压下去，但李显营长不幸负伤。不多时，敌人重整部队，又发起集团冲锋。阵地上硝烟弥

漫，枪炮声、喊杀声汇成一片。五十八团一营营长李谦（缩编前为师长）率领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的冲锋打退。弹药不多了，就从敌尸上取来枪支弹药继续战斗。饿了就啃些干粮充饥。先后打退了敌人7次冲锋。黄昏时分，李谦营长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动员：“坚持到天黑，就是胜利！”敌人也利用这一时刻，拼命发起第8次冲锋。李谦亲率一个排又把敌人压了下去，并乘胜追击逃敌。突然，一声冷枪把李营长打倒了。当战士们把他扶起时，他睁开双眼，手指敌方喊道：“不要管我，冲上去！”说完便昏迷过去了。

夜幕降临，战斗停下来了。张云逸军长、邓小平政委都来到已护送到军指挥所的李谦身旁，抚摸他的前额，观察他的伤口。李谦苏醒过来，见到首长，吃力地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首长们亲切地说：“李谦同志，你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任务完成得很好！”不久，李谦因伤势过重牺牲。



李谦像



李谦烈士墓

梅花战斗，坚持了五个小时，一直到当天黄昏才停下来，共毙伤敌军1000人左右。红七军损失异常严重，伤亡约700人，干部伤亡约占三分之二。对此，邓小平极为痛心，他说：“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①

在梅花战斗中，数百名地方人民群众在地方党组织的动员和组织下，参加战时支前工作，帮助红七军运送枪枝弹药，组织担架队，抢救伤员，并有120多名青壮年农民与红七军一起，在战场上攻打来犯之敌。

梅花一战，红七军没有把敌人彻底打败，其原因是对敌人的兵力了解得不够准确，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团，其实是四个团。面对敌众我寡的情况，为了摆脱敌人，保存革命力量，红七军在战斗结束后的当晚，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张云逸率五十八团，从石团寨和棉花庙向大坪方向撤退，两部转移至大坪的杨家寨会合。在此，红七军在中共湘粤边工委、中共梅花支部、大坪支部和梅花鲁班工会的配合下，打开地主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

2月4日，红七军前委在杨家寨临时指挥部——文昌阁召开紧急会议。鉴于梅花圩失利无法立足，决定放弃创建粤北根据地的计划，抢渡乐昌河（亦称武水、武江），挺进湘赣

^①邓小平：《红七军工作报告》，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边，寻找苏区休整，相机会合朱毛红军。随即，留下教导大队部分骨干和300余支枪给湘粤边工委，作为发展粤北游击斗争的基础。会后，前委率部向乳源东转移，并将红七军400多伤病员委托湘粤边工委安置。

中共湘粤边工委接到安置红军伤病员的任务后，马上指派工委委员杨高林组织民众，把伤病员秘密转移到乳源县大桥的铁龙头村。当时正是冰天雪地，伤病员又冷又饿，铁龙头村村民待红军如亲人，急忙煮了6担番薯，又宰了肥猪，



大坪杨家寨红七军临时指挥部——文昌阁

让战士吃饱。几天后，军长张云逸率领58团没渡过武江河的部队经过铁龙头村时，300多名伤病较轻的战士跟随队伍前进，留在铁头村的40多名重伤病员由张金泮、张新祥等10多人转移到离铁龙头村6里远的深山曲潭坳隐蔽疗伤。张金泮还请来当地乡土医生陈先六，采集草药，精心治疗伤病员。

红军在铁龙头养伤的消息被大桥地主豪绅向国民党政府告密。3月18日，国民党63师125旅严应鱼团第2营以“通共窝

共”罪名围剿铁龙头村。张金泮带领村民持乌枪土炮奋起抗击，打死敌炮手、士兵各1名。深夜，村民挖开墙壁，欲从一条水沟突围上山，被敌人用机枪、手榴弹和小钢炮严密封锁，20多人被打死。19日，敌人冲进村子，到处搜捕红军，威逼村民说出红七军伤员的下落。村民面对敌人的屠刀，毫不畏惧，宁死不屈，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敌人当场又杀害了13名村民，两天时间，铁龙头村被国民党军杀害了34人，整个村庄被烧毁。20日下午，国民党军又窜到倒角和岗头村搜索红军伤员，结果仍一无所获。疯狂的敌人放火烧毁了两条村，又杀害了10多名村民。国民党军连续三天围捕红军伤员的阴谋落空了，村民在张金泮的安排下早已将红军伤病员带上大山隐蔽起来，无一伤亡，他们用生命保护了红军伤病员的安全。同年4月中旬，他们将红军伤病员转移到必背南坑瑶寨。瑶族兄弟姐妹热情为红军献粮献药，熬粥煮饭，细心护理。经过3个月



铁龙头

的精心治疗，除一名姓唐的连长和一名战士因伤势太重不治牺牲外，其余基本痊愈，大部分人奔赴江西苏区归队，留下黄思祥、陈月生和黄世尤3名伤病员继续治疗，后有两人在瑶山安家。

四、强渡武江分兵仁化、乐昌向苏区挺进

（一）成功渡江部队经仁化向苏区进军

红七军撤出梅花大坪杨家寨，由地下党员杨高林等带路，经老屋场、冷水坑向东往乐昌方向前进，于2月5日拂晓，到达乳源杨溪与乐昌长来之间的武江河边。



武江河曲合渡口

武江，宽百余米，水深难于徒涉，挡住了部队向东挺进江西的去路，部队只好集结在江边作暂时的休息待命。邓小平和李明瑞站在高坡上观察地形，思考部队渡江的问题。不一

会，他们走下坡来，召开军部会议研究部队渡江方案，并决定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先头渡江，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一旦发生敌情，可以前后掩护。

部队渡江唯一可以利用的工具是小木船。关于部队这次渡江工具（船只）的数量，莫文骅所著的《回忆红七军》一书记载：“只有两艘小船”，“两只船一次顶多能过二十来人”^①。据此，后来记述红七军这段历史的书藉和文章，几乎都是采用这一说法。然而，关于红七军当年渡江的情形，上世纪70年代掌船人温炳招，却有如下一段回忆：

我是武江河的老船工，今年83岁。

解放前，我是撑走墟船为生，住家的船停泊在武江河上乐昌县长来村与罗村河段的河中间沙坝边，那里停靠着不少的船家。……

……有一天，约中午时分，……突然，罗村方向有人对着我们的船大声喊：“撑船过来，快撑船过来。”喊声急促而且嘈杂，有讲普通话的也有讲广州话的。我们连忙向罗村方向望去，一看，岸边站着不少军人，我们急忙撑船过去。

记得当时一起开渡的小船有五、六条。我们一条，我大姐温亚兰一条，温丁苟一条，另外还有二、三条。那时北风很大，开船不久，我家晒在船

^①莫文骅著：《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85页。

上的“冬粉”（糯米粉）便全部被吹下河去了。我们的船无法靠近罗村码头，被风吹到曲合村渡口还要下些的沙坝才靠岸。

我们的船一靠岸，军人们纷纷上船，这时，有个军人对我们讲他们是红军，他们待人非常和气，但不断催促我们快些撑船。我们的船很小，每条船只能载7—10人。他们显得很焦急，有不少的军人游水过河，大部份游到大赛坝河边大石头处上岸。我们的船都撑到大赛坝河边大榕树的地方靠岸，我约撑了2—3个来回后，突然，从韶关方向来了国民党军队，在大赛坝下游附近的山上不停地向河中打枪，封锁江面，阻止我们撑船，阻击那些红军过河。^①

掌船人在回忆中明确说，红七军当年渡江时，“一起开渡的小船有五、六条”。“船很小，每条船只能载7—10人。”不仅如此，渡江的渡口也应有几个。而莫文骅回忆当年红七军渡武江，只有两只小船，应该是一个渡口的事。否则，在几个小时内，1000多人渡过江去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红七军渡武江，原定2月5日拂晓进行，后因战士疲惫未能实现，故拖至午后才开始渡江。武江河面虽然不很宽，但水流湍急，加上木船小而又残旧，渡江速度十分缓慢，一条

^①温炳招口述、黄岷华整理：《回忆红七军渡武江》，中共乐昌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乐昌党史参考资料》，1990年1月印，194页。

船往返时间都要几十分钟。为了争取时间，一些水性好的战士，不顾安危，强行泅渡过河。下午3时多，邓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艰难地渡过了武江河，并立即控制了滩头阵地。两个小时，五十八团大部分也渡过了河，只剩下张云逸带领的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步兵连、一个特务连和卫生连、休养连、供给处约600人未能渡河。

突然，河对岸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飞来几颗炮弹。原来，广东军阀陈济棠加派的郭润华团从韶关乘汽车到达武江边，与已渡河的五十五团展开了激战。邓小平指挥2个连在观音山紧紧地咬住敌人。他认为，只要组织好火力，压住韶关来敌，付出一定代价，完全可以掩护部队全部渡江。然而，敌人封锁了江心，渡江更困难了，若拖长了渡江时间，全军将陷入敌人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邓小平当机立断，要渡船返回通知张云逸：停止渡河，相机前进。

红军另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抢渡。利用鲜血换来的时间，不停地在河面穿梭往来。当载满了五十八团最后一批战士驶到河心时，对岸敌人重机枪扫来，小船转了一个弯，被挡了回来。这时，乐昌警卫队和韶关来援的敌人源源到达，分三路向红七军渡了河的部队合击。邓小平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甩开敌人经乐昌向仁化方向前进。

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一部1000多人从乐昌进入仁化沙湾、上中盆、下中盆，然后到石塘村郊外进行休整，总部设在石塘娘娘庙内。第二天，为了争取主动，邓小平、李明瑞率部又踏上征途，绕过董塘，经赤石经、四十八旗，进入城口



石塘娘娘庙

的塘村、厚坑、上恩村，渡锦江。此时，国民党仁化当局早已惊悉红七军向仁化进军，调动县警队、特务队、后备队等反动武装近千人，实行围堵追击。李明瑞果断地命令红七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实行转移。红七军经水冬、寒婆坳、土洞、张屋、上奢、响塘、牛皮洞进入长江乡。

红七军进入长江乡，已是2月7日，指挥部设在高岗庙。部队的宿营地安排在街道和村庄周围。宿营地安排好后，部队派出战士向村民、居民购买粮食等，同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和任务。当群众得知这支部队是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时，非常热情，帮助红军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有的送开水，有的送米送菜，有的还将自己的房屋让红军住宿。

2月8日，邓小平、李明瑞在长江乡率部出发，经冷饭坑，进入江西大余，随后又向崇义前进，^①然后在崇义一带开

^①邓小平：《红七军工作报告》，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展游击活动，打听红七军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的消息，寻找中央红军。3月初，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随后李明瑞率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撤至遂川大汾，向永新前进。

（二）渡江受阻部队北撤经湘南入苏区

2月5日，红七军强渡武江河，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1000多人渡过河时，敌人占领了河岸，封锁了渡口，红七军部队被截断为两部分。受阻未渡过河的五十八团部分和军直属队约600人由张云逸指挥，又开始踏上艰难的征途。

在敌人封锁渡口之机，张云逸亲自到罗村向群众打听路经，并指挥部分队伍在长耒圩夺路过河。首批40名战士渡过了河，冲进长耒村，奋力夺取敌人的阵地，当时一名排长和一名战士在战斗中中弹牺牲。由于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长耒村所有的路口，渡河部队只好折回罗村。敌人封锁了渡口，尚未过河的部队无法再渡，这几百人中非战斗人员和伤病员较多，大家都焦灼不安。这时，张云逸探路归来了，他飞身下马，同经理处长叶季壮、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研究后，向大家宣布：“现在渡不过河了，队伍后撤三十里！”张云逸坚定地说：“同志们，敌人再凶恶，也挡不住我们前进，我们一定能渡过武江，到达中央苏区！”同志们受到了鼓舞，坚定了信心。天黑后，部队沿原路一口气赶了三四十里路，于晚上9时多来到半岗岭瑶寨，瑶族同胞邓安德主动为红军引路。他打着火把，边走边用瑶话高喊：“布丁伦好！布丁伦好（即红军好）！”顺利地通过了瑶山哨门，到达大洞住宿。

2月6日午后，部队重返大坪村。此时，在铁龙头疗伤的大部分红军归队。第二天，当地地下党派谷子元、杨高林两人担任向导，把部队带到马脐湖、金岭下，当天上午到达水口渡口。乐昌地方党组织从附近罗家渡撑来一只渡船。这里虽然水深流急，但江面较窄，到中午时分，部队在张云逸的指挥下全部渡过了武江。当最后一批战士下船时，经理处的同志把几个光洋送给船工严大爷，表示酬谢。老人手捧光洋，连声说：“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你们是好人，祝你们胜利！”



罗家渡水口渡口

当红军胜利渡过武江后，留在河岸的一名向导迅速把船撑离渡口驶向下滩。过江后的部队经天堂岭到达乐昌黄圃司宿营。8日，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找到了两个红四军二十九团流落在此地的战士当向导，把部队从塘村带进湖南。在离粤境时，张云逸将两挺重机枪和100多支步枪，赠送给湘南特委，

充实地方游击队的装备。

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2月9日从乐昌黄圃经湖南宜章上渡，再到资兴、汝城和桂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作战，一路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进江西。4月初，部队从江西永新向遂川靠拢。在遂川城东的小河旁，红七军的两部分——五十八团、军直属队同五十五团，终于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七军2000余人重返永新。随后，参加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7月，红七军到达兴国，在都桥头，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此后，红七军划归红三军团指挥，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投入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第三次反“围剿”后的9月下旬，红军在瑞金召开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会上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

红七军离开右江后，转战湘、粤、赣，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他们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屡战屡挫，屡挫屡起，表现出大无



“转战千里”锦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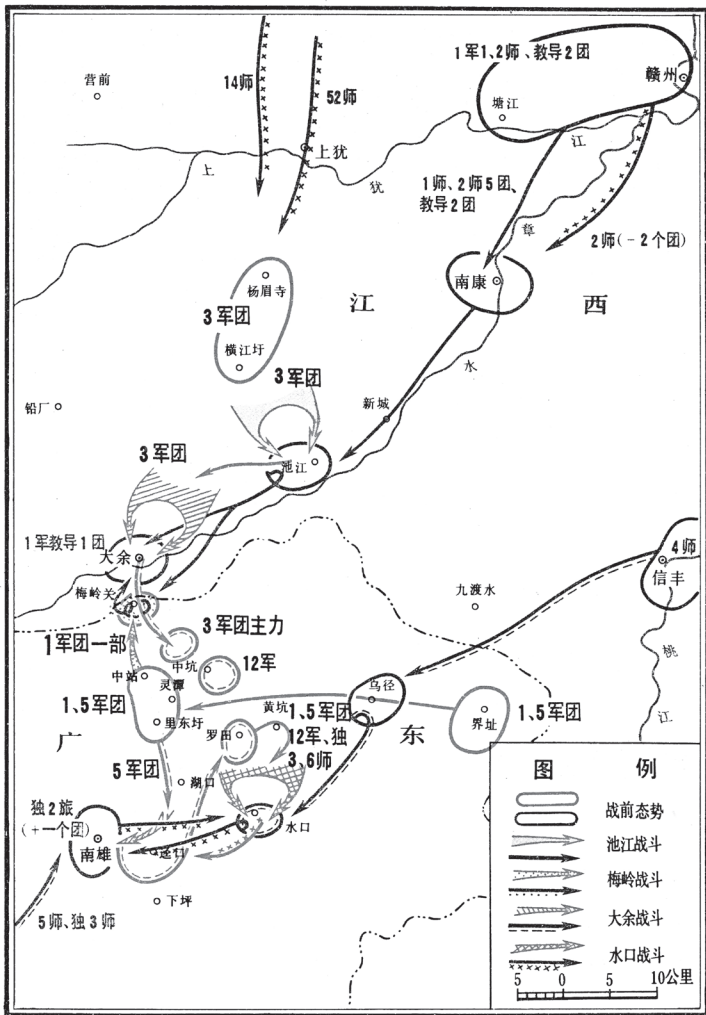
畏的英雄气概，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垮的英雄部队。11月，为表彰红七军转战五省边界的英雄业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会上，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红七军一面绣有“转战千里”的锦旗。

第五章

红一方面军激战南雄、水口

(1932年6月至7月)

红军主力在赣南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命令陈济棠派粤军入赣“助剿”红军，使赣南苏区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有力地打击入赣粤军，巩固赣南苏区，红一方面军于1932年6、7月间发起南雄、水口战役，历时30余天。红军主力1.8万人在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的指挥下，先后在池江、梅关、大余、水口与粤军近2万人展开对决，共击溃粤军15个团。南雄、水口战役是工农红军在粤境最大规模的战役，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有力地打击了粤军入赣的气焰，对保卫赣南苏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后来红军长征顺利过粤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雄、水口战役经过要图

1932年7月2日—10

一、南雄、水口战役的历史背景

1931年底，红军主力在赣南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使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2年3月中旬，为了继续扩大革命根据地，有力打击敌人，周恩来在赣县江口圩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总结打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夹赣江南下，向北发展，逐次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决定将红军主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南下。

3月18日，根据江口会议精神，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中革军委训令。训令规定：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两路红军的作战部署是：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开往赣湘粤边的江西上犹、营前、崇义和湘南的桂东、汝城和粤北的仁化、城口、扶溪等地；中路军开往赣南地区。中路军在进军途中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中路军向东发展的主张，中革军委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入闽作战，尔后集中东、西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正当红军分两路向东、西方向进攻时，蒋介石不甘心第三次“围剿”的失败，继续派兵“围剿”中央红军，委派

粤军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南路“剿匪”总司令，令粤军入赣“助剿”。随即，陈济棠派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两个师进入赣南：第一师李振球部，驻赣州及其附近地区；第二师叶肇部，驻南康及附近地区；一军军部和直属队驻大余及附近地区。另派第二独立旅陈章部队进驻南雄。其后又派第二军第四师张枚新部进驻赣南信丰县。

4月下旬，红军东路军进攻闽西连续获胜，使赣南与闽西的苏区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也使蒋介石惊恐万分，他调集6个师的兵力，由何应钦指挥，对红军西路军进行围攻。红军西路军被迫撤出上犹、崇义根据地。同时，粤军的两个师已侵占了赣西大片苏区；另一个师进占信丰，向于都进犯。赣南革命根据地受到粤军的巨大威胁。

为了打击粤敌，巩固中央苏区，并根据国民党军对苏区进攻的新部署，中共临时中央于6月5日发布《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6月8日，朱德与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共同对付粤敌。次日，三人率东路军由闽西出发，日夜兼程回师赣南。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副主席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

6月21日，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发布命令，

令红一方面军首先要迅速地坚决地消灭入赣粤敌，“应以一、五两军团配合独立三师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准备首先在南信交界坪田、乌迳一带与信丰、南康、大余、南雄等处的来敌约五六团以上决第一战”的作战方略。令红三军团采取最积极的行动，首先牵制粤敌一部，随即迅速与红一、五军团会合，共同歼灭粤敌。之后，红一、五军团向乌迳开进，方面军总司令部随同红五军团总司令部行进；红三军团从湘南桂东地区撤回大余东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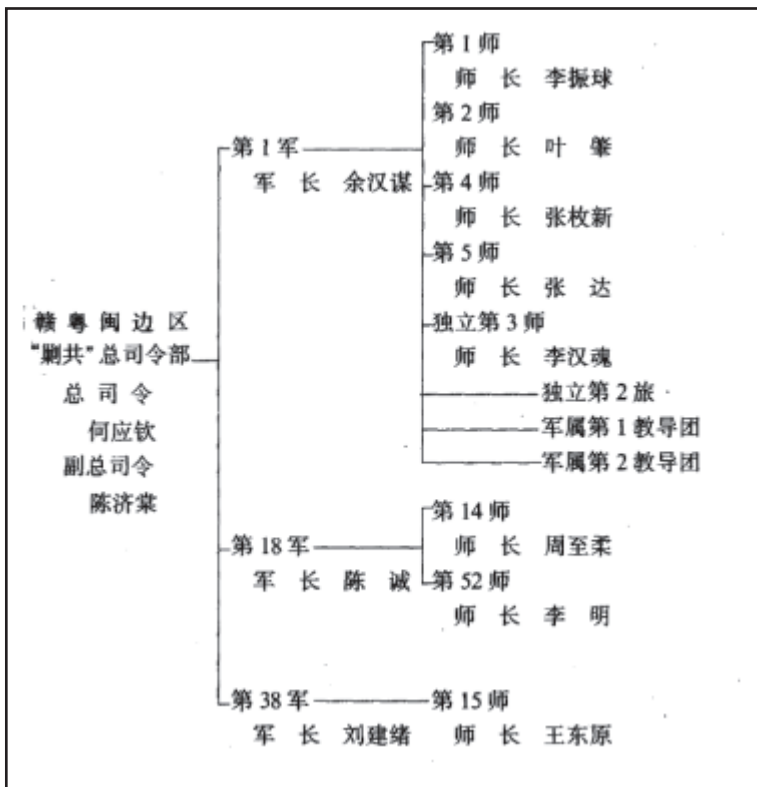
命令下达后，朱德与毛泽东、王稼祥指挥红一、五军团从闽西到达赣南，25日，红一、红五军团在大余地区袭击粤军，准备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经信丰向粤北南雄推进，6月29日到达南雄界址，30日到达南雄乌迳、新田一带，在邓坊圩设立指挥部（总司令部）。随即，红一、五军团及十二军主力先后占领坪田、南亩、乌迳、界址圩、邓坊、湖口和南雄至大余交界要冲里东等地。

与此同时，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等部也由赣县向上犹、大余移动。6月27日，红三军团主力约5000余人由上犹营前出发，经崇义县城于28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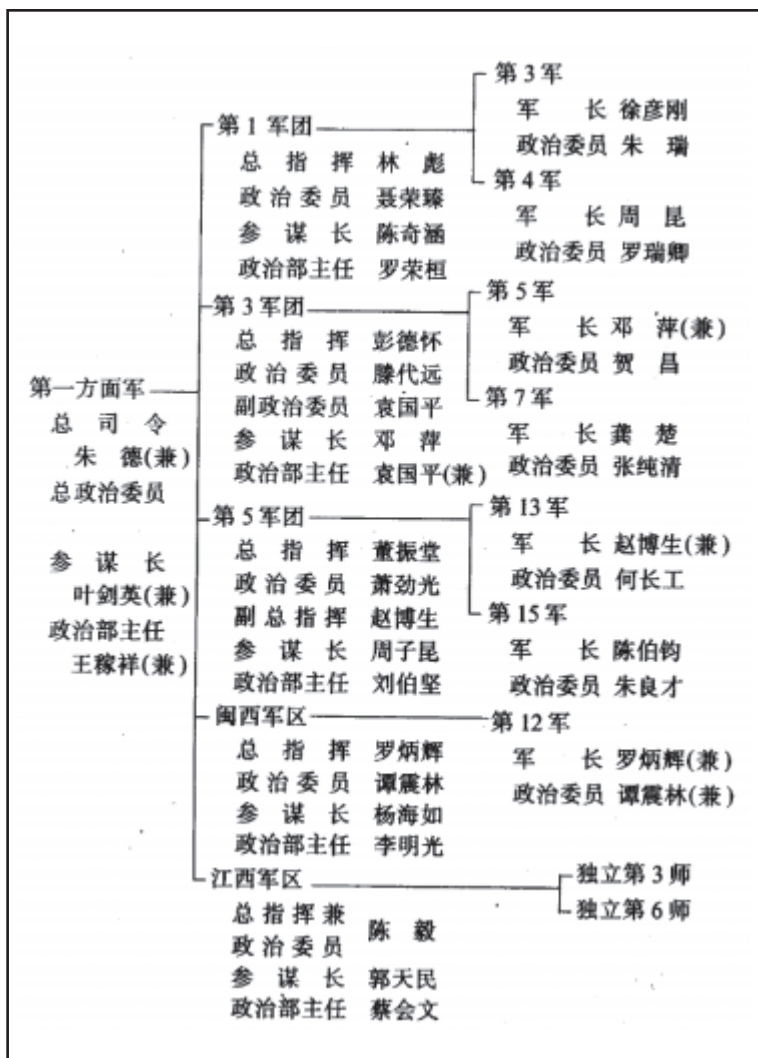


红军进占里东旧址

达崇义之长龙圩，先头部队当天到达上犹南部的杨眉寺，部分进入大余县境占领了新城水西的蔡屋，并向南康唐江方面警戒，准备与一军团牵制南康以北的粤敌主力，截击粤敌自赣州回师大余与南雄的归路。于是，红三军团在大余池江与粤敌展开了南雄、水口战役主战场前夕的首次战斗。



南雄、水口战役国民党军序列表（1932年7月2日—10日）



南雄、水口战役红军序列表（1932年7月2日—10日）

二、主战场前夕的几次战斗

（一）大余池江战斗

面对红军的进逼，国民党粤军部署部队向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附近集结。余汉谋制定了乘各部红军“尚未会合之前，先剿其一部，后集结兵力，歼‘匪’全部于康、余、雄、信地区”的作战计划，并调重兵分别进入上述四地，以抵御红军的进攻，还命令主力部队集中大余附近相机出击。6月底，驻赣国民党粤军第一师李振球指挥的6个团由赣州进至南康大余集结。

7月1日下午，红三军团前锋部队由上犹经大余池江杨梅城向池江挺进。当前锋红五军二师五团200多人进至池江圩郊时，正好与粤军第一师回防大余的前锋团相遇，双方立即在池江圩展开激战。红军因不明敌情，又寡不敌众，主动撤出池江返回杨梅城。但激战中红军一名参谋长牺牲，命令和电码密本被粤军获取。

2日拂晓，红三军团主力向池江圩进击，向粤军发起猛攻。敌人即将被击溃时，粤军后续部队两个团很快赶来增援。援敌在距池江圩东北1公里的新江村，分左、右两路运动企图进击红军：一路沿消池土岗欲侧击红军左翼；一路沿章江北岸抢占池江坳，欲侧击红军右翼。此时，红三军团后续部队已经赶到，但由于粤军已增至4个团以上的兵力，武器精良，并筑有工事，且又占据了大路坳高地，红军经多次冲锋，难

有进展。战斗在新江、池江圩、池江坳方圆数公里范围内展开，尤以池江圩、池江坳战斗最为激烈。粤军将池江坳下青龙凤凰古城墙砖块拆卸下来，运到池江坳修筑工事，使缺少重武器的红军难于突破。阵地几度易手，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恶战，红军才把粤军击溃。



池江战斗遗址

池江战斗，异常惨烈，双方伤亡均很大，红七军第十九师师长李显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粤军在池江溃败后，退向大余城。红军乘胜追击，直至县城北郊的金莲山，然后分兵迂回西华山和浮江，从东、西、北三面包围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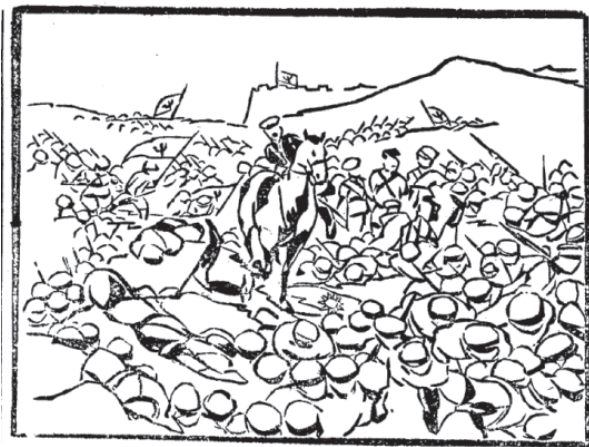
（二）南雄梅关战斗

梅关，是广东省南雄县与江西省大余县交界处梅岭山巅的隘口，也是粤北与赣州交通主要的孔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7月1日至2日，红三军团在大余池江与从赣州撤回大余的粤军6个团展开激战，粤军4个团被击溃便退守大余城。当时，方面军判断：退守大余的粤军，可能要退回南雄，便命令红一、五军团在梅关、中站一带集结，准备与红三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粤军包围在中站一带，一举歼灭之。

粤军余汉谋部惧怕红军抢占梅关，断其回粤归路，便在7月2日，命李振球立即派一个团的兵力“扼守梅关孔道，俾将来本军进出容易。”当日晚上10时，粤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李崇纲奉命率部开到梅关驻守。

红一军团接到夺取梅关的命令后，立即组织部队向梅关发起进攻，首先与据守梅关山巅和山坳的粤军展开激战。红军为了夺取梅关的制高点，几次向山巅守敌发起进攻，敌人凭险顽抗，故一时难于攻下。于是，红军便分路迂回到敌李团的左右



紅軍擊潰粵敵葉肇李振球二師

当年《红色中华》登载的漫画

翼山麓和后方，进行包抄，并向各处敌阵猛攻。敌李团长见势不妙，立即命其第一营从山顶撤退下山。红军边追边打，战斗到下午5时，粤军李团支持不住，只好且战且退，并逐步将兵力收缩集中。当其退至北麓时，又被红军四面包围。李崇纲见红军继续攻击，便命令第三连冒死拼命突围。此时，粤敌飞机也赶来助战，对红军进行轰炸扫射，李崇纲才得以乘机冲出重围，夺路逃命，率残部退回大余县城。

红一军团将粤军李崇纲团击溃后，控制了梅关要隘，把粤军占据的大余、南雄两个重要据点之间的交通线全部截断，完成了南面的军事布置。

（三）大余战斗

驻守梅关的粤军第二师五团被红一军团一部击溃后退回大余城。残敌退至城南羊牯坪、五里山一带进入大余城过程中，被红一军团一部追击，将水城包围，并派前锋部队进驻游仙与红三军团联系。两城被包围后，红军随即发起佯攻，欲以围攻打援之战术，引蛇出洞，趁机歼灭驻大余、南雄的粤军。不料在7月2日池江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的笔记本等物丢失被粤军捡拾，余汉谋已从中获知红军此次战略计划，知道毛泽东、朱德率红一、五军团等部在南雄集结，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林彪率红一军团一部在大余一带截击粤军。^①于是将驻守大余及增援大余的粤军全部集中城内，凭

^①1932年7月国民党粤军《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附广韶部队）在江西大余梅关青龙大路坳等处剿共战役战斗详报》。

藉坚固的城墙，龟缩不动，只派赣南警卫团死守山岭，以应付红军的进攻。其具体部署如下：（一）第一师一、二团担任大庚老城及东门外村沿的阵地，并保护中山桥；（二）一师三团和军属第二教导团守卫东山及自东山至新城东门外的阵地；（三）军属第一教导团及小加农炮两连，守卫宝珠山及章水北岸至老城西南角一带阵地；（四）军属特务营、工兵营及第二师特务营二连，共同守御大庚新城；（五）炮兵两个连分别列在东山和老城两处阵地上；（六）第二师第五团则置于新城东端为总预备队。



大余战斗时的县城

7月4日，红三军团根据方面军总部命令向大余城发起进攻。彭德怀亲临西华山侦察敌情，指挥进攻。但敌人据城死守，强攻难于破城。5日，红三军团再次向大余城发起猛攻，粤军还是据城死守，绝不出击。红三军团连攻几日，不见城内

动静，根据情报，误认为大余城内的粤军主力已经撤往了南雄、仁化。红一方面军总部据此乃调整部署，令红五军团插至南雄城以南，以阻截敌军南逃。红三军团一部奉命向仁化方向追击逃敌，但追了一段路程，未发现敌人的踪影，乃返回大余。及至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才发现大余之敌未逃跑，仍在城内固守待援。而增援南雄的粤军第四师已从信丰赶至九渡水，正向南雄集结。红一方面军总部只好命令红五军团从南雄北返罗田、州头一带。

（四）红军佯攻南雄城

7月4至6日，红三军团连续攻打大余城未下，便撤离到城外附近地区，牵制粤军。余汉谋惧怕红军再度攻城，也怕红军在城外伏击，不敢派兵外出活动，只命部队固守不动。更使余汉谋忧虑的是：红一、五军团主力集结在梅岭、中站、里



南雄旧城一角

东、邓坊一带，又把大余和南雄两地隔断了；红军某部已经占领南雄城东门外的五里山，守城的陈章旅二个团和独立三师邱桂馨团共三个团据守，兵力单薄，兼之南雄城墙低矮，容易攻破，一旦南雄城被攻占，不但大余的孤军绝援，连归路也没有了。于是，不得不放弃信丰这个据点，并在7月5日命第四师全部，6日由信丰开乌迳，7日开南雄。调据守该城的第四师张枚新部回南雄固守，还命固守南雄城的陈章部派二个团7日午后出城接应张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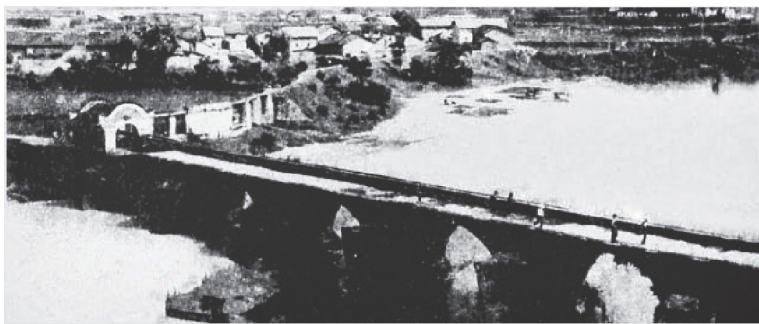
7月6日上午占领南雄城南一带高地的红五军团，向南雄城发起佯攻，与守敌邱桂馨团首先进行接触，双方互相开火，对峙。余汉谋闻讯，惧怕红军攻入城内，便立即改变主意，电令陈章部：“阳日（7日）不必出南雄东接应张枚新师”。当晚奉命从信丰撤离的张师，已经到达九渡水、山下、迳口附近。这时，方面军探知大余的守敌没有出动，而向南雄撤退的张部已达雄信边界线，便命红五军团迅速返回湖口待命。

7月7日凌晨至天亮，红军继续从城北和河南高地向南雄城发起攻击，牵制守敌不敢出城接应张师。

是日，粤军张枚新师到达乌迳、新田等地。下午，粤军独立三师和第二军第五师也到达南雄增援。方面军便命令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红一、五军团和红十二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红五军团（辖三军、十三军）和独立第三师、第六师，负责歼灭张枚新的第四师于乌迳、新田一带。

三、水口战场两军对垒勇者胜

7月7日，陈济棠增援南雄的粤军独立三师、第五师已经到达南雄。粤军调整好部署，欲以8个师兵力，从南雄与大余两地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同日，从始兴东进的粤军先后到达南雄乌迳等地，从信丰出发的粤军张枚新四师进入乌迳后，经水口、江头、白石赶到南雄县城。据此，方面军司令部命令五军团的第三军、第十三军迅速出击，消灭粤军四师于乌迳、新田一线；命令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及十三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8日早上，红五军团在进军途中得知粤四师已向水口圩逃窜，下午一时，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先头部队在水口圩以东与粤军四师展开激战，拉开了南雄、水口战役主战场的序幕。



水口战场遗址

随即，红五军团以十三军正面攻击，敌军两个团溃逃，红五军团乘胜追击。当晚，粤四师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据

守，红五军团撤回水口背面附近村庄和森林。

余汉谋接到张枚新四师水口激战受挫的电文后，取消与红军在中站、里东、邓坊一线决战的计划，于9日子时向驻守南雄城的粤军头目发布命令：一是命张达率陈章旅六个团“星夜由南雄河南岸，赶到水口策应夹击红军”；命李汉魂“率两团教导队，固守雄城”。同时，电令韶关航空站谭大队长“率全队空军，明（9日）晨沿南雄河南岸，经江头圩侦察。”

当粤军四师水口告急，余汉谋调兵增援水口之时，红五军团却误报水口之敌四师向南雄逃跑，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由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造成水口红军面临大敌的险境。

9日破晓，粤敌飞机18架自韶关飞往水口附近侦察、轰炸。方面军向五军团发出“消灭水口之敌”的命令，五军团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命十三军由箬过桥起的浈水南北岸，自西南而东向水口之敌正面进攻；命三军任左翼包围夹击。三军接到命令后，立即从箬过村附近渡过浈江，与九师会合集结于南岸，占据小高地，接受战斗任务并观察地形。同时，命令七、八师尽快由现地出发，从南面秘密向水口圩接近。

10时，敌人已发现红军的行动。此时，七、八师已进至小宇，军部召集七、八师师长、政委到小口子侦察敌情和地形，并把军部设在小口子，指挥战斗。随后便命九师以一团兵力，从桃下村（可能是塘下村）北端向水口之敌攻击前进；八师紧靠九师左翼取捷径直达水口西南地区展开，并向水口通

往大甫的石桥（永安桥）攻击前进；七师及二十三团为预备队，置于小口子对面向西警戒，此后随军部行动。如有进展时，军部则进至八师阵地，指挥各师按原命令攻击前进。

打算一早就“向江头续进”的张枚新师，尚未开拔就被五军团包围在水口圩及附近高地了。红军步步逼近，张师饿着肚子，只能据壕还击，固守待援。上午9时左右，张枚新还向李汉魂发电求援，电称：“刻敌已集结水口，向敝师阵地反攻，现全师断炊，请速派队运米取捷径送来。”由于张师占有利地形，红军一时不能取胜，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所以，直到中午12时，三军阵地上的战斗，还很平常，但各师均有进展。十三军方面也未见动静。整个上午，敌我双方都在部署兵力，暂无激烈战斗。

接到余汉谋命令后，李汉魂即命陈章先率4个团兵力前往水口接应；并从兵站运米60余担到龙眼头，接济张枚新师。陈章慢腾腾地挨到天亮，才命部队出城，将杜凤飞、梁荣球、骆秀礼三团集结于南雄东门外的五里山，一直到上午7时半才拔队起行，取道南石洞、龙眼头、黄水塘、桥背向大坪圩搜索前进。11时许，陈章旅到达大坪圩。陈章探得张枚新师正“在水口、大坑、古龙径之线与‘匪’激战中，并闻水口附近枪炮声甚密。”即命杜凤飞、骆秀礼2个团从大坪圩东南面约一里处南渡浈江，旅部及梁荣球团则在骆秀礼团之后渡河跟进。正午12时，杜凤飞、骆秀礼两团渡河完毕，又命其向大坑、古龙径前进。这时，陈章才进一步弄清状况：红三军七八千人，占领水口南面和西南面大坑、古龙径附近的高地，与张枚新师蒋

武团正在交火。便命杜凤飞、骆秀礼两团立即向张师右翼增援。

9日下午3时，战况渐趋紧张，八师已前进到距水口圩1000米左右的西南部一带高地；九师也已前进到距水口圩1200多米左右的南部一带地区；三军军部也前进了两个阵地。从水口圩东面和北面向敌进攻的十三军阵地上，则发出少量的枪声。

十三军和三军从四面迫近水口圩，张枚新师也得到陈章旅及骆秀礼团的增援，正在严阵以待。是时，方面军命令五军团要在下午4时歼灭张枚新师，结束战斗。三军军部接到命令后，作了如下部署：把作预备队的二十三团归还八师建制，并命八师从西南面向水口猛攻；又命九师从南面向水口猛攻。两师务必要把敌人压迫到水口圩而将其消灭。军部则率领作为预备队的第七师，成梯次队形向前推进，必要时参加决战。布置停当，各师准备决战。忽然接到八师报告，发现敌兵两营向该师左翼以东运动。为使决战部队不受影响，军部决定将预备队向左翼增援。

双方部署完毕，敌人遂以优势兵力首先向水口西南面的红三军阵地猛扑：以杜凤飞团为正面进攻，以骆秀礼团、蒋武团从两翼侧击。红三军指战员占据有利地形，多次打退敌人的全线冲锋，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同时在水口东面阵地上，敌四师的4个团也进行反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见状，亲自指挥五军团同敌人进行白刃战。他把外衣脱掉，穿一件白衬衣，走到阵地前沿，指挥着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战斗，分四路冲向敌

阵。“随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战士们手起刀落，敌人一片片倒下，阵地上尸横遍野，战士们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敌人一次次地进攻，又一次次地溃退，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下午4时，在十三军阵地上，敌人的进攻有所减弱。但是，三军阵地上的敌人，仍在继续猛烈进攻，三军的战士也在顽强抵抗。连续激战了几小时，三军的战士伤亡很大，干部伤亡过多，预备队已经全部参战，弹药也渐渐缺乏。战局无法扭转，敌人还在增兵。这时，三军各部只能固守阵地，没有出击能力。敌人看出三军这个弱点，即用强大兵力从左右两翼猛攻。八师及十九团，因团连干部死伤太多，失去指挥中心，各自向后溃退。九师受到八师影响也跟着溃退，全线十分混乱。于是军长、政委、参谋长亲自上阵，维持队伍，才把阵脚稳住。6时许，敌人还在进攻，三军陷入困境。刚好陈毅率领江西独立第三师、第六师赶来增援，见三军队伍凌乱，各团不待师部命令，便进入阵地与三军并肩作战。直到下午7时，才打退敌人的进攻，稳住了战局。晚间，方面军总部命令五军团选择有利地形固守待援。于是三军和独三师等先后转移到水口东南边的黄坑村集中宿营；十三军则返回浈江北岸集结露营。

当敌我双方在水口激战的时候，敌军独三师师长李汉魂和第五师师长张达亲自率领廖道明、张威2个团，于9日下午4时30分到达大坪圩，协同原在该地警戒的吴团，对邓坊、中站方面严密警戒。晚上11时，李汉魂从俘获的三军作战科长罗桂元的口供中，获悉红军“明（10日）晨当有援军”的情报，除

留吴团在大坪警戒外，又命陈伯英团由南雄开来大坪，充实兵力。李汉魂、张达二人则于10日拂晓亲率廖道明、张威2个团开往水口前线。

当天下午，方面军总部也命令“一军团及十二军紧急开往水口增援五军团”。一军团和十二军在毛泽东的亲自率领下，从中站、里东、邓坊等地出发，星夜奔驰，于10日拂晓赶到浈江畔的水口战场。毛泽东、聂荣臻、林彪一起到了设在水口桥北侧无名高地的五军团指挥所。毛泽东听了肖劲光和董振堂的汇报，了解到敌我两军的态势，又亲自观察了敌军阵地，当即向林彪、聂荣臻、董振堂、肖劲光等人部署了战斗任务：一军团增援在南岸作战的三军；十二军增援在北安作战的十三军。命令各部马上出击，坚决消灭敌人。增援部队按照命令开赴指定位置，迅速地冲向浈江南北两岸的敌军。

10日早晨，敌机18架再次飞临水口、籓过一带侦察、轰炸，投了许多炸弹后离去。



籓过村战场遗址

上午7时，十二军从水口东面向敌四师右翼进攻。五军团

总部便命令正在黄坑村整编队伍的三军，协同十二军进攻敌人。那时，据守十二军左翼阵地的特务团正遭到强大敌人的攻击，情况十分危急。三军及时赶到增援，先由九师占领一座高山。十二军、三军和红独三师同时向敌人夹攻，正面和左翼之敌均支持不住，一齐狼狈溃退。红独三师、三军七、九师和十二军特务团，衔尾猛追敌人至水口南面10余里的石背村才停止。

在水口西南面的大坑附近，红十五军占据高山，与敌陈章旅对峙。是时，李汉魂也已到达大坑山塘高地陈章旅指挥部，了解情况。据陈章报告，他与张枚新商定：陈章旅由右翼进击，“肃清”南岸的红军，至田寮下（可能是柴寮下）停止；张枚新师派队由水口石桥进击，“肃清”北岸的红军，至箭过村停止。此外，张枚新还要求拨给他一团兵力，李汉魂遂派廖道明团驰赴水口圩，归张枚新指挥。这时水口的敌人阵地上，已有9个团的兵力。另外，还有吴、陈两团在水口西面5公里处的大坪圩警戒。

上午9时许，陈章命梁荣球团向田寮下搜索前进。10时，梁荣球团行至田寮下村附近，便同据守阵地警戒的八师接触。陈章又命令骆秀礼团从梁荣球团左翼开进，与张枚新师蒋武团取得联络，共同向八师阵地攻击。仅有1000余人的八师，英勇地抗击3个团敌军的进攻。激战至中午12时，由于敌众我寡，八师阵地被敌人攻破两道防线。刚好十五军全部赶来增援，奋勇抗击，遂将敌军击溃。

水口东面的敌军右翼，在早上七八时就被十二军和三

军共同击溃了，张枚新师一部已向水口南面的石背村方向逃窜。10时许，据守水口圩负隅顽抗的张枚新师及李汉魂派往水口增援的廖道明团，在水口南北两岸遭到十二军、十三军和独六师的猛烈攻击。张枚新支持不住，也来不及向李汉魂和陈章打招呼，便抛下北岸的廖道明团，“自行退出阵地”，向南雄方向溃逃。

正在水口西南面高山上观战的李汉魂，见浈江北岸的粤军战线“常起动摇”，又据报红军有沿着浈江下游向李汉魂师和陈章旅左后方抄击模样，他心急如焚，命陈章抽调一团归他指挥，拟从右翼开往水口北岸，逆袭红军，支援张枚新师。上午11时30分，杜凤飞团奉令开到。李汉魂正拟命之出击，发现张枚新师已退到水口圩，逃之夭夭了；剩下在北岸苦战的廖道明团，又被红军截为数段，进行各个击破。而他本人也与陈章失去联络，左右均被红军包围，情况及其严重。

是时，红军主力一边衔尾猛追正在溃逃的张枚新师，一边向大坑、大坪的李汉魂、陈章阵地发动猛攻。李汉魂和陈章无法挽回战局，只有作垂死挣扎了。李汉魂命令他身边的张威、杜凤飞2个团“极力抵抗”等待大坪的吴、陈2个团前来救援。不料大坪方面同时遭到红军的袭击，不能抽调来援。李汉魂孤军作战，几乎陷入绝境。

下午2时，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第七军，从大余游仙圩转出南雄邓坊，赶到水口增援。这时，红军的进攻更加猛烈，敌人死伤无数。李汉魂深恐被红军截断回南雄之路，不得不溜之大吉。他一面命令“陈旅及骆团相继向南雄靠拢；”一面

“分饬张、杜、吴、陈各团节节抵抗”，且战且走，向南雄城方向败退。

麋集于水口战场上的粤军共11个团，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至下午4时全部溃退。红军乘胜追击，毛泽东也跟着红军的队伍一起追击敌人。军团政委肖劲光劝阻说：这里离敌人很近，太危险，你不要追了。但是他不答应，一定要追。

粤军向南雄节节败退，红军衔尾猛追，一直追到距离南雄城仅有10余公里的石塘、邕溪一带才收兵。

当天下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主力由大余赶到水口，与红一、五军团会师。这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如果红三军团能早来水口参加10日的总攻，水口之战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当年红色中华漫画

南雄、水口战役情况一览表

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池江战斗	1932年7月2日	江西大余东北部	粤军第1军第1师等部共6个团	红3军团	击溃敌4个团。
梅岭关战斗	1932年7月3日	广东南雄北部	粤军第2师第5团	红1军团一部	击溃敌1个团。
大余战斗	1932年7月4日至7日	江西大余县城	粤军第1军第1、第2师,军直属队共7个团	红3军团	围攻4昼夜,未能攻克,主动撤回。
佯攻南雄城	1932年7月6日至7日	广东南雄县城	粤军第4师2个团,粤军独立师2个团	红五军团一部	击溃敌一个团,俘敌30余人。
水口战斗	1932年年7月8日至10日	广东南雄东部	粤军第4师、第5师(一说独立第3师),独立第2旅等,共10个团	红1、红5军团,红12军,江西军区独立第3、第6师	击溃敌10个团。

四、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大力支持

在南雄、水口战役过程中，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敌作战，但红军为了发动民众支持红军作战，依然不忘在当地做好宣传工作，利用书写张贴宣传标语，就是当年开展宣传工作的一种形式。时隔64年后的1996年，广东省文化厅、韶关市文化局、南雄市文化局联合组成的揭取保护粤北红军标语工作小组，对南雄市进行调查，发现和收集到南雄、水口战役期间的红军标语就有近20条（幅），现将其中的3条（幅）附录如下：





南雄、水口战役期间，中共南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以及广大民众，从多方面给予红军大力的支持，特别是支前工作尤为突出。据肖锋《我在信康南工委的一段经历》回忆文中说：南雄、水口战役时，“南雄党就地筹组担架九百副，全部交给一方面军兵站。”^①

7月初，红一、红五军团及红十二军主力，先后进入南雄县的坪田、南亩、乌迳、邓坊、中站、东里等地。当时，南雄县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迅速组织发动民众，给红军腾房子、筹集粮草，安排食宿。

南雄、水口战役打响后，南雄地下党和游击队又积极动

^①中共南雄县党史研究室编：《南雄县党史资料》（第七期），1983年10月印。

员民众，做好支前工作。红五军团进攻南雄籍过村附近截击粤敌第四师时，籍过村广大民众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发动下，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日夜为红军烧水送饭，救护伤员。晚上，民众又把自己空闲的房子让给红军休息。

在南雄、水口战役过程中，南雄地下党在各地组织起来的担架队，及时地赶到水口前线，抢救红军伤员。油山上朔村，就出动了几百人，帮助红军挑子弹、挑行李、抬担架，把十几名伤员抬回上朔村医治。

当时，南雄地下党还帮助红军建立了一条从水口直达中央苏区的伤员运送路线，即由水口经乌迳，入孔江，上油山的畚箕窝，再转江西信丰、赣县直至于都。地下党把这项艰苦任务交给孔江乡。孔江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赵世煌，带领乡里的骨干分子，在乡内的石禾场、苗竹湾、桐子树下、兰丘、小大塘等村庄，发动群众，挑选了40多名身强力壮的中青年组成救护队。他们负责接收从乌迳方面送来的伤员，然后抬着这些伤员翻山越岭，送到粤赣边的畚箕窝，交给下一站运往苏区和各地治疗。在战斗中，参加支前的游击队和民众，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来往奔走，有的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仅上朔村就伤亡了几十人。

同时，南雄游击队也积极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主动担负军事侦察、警戒、通讯、带路等重要任务。

南雄、水口战役后，为了保证今后战争胜利的需要，决定利用粤敌主力龟缩在南雄、大余两地，一时不敢出来活动的

有利时机，朱德于7月13日发布《水口战役后部队分散整顿筹款训令》，要求各军在南雄东部地区和信丰以东，进行10余天的休整和给养筹集。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三军团一部进驻南雄的乌迳、界址、坪田等地。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主动组织民众，为红军解决所需的营地，协助红军开展打土豪和筹款活动。



2004年，水口镇政府在水口战役战场旧址上建立的“水口战役纪念公园”。

五、南雄、水口战役的教训与意义

（一）“著名的恶仗”及其教训

《聂荣臻回忆录》称：南雄“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地，对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这次战役，敌我双方出动的兵力，据不完全统计接近4万人。红军先后参战的有红五军团的第三军，第十三军，红一军团的第十五军，还有红十二军及江西独立第三师、第六师，共约1.9万余人。粤敌参战的有陆军第一军张枚新第四师的四个团，张达第五师的三个团，李汉魂独立第三师的两个团和陈章旅的两个团，加上水口主战场外的几次战斗中的十几个团，共约二万人。

南雄、水口战役时值夏季，特别是水口圩激战，正是“小暑”炎热天气，红军战士与敌人日夜鏖战，十分艰苦和惨烈。据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黄镇回忆说：“血战三天三夜，狭窄的一条湫水，血流成河，到处是尸体和受伤的战士，山谷里杀声震天，尘埃蔽日。”时任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耿飏也回忆说：“阵地真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小河里的水都是红的，一股血腥气。战士们只好忍着饥渴，互相挨靠着睡下。第二天早晨互相推醒投入战斗时，有的战士发现自己竟和战友的尸体睡在一起。”

战斗结果，敌人和红军的伤亡都很大，对此有一些历史文献和回忆录反映，但都没有很准确的数字统计。据《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一书《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其组织问题》（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一文的注释中说：“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发起池江、水口（即南雄、水口）战役。经过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等多次战斗，共击溃敌十五个团，毙

伤敌三千人……而自身（即红军）损伤两千人以上。”^①

南雄、水口战役，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击溃粤敌十几个团，毙伤敌军三千余人，但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红军消耗也很大，使这次战役成为一场击溃战、消耗战。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如像水口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这次战役，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而成为一场击溃战、消耗战，究其原因，这也是这次战役的历史教训，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战略方面的问题。

对此，当年红三军作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检阅总结：

a.此次在南雄附近作战，始则对敌情的估量过分，以致行动迟缓，终则对敌情估量不足，成轻敌之心理。特别是水口战中，始终只当成四团人打。而南雄城敌人的增援，虽估量到而不顾得到，以致

^①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521页。

在战役中，不能取得歼灭敌人的胜利。

b.过去战略时(是)一贯的，是集中力量打敌的一点，而此次南雄战役，亦曾顾得到。但水口战役中，不执行打敌一点的原则，故在战役中死伤损失较大，胜利亦颇小。

c.不能确守作战计划，将布置随时变动，以致无主攻、助攻之分。无突击部队，不能迅速解决战局。

d.动作不能协同，成为此次战役中、战略战术上的最大错误，故不能将敌人击溃消灭之，反被敌人牵制一面、打一面，而受敌人的相当打击。

e.战略正面太广，空隙太大，以致包围部队同正面部队脱离了联系。^①

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集中兵力问题”时说：“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了。”

第二，情报不准确的问题。

情报不准确，如7月8日，当红五军团奉命去水口圩堵击粤军张新枚师时，在篛过村附近击溃了敌二个团，敌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红五军团却误报水口圩之敌已向南雄逃

^①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503至1504页。

跑，第二天南雄援敌与水口圩敌军会合后，以优势兵力向红五军团猛扑，但红五军团却仍然“错把9个团的敌人当成4个团来打”。以至驻扎在距水口圩只有二、三十公里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根据错误情报按兵不动，没有及时向水口方面增援。而敌军7月1日在红军攻打池江战斗中，从一位牺牲的红军参谋长里得到了红军的密代码本、文件和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6月25日发布的命令，从而得知红军的作战意图和兵力布置，9日又从被俘的红三军作战科长罗××口中得知“明(10日)晨当有援军”的情报，也决定增兵水口圩，形成双方向水口圩增兵的局面，致使此役不自觉地同粤军打成一场势均力敌的击溃战、消耗战。

针对在南雄、水口战役中出现的情报严重问题，朱德在当月的20日，就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各级指挥员应及时准确报告军情》的训令，强调今后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灵机应变的处置，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地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红军要切实注意加强“军与军的联络、师与师的联络、团与团的联络”，要“使战线一致行动毫无缝隙可乘”；军事公文“无论命令、通报、报告，首先要写明发出的时间及地点”；指挥员的“指挥阵地及指挥机关应审慎地选定。在战时不容许随便移动，若已移动必须通知各级指挥机关，以免失掉联络。”

对于上述两方面的教训问题，周恩来在当时的《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一文中，也有如下一段记述：

这一战役主要的错误是行动迟缓犹疑，分兵应敌，未用大力先解决张枚新，想用过去在苏区作战方法讨巧，反倒引起敌人分进合击，以致不能乘胜直追，不能继续开展当时胜利局面。这仍是对敌人进攻估量不足(如几次轻信敌退，而不重视与估量敌之增援)，与过去游击战略及苏区内部作战战略未能转变缘故。其他在战略战术上亦对敌情估量不正确，报告不确实，各部队联系不好，机动未能配合，尤其是最高指挥机关在组织上、在布置上均有许多缺点与错误。至粤敌顽强难缴枪，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在白军中工作尤其是在粤军中工作完全没有

第一版 **華 中 紅 軍** 日四十月七年二三九一

致前方紅軍戰士電

英勇的紅軍戰士們：捷電傳來，欣慰我英勇果敢的紅軍戰士自西連以來，奮勇殺敵，迭獲偉大勝利，在度信捷之間，與粵敵血戰數次，尤其是最近一役，竟因博三晝夜，先發擊敗素稱頑強的粵敵十七八團之衆，予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對蘇區和紅軍的圍攻以迎頭痛擊，使廣東軍閥聞風喪胆，並震盪全國的反動統治，使爭取江西及鄰省首先勝利的實現，就在面前，竊維埃中央對我前方紅軍指揮員戰士們的英勇決斗，致以熱烈的欽敬與慰勞，對傷亡戰士，致無限的哀悼和敬意，尤望我全體紅軍戰士繼續勝利。堅決進攻，徹底消滅粵軍閥的武力，奪取沿贛江的中心城市，實現江西及鄰省首先勝利，我們更相信在廣大工農羣衆熱烈擁護及互相呼應之下，將因你們的勝利而聯合全國的革命力量更加擴大民族的革命戰爭，去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統治，驅逐帝國主義，爭取全中國革命的勝利，紅軍戰士們：中央政府正領導全蘇區工農羣衆擁護和配合你們的勝利舉行向敵人的總攻擊，保衛蘇區，衝鋒復街鋒，摧毀中國竊維埃革命的經濟源頭，淹沒帝國主義國民黨的血腥統治；使蘇維埃的紅旗隨着你們的勝利，插遍全中國。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啟

紅色中華

第七十二期

日四十月七年二三九一

本定價	七洋
零售	二角
郵費	二角

南雄、水口战役胜利后，《红色中华》致电红军战士

的缘故。^①

（二）南雄、水口战役的历史意义

南雄、水口战役，从当时处于敌强我弱，红军急需发展壮大情况下看，与敌人打成消耗战，对红军来说显然不利，得不偿失。然而，这次战役，虽然击溃多，歼灭少，消耗多，补充少，但从战役的目的和战后的时局发展来看，仍有它如下的历史意义。

首先，南雄、水口战役沉重地打击了粤敌进攻红军的嚣张气焰，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了稳定。

1931年9月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继续不断地部署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红军进行“围剿”，赣南苏区受到粤军的巨大威胁。为了打击粤敌，巩固中央苏区，根据国民党对苏区进攻的新部署，中共临时中央和朱德与毛泽东分别于6月5日和21日，发布训令和命令，要求红一、五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共同消灭入赣粤敌。

7月1日至10日，红一方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经过池江、梅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粤敌十五个团，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进攻红军的嚣张气焰，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一段时间得以安宁和发展，为红军尔后的作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朱德在南雄、水口战役后三天的《训令》（水口战役后

^①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523页。

部队分散整顿筹款的训令)中指出：“我方面军在水口战役后，回答了入赣粤敌半年来对革命的进攻，争取了足以控制粤敌入赣信丰全县及南雄东部地区，完成了打击粤敌、巩固革命向南发展的后防的任务。”^①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宁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②水口战役后，粤军主力龟缩在南雄、大余两地，一时不敢出来活动。当时，朱德针对方面军的现状，为了保证今后战争胜利的需要，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发布《水口战役后部队分散整顿筹款训令》，要求各军团在南雄东部地区和信丰以东，按规定的圩镇进行10余天的休整和给养筹集工作。具体安排：红一军团以坪田圩为指挥中心，占有乌迳、界址圩、极富以南、崇山、江口、罗吉、东坑以西地区，筹款5万元；红三军团以老界址圩为指挥中心，占有乌迳、界址、极富以北地区，筹款5万元；红五军团以铁石圩为指挥中心，占有干载、安息、石背以南崇仙等地，筹款5万元；红十二军以固陂为指挥中心，在固陂附近工作，筹款三万元；独立第三、第六师担任赤化信丰河下流的任务。这一工作的开展，为向北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7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向北转移，开往兴国县南郊。8月

^①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483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中下旬，红军主力在一周内，连续攻下乐安、宜黄、南丰3座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高树勋部，俘敌五千多名，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品一大批。此役的胜利震动了粤赣闽三省的敌军，使之纷纷进行布防自卫。这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和巩固，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红军在南雄休整和筹措给养地之一的坪田

其次，粤军虽在南雄、水口战役遭受重大损失，但更使陈济棠深感与红军正面大规模作战对己不利，加上与蒋介石的矛盾，为了保存自己，以保护广东半独立局面，陈济棠在后来的南线战场便采取明打暗和的对策，并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协议，为后来红军长征突破第一至第三道封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粤军在南雄、水口战役受到的损失是粤军入赣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此后，陈济棠很快在收缩兵力缩短防线，采取以防为主的策略，再不愿前进半步。8月29日，何应钦致电陈济

棠，请其增兵吉安，陈济棠复电吉安路遥，运输不易，拒绝增兵。至1934年10月，粤军基本上将战线稳定在武平、寻乌、安远、信丰、赣县、南康、大余一线，未更多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

1933年至1934年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陈济棠部为南路军，派了10个团的兵力入赣，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济棠部多次与红军交火，对红军的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粤军的损耗也越来越担忧。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的军事部署上北重南轻。陈济棠认为这一部署的目的是把红军赶到粤境。当时，陈济棠不得不考虑红军反击和蒋介石借迫红军攻粤的双重冲击。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陈济棠必须采取对策，一面加强粤北的防卫，一面寻求与红军秘密妥协，在得到“只要广东不出兵，红军也绝对不来犯广东”^①的保证后，决心调整与红军的关系。1934年4月，国民党攻占苏区北大门广昌，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陈济棠在南线派出李扬敬的第3军组成南路军向寻邬、安远、筠门岭等地进攻。占领筠门岭后，“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进攻，摆出打的架式”，“另一方面暗地给我们送来一批弹药。同时又秘密派他的高级参谋扬幼敏赴筠门岭作试探性的谈判”。^②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②《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323页。

1934年10月上旬，朱德、周恩来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等在寻乌进行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双方达成同盟停战，互不进攻对方，互通情报，互相借道，“这一协议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①。

长征初期，红军突围到粤北边界时，陈济棠基本上执行了双方达成的协议，使红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比较顺利地突破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迅速地向西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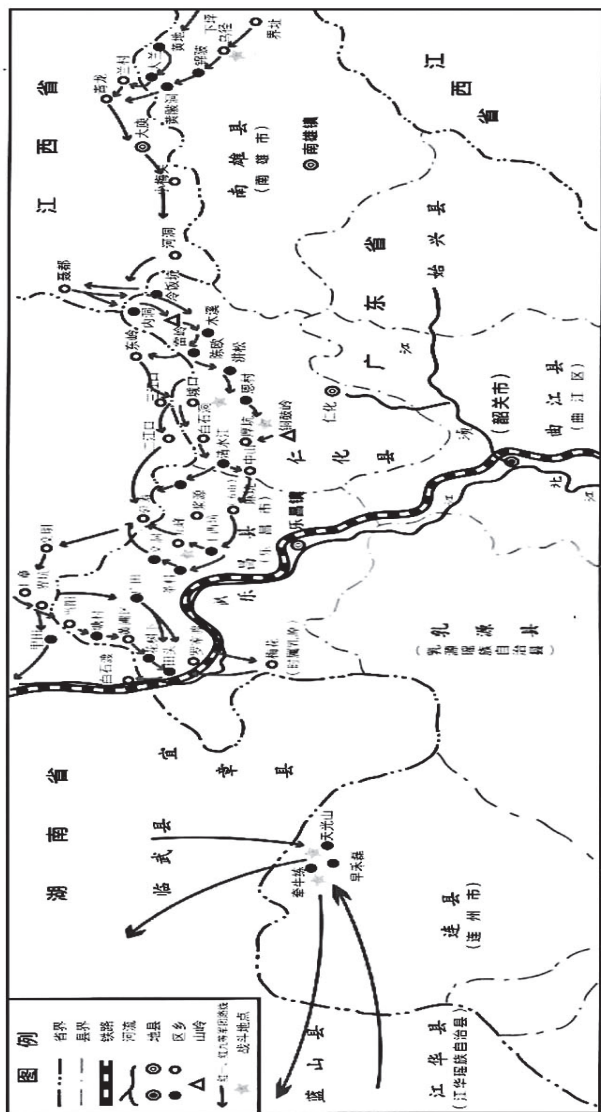
^①[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第六章

中央红军长征穿越韶关

(1934年10月至11月)

1934年10月上旬，历时一年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而失败，中央红军（亦称第一方面军）被迫向西突围转移进行长征。在突围期间，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如下简称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与周恩来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决定与陈部谈判并达成协议，为红军突破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行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长征穿越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乳源等县，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当地民众的配合与支持，也为韶关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和精神财富。



红军长征过粤北路线图

一、突围长征过南雄

（一）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南雄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苏区遭到惨败后，便于1933年9月25日调集50万兵力，趁中央红军分离作战之机，完成分北、南、西三路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以北路军第八纵队的三个师由南城出发，经硝石进攻黎川，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又调集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7月上旬，国民党军调整军事部署，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上旬，国民党军已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红军已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至此历时一年，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英勇奋战。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兵力严重损失，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西征。

中央红军西征前夕，与蒋介石矛盾素来很深、担任第五次“围剿”的南路总指挥陈济棠，为防止红军向南突入广东，也不愿蒋介石乘机由赣入粤，夺了他的地盘，一方面派粤军第二军第四、第五师两个师增援赣南，归余汉谋指挥，并调整布防，把重点防务摆在安远至信丰地段，形成一条以信丰桃江为天堑的南北长120度公里，东西宽50度公里的弧形封锁

线。另一方面，决定派出代表秘密与红军谈判。9月间，陈济棠派出密使李君到瑞金，联络停战谈判事宜。

为使红军从赣南顺利突围转移，周恩来与朱德决定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同意与陈的代表谈判。9月底10月初，朱德亲自起草并经周恩来修改给陈济棠复了一封信。信中说：“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请示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信中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恢复贸易之自由、切实武装民众、为红军代购军火等五项建议，“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并说，日内党派员到会昌筠门岭同陈的代表就近商谈。

10月5日，朱德致信驻防江西会昌县筠门岭地区的陈济棠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楨，告以：我方应陈济棠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人为代表，前来与贵方代表杨幼敏、韩宗盛协商一切，请予接洽。当日又和周恩来联名致电红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政委黄开湘：

“粤方已约我代表在寻乌相会，我方派潘健行、何长工



寻乌谈判旧址

于明日动身，七日午过站塘，拟当晚即到门岭。望于明早派原侦察班长持你们致黄师长信，告以我方接粤电约在寻乌协商，现潘、何两代表于七日可抵门岭，约其派员到白铺以北相接。”双方代表在寻乌县罗家塘镇谈判三天，达成了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谈判结束后，何长工等即离寻乌，返回会昌。这时，中革军委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于都，周恩来特地派人在会昌等候，并留下一封信，信中说：“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何长工到于都后，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听后异常高兴，说这对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的作用。的确如此，这次谈判，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继续西征穿越粤北韶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以及机关共有86000余人开始战略转移。参加转移的部队有：林彪、聂荣臻领导的红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的红三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等领导的红五军团；周昆、黄甦等领导的红八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等领导的红九军团；以及叶剑英领导的军委第一纵队、李伟换和邓发领导的军委第二纵队。突围转移的行军队形分为左、中、右三路，以红一、三军团分别为左、右两路先锋，红九、八军团分别为左、右两路后卫，中路为中央第一、二野战纵队，红五军团担负整个野战军的后卫掩护任务。

10月16、17日，中央红军根据中革军委制定的南渡贡水（于都河）计划，开始分别从十个渡口渡过贡水，向突围集结地开进。10月18日，朱德于总司令部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十月二十一日《突围战役命令》，明确“我野战军目前的总任务是：（一）确定占领固陂（指信丰县古陂）、新田地域；（二）前出至坪石、安息、石背圩之线，以便继续于信丰、龙南之间渡过信丰河。”确定各军团各自攻击路线和目标，要求各军团于十九日晚开抵“各进攻出发地”，完成进攻前的准备，分别于二十日夜半后发起总攻击。20日，朱德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首长，重申突围命令：鉴于三军团未能赶到二十日的指定地点，“为保证各军团行动之协调及同时动作，总攻击改在二十一夜至二十二日晨举行”。在发起攻击前，各军团要加强侦察及战前准备。21日夜，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开始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红一、三军团分为左、右两路，向赣城、信丰、安远一线的韩坊、古陂、金鸡、新田之敌发起进攻。红九、八军团分别随红一、三军团跟进，军委第一、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

10月中下旬，中央红军将要突破国民党在赣南安远、信丰一带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时，国民党并未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有的判断“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分留在中央苏区；有的认为“朱、毛出去是主力”，留在苏区的是少数；还有的分析红军可能是声东击西，“故意弄一部分向西，而大部分留下向东”发展。因此，蒋介石举棋不定，令“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主力集中待命。

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即令李敬杨纵队撤回粤境，余汉谋纵队从重石、版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总退却。另外，陈济棠没有及时把红军和粤军谈判达成的秘密停战协议贯彻到粤军驻赣南部队，红军与粤军在赣南的安远版石、信丰的新田、金鸡、古陂和赣县的韩坊等地，虽然也展开一些激烈的战斗，但粤军边打边退，没有对红军堵截。因此，在10月23日至25日的几天时间里，中央红军全部很快相继渡过信丰河（桃江），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顺利通过陈济棠的管区。接着，红军一、三军团派出一部兵力，监视信丰、安西、安远这三点之敌。然后，红军相继渡过信丰河，向赣粤边界推进。

10月23日，红军大部分渡过信丰河，朱德就红军渡过信丰河继续西进，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首长：“野战军于渡过信丰河后，除八军团于南康、大余向西进外，其余均于大余、南雄之间西进，对安息、信丰之敌只当监视部队。”并指示：二十四日晨，八军团应前出到大龙、坳头地域；三军团应前出到大塘铺、大江圩、铁石口、石材圩地域；九军团应到达马丘、枫树下、石门径地域；第一纵队应到达杨坊地域；第二纵队到达古陂、大桥头地域；五军团应到达小盆、双茆地域。“除五军团与第二纵队外，其余各兵团应停止后送伤病员”。25日，朱德为中央红军西进赣粤湘边境、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一、二纵队作出部署：“野战军从二十五日晚继续向西，约向汝城地域前进，北面以沙田、南面城口（均含）为前进时的分

界线。”前进时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前出到江西大余和广东南雄地域，主力则于大余、南雄之间通过（两城市均不含）；第二阶段前出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继占领汝城。还对各军团第一阶段的行动作出了具体部署。次日，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将此命令变更为：“野战军改向北转，而前出至大余、贤女埠，在大余、崇义之间西上。”

10月25至26日，红一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西进计划，经信丰的石村圩、小河、万隆直插南雄的界址、乌迳一带。

南雄县界址圩，是中央红军穿越广东的第一个圩镇。10月25日，朱德致电各军团，要求就地征集供给（没收或收买，要求严守阶级路线）。中央红军长征相继进入界址圩的部队有数千人，一面休整，一面筹集粮食补充给养。



红四军经过的界址圩

（二）激战乌迳向粤赣湘边挺进

长征部队进入界址后，很快又向乌迳圩转移。乌迳地域，是江西信丰通往广东南雄的枢纽，又是红军长征向西挺进

的必经之路，也是敌人南线第一道封锁线的中间要冲。第一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陈济棠为防止红军进入广东，已派南路军主力撤至大余、南雄一带。长征的红军进入南雄界址、乌迳后，粤敌也已来这一带守防。

红军从江西信丰突围进入广东南雄时为10月26日，为了防备粤敌阻击红军，军委向各军团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发出密电指出：“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虏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当时，红军与粤军在寻乌谈判达成的秘密停战协议，尚未贯彻到粤军驻赣南和粤北部队。红军为严守突围的秘密也没有向下级传达秘密协议的内容。这样，红军从江西信丰突围进入广东南雄界址、乌迳时，粤军依然以武力阻击红军。因此，红军进入乌迳与粤军展开了几次战斗。

1、乌迳新田战斗



新田之战战场遗址

一军团前锋部队进入乌迳新田后的10月26日拂晓，发现粤军一个连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滞红军的行动，使其主力跟上截击。为了迅速扫除占据乌迳的障碍，一军团决定派直属侦察连前往消灭乌迳新田之敌。连长刘云彪接到战斗命令，立即率全连160多人分三路向正在修筑工事的敌人发起进攻。中路正面攻击敌军的一个排首先发起猛烈的射击，歼敌10余人，左右两路的红军也向敌阵地发起攻击。敌军发现被围攻，一边慌乱还击，一边沿着一条小山沟逃命。这次战斗，歼敌20多名，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是红军入粤后的第一仗，也是一次胜仗。

2、进攻乌迳圩战斗

红九军团二师四团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越过信丰后，受命担任前锋并在10月27日下午2时前“拿下乌迳”。该团接到命令时，距离乌迳有160里，团首长作了动员部署，要求部队“不怕疲劳不怕艰苦，发扬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精神，坚决夺取乌迳，肃清前进道路。”随后，部队连夜出发，向乌迳方向前进。路上，有的战士兴奋地说：“莫说160里，320里也不怕，他娘卖皮，无论如何亦拿下乌迳吃午饭！”

27日早上，红四团挺进到离乌迳圩还有20里的一个地方停下来进行休整。当时，团长向群众打探敌情，得知乌迳圩只有敌军一个连，敌大部队在圩外五里驻扎，便组织部分部队组成便衣队，绕小路由乌迳圩进攻。

关于红四团这次攻打乌迳的战斗，时任宣传科长的彭加伦曾在《胜利后的一幕》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回忆：

“啪！啪！啪！”

“前面打响了，跑步前进呀，快缴枪去呀！实行缴枪比赛呀！”干部和党团员都这样一面跑一面叫着，进行进入战斗的鼓动。

于是越打越密了，机关枪、手榴弹，像过年时开财门一样的热闹。

我们正面只不过用了一个排的兵力，敌人总是只顾正面耀武扬威的扫射，哪知道事出意外，敌人后面街上也打起来了，两面夹攻来了一个里应外合，敌人就在这一个猛冲中像水鸭子一般的坍了下去！眼快手快，我们的便衣队早已把他截住，整整一个排就这样拱手被擒了，其他照例是夹着尾巴逃命。部队仍然跟踪追击，直追出乌径以外五里处与该处的四个团交战起来。结果双方对峙着，乌径就这样胜利地占领了。此时还是正午12时，拿下乌径吃中饭的口号是胜利地完成了，真是伟大的红色英雄们呵！

……

天色将近黄昏了，集合出发的号音又四处响彻起来，队伍又在这夜色中重上征途了。^①

3、乌迳阻击战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编：《红一方面军卷》（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505页。

红军赣南突围时，中央红军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二梯队。红军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后，教导师通过艰难的行军，于10月下旬进入江西与广东交界的乌迳地域，在此与粤军展开了一次阻击战。对此，时任中央红军教导师特派员裴周玉在《踏上艰难的征途》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回忆：

不久，我们背着“包袱”来到与广东交界的乌迳镇。这时，我们根据总部首长的指示，接替一军团在南雄、水口方向担任警戒任务，要坚持一天一夜，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以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这是教导师成立三个多月来第一次担负着这样重大光荣的战斗任务。张师长、何政委亲往一团与团长文年生同志一起率领该团去执行这一任务。部队到指定地点后，选择了有利地势，匆匆忙忙构筑了简单的工事和掩体。下午敌人大部队赶到这里，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发起冲锋，而且，一次猛似一次，接连六次都被我军击退。当时我们用的枪又破旧又落后，打几发子弹就得用通条通一通枪膛，才能继续击发，这给敌人的进攻以喘息的机会。敌人凭着人多火力强突破了我军阵地前沿。面对几倍于我的敌人，战士们毫无畏惧，端起步枪，上好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争夺，阻拦着敌人不能前进一步，经过反复争夺，阵地终于又回到我们手里，敌人还是无法前去阻击红军主力。这一仗是教导师打的第一个漂亮仗。阻击任务完成后，一团就

胜利撤出战斗，跟上五军团后卫继续向前挺进。^①

4、乌迳、界址边界战斗

红军赣南突围时，红二十二师由红九军团指挥，代号为“巴口”，担任九军团的后卫。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红二十二师由信丰进入到广东南雄界址，担任对南雄方向的警戒任务，负责保障红军主力部队左翼的行动安全。此时，粤军先头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由南雄乌迳向界址推进，红二十二师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上午11时战斗打响，红军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连续不断地击退了敌人的反复进攻。战斗至黄昏时，敌人才溃退，红军接着也撤出阵地，跟上主力向大余方向疾进。这次战斗，是红二十二师出发后的首次战斗，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受到上级的好评。

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二师离开界址，前往大余的板栅下过章江，经青龙黄龙向崇义前进。

以上这些战斗，虽然不是大仗，但也有力地打击了企图阻击红军的粤军，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对红一军团和其他长征部队顺利占据和通过乌迳而西进，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新田一仗结束时，红军进驻新田村与村民共庆“姓氏节”，至今在当地还留传着一段佳话。新田村是南雄最古老的村落，全为李姓，当时有1000余人，大祠堂10余座。红军进驻该村时，为农历9月13日，正逢“姓氏节”，此节当地每年都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一方面军卷》（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595页。

过几乎与春节一样热闹，村民不仅把酒菜送给红军吃，还邀请红军一起参加“姓氏节”，另外还把最大的几座祠堂供红军住宿。红军临走时，不仅把祠堂打扫干净，还在村中开展革命宣传，村中的墙上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红军所写的“焚烧田契 [借约]！”标语。



红军经过的祠堂

10月26日，红三军团经信丰县小河、正平、九渡到达南雄油山，红三军团及中央纵队在油山稍事休整。油山是南雄的革命老区，游击队长期在此进行活动，1929

年初朱德就曾到过此地，因此这次到来很快就与当地游击队取得了联系。27日，朱德在油山就红军重伤战士分送油山游击区问题致电林、聂、罗、蔡（即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

“一、九军团须抬的重伤战士，十日内不好者，可分头送油山游击区，与当地党及政权机关交涉，妥为安置，每名并发给休养费八元，留治好后，可即在该地加强与发展游击战争。”红军在油山时，游击队为红军筹集了一批物资；红军遵照朱德的命令，在油山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外，还给当地留下了一批工作人员并安置了200多名红军伤员。

10月27日后，进入南雄的红军分两路相继向江西大余县境内前进。29日7时，为部署红军西进军事行动，朱德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一、二



红军经过油山时的情景

纵队首长，通报敌情：“粤敌第一军部队现集结于大余、南雄、新田地域，湘敌主力现向赣西及湘赣边境集结，而二十六师的主力正向汝城开动，而周（浑元）纵队之四个师亦向遂川集结，其企图是使我们还未进到湘南时，从两侧翼进攻我们。”指出：“为取得先机之利，野战军于十一月一日应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并通过湘敌由沙田到城口在战略上的第一道纵的封锁线。”指示各军团前进路线及任务：三军团有占领汝城的任务，并于暖水、大坪间打开自己前进道路；一军团须消灭从南面进攻之敌，于大坪、城口之间打开前进道路；八军团掩护野战军右翼，于三军团之右侧后前进；九军团掩护野战军左翼，于一军团左纵队后跟进；五军团有掩护野战军后方的任务，在军委一、二纵队后跟进。

10月30日前后，由南雄前往大余的红军经崇义，继续向西沿着粤赣和湘粤边向湖南汝城和广东仁化城口前进。

二、进攻仁化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一）进攻仁化城口的部署

中央红军将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蒋介石电令南路军和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

当时，国民党南路军已把主力撤至大余、南雄、安远等地取守势，以防红军进入广东。西路军何健部队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国民党中央军还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冈、石城等地，短期难以赶到湘南和粤北地区。据此，朱德在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的10月25日，决定乘敌人尚未弄清红军西征意图之际，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一、二纵队首长，部署野战军从即日晚起，沿着赣粤和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汝城和广东边境的仁化城口方向前进。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探悉红军相继进入赣、粤、湘边境，判断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便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和紧急调动部队：“令陆军顾祝同第六军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四个师西进，协同南路军、西路军追击红军。”令航空队协同作战；西路军何健命六十二师陶广部布防在汝城县的羊牯、连珠岩、土桥一带；南路军陈济棠余汉谋部第一师李振球，从大余出南雄、曲江向乐昌、坪石相继堵截红军。第二师叶肇部及独立第二旅（当时划归叶指挥）从信丰出大余向仁化长江、城口和乐昌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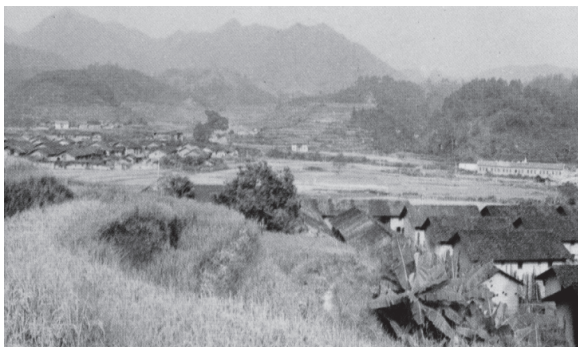
的九峰方向，专事衔尾追击红军。令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镇守曲江、仁化县城（师部设在韶关即曲江县县城）。令陈汉光率独立警卫旅第一、三团开往仁化县前沿阵地，直接阻击红军；与此同时，还令粤、赣、湘边各县加强警察、保安队、民团的军备，投入战备戒严，扼守碉堡、碉楼，封锁山隘要道，强化乡里制度，清查户口，处理食盐，集中粮食，实行坚壁清野和经济封锁，制造白色恐怖，企图把红一方面军堵截在第二道封锁线以内，加以围剿。

红军西进时，在后面追击的国民党薛岳部队正在行进途中，得知红军主力已通过余汉谋部防线，正向湘粤边境西进。薛岳不得不放弃他从赣南出击迫使红军退入广东的计划，而寄希望于第二道及第三道防线。他命令主力部队第四军及第五军经遂川向汝城前进，一部分经桂东向资兴前进，将主力部队集结于汝城附近。

当时，陈济棠表面上对部队也进行了调整，好像在配合蒋介石行动，实质上是对蒋介石以“围剿”红军之名，行消灭异己之实的阴谋深怀戒心。为顾全与蒋介石一致的面子和保卫既得利益，显示实力，防止红军直下仁化，威胁韶关，以保卫广东，他实施了迫使红军尽快离开的军事行动。这为红军突破蒋介石在仁化城口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条件。陈济棠当时派往仁化的部队并不多，与红军也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据何长工回忆说，由于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定，使10月29日中央军委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命令后，我军在很短时间里，胜利通过了陈济棠的管区。

10月29日，朱德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第一、二纵队首长，决定我红军为取得先机之利，应于11月1日进入汝城、城口、长江等地域，以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随后，进攻仁化的红军先后进入长江，然后向城口挺进。

10月30日，林彪、聂荣臻令第二师向城口急进。



红一军团宿营地旧址——仁化长江陈奢

10月31日，左翼红一军团二师先锋别动队为前卫，六团、四团为后卫，由江西崇义县的聂都出发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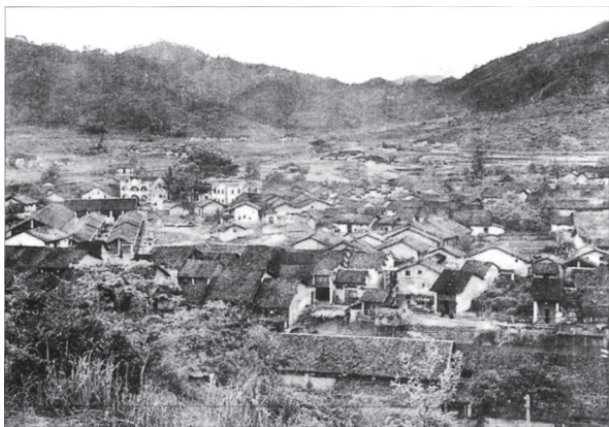
11月1日进入仁化长江。同日，红一军团部直属队在聂荣臻率领下，也由聂都出发进至长江。11月2日，红十五师从聂都出发，亦进入长江地域。红一军团部从长江犁壁岭移驻陈奢。红二师四、六团分别向三江口和城口方向进军。继此之后，先后进入长江地域的红军有：红十五师于11月3日进入长江西北地域；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各一部和红八军团一部，分别于4日5日进入长江；红九军团于6日进入长江，后向城口挺进。

（二）奇袭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日上午，朱德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军

委第二纵队首长，部署进攻汝城、城口，以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计划。指出：“迅速通过湖南边境之第一道战略上的封锁线，对于以后部队行动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要求各兵团到二日晚止：红八军团到达樟溪、豪头圩地域；红三军团之两纵队接近汝城，准备于三日晨进攻汝城；红一军团右纵队占领大坪，左纵队占领城口；红九军团进到朱洞、塘铺及里洞的地域，军委第一纵队进到文英地域；第二纵队到达井塘、老虎坳及聂都以北地域；红五军团右纵队进到关田地域，左纵队进到沙溪地域，掩护军委两个纵队。

11月2日，红三军团一部占领了汝城东南的制高点并包围汝城。同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从长江陈欧进入湘境东岭，经八丘田，集结于三江口地域，截断敌湘军主力六十二师陶广部与粤军间的联系，从北面警戒，遏制城口。红二师六团从浒松乡进入城口东坑分道：一部从坳背折向牛皮洞等地后，越过



城口圩旧貌

城口河，进入恩村、厚坑地域，从外线执行截击城口敌人退路和阻击仁化追敌任务；一部经老屋、塘湾等地，插到水东桥头侦察敌情，警戒城口镇方向，并与进入三江口地域之红军部队，形成对城口镇的钳形包围之势。

城口圩位于湘、粤边境，四面群山环抱，粤、湘边古道贯于其中，地势险要，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在赣南突围西征时，蒋介石就把城口作为“追剿”红军的第二道封锁线的中心据点，并在城口周围修筑碉堡、炮楼20余座，企图消灭西征红军。城口周围碉堡、炮楼多由保安大队、民团扼守，圩内驻军只有粤军一个连和部分保安队。红一军团二师团六团团长沙水秋、代政委王集成分析了城口敌人虽设防坚固、有精良武器、但守备人数不多的情况，决定采取乘敌不备，突然袭击，夺取城口镇的作战计划。

2日晚20时，负责主攻城口的二师六团第一营，首先潜伏到水东桥头百米处，将敌哨兵俘虏后进入城口镇内，守军



城口五里山碉堡

和保安队纷纷举手投降。与此同时，在三江口地域的二师四团发起进攻，据守在山上碉堡、炮楼和哨所的敌

军和民团弃岗逃窜，红军很快占领整个城口圩。这次战斗，共俘敌军、民团、保安队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几百支、子弹一万多发。对于这次战斗，中革军委给予高度评价并通电全军：“红一军团前锋于二日，占领了敌第二道封锁线上重镇城口，突破了敌人的封锁。”

关于奇袭城口的详情，担任其任务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后来在《奇袭城口》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回忆：

我和唐参谋交换了一下意见，按原定作战计划，命令侦察排夺取桥头阵地、和三连一起解决镇内的敌人；一、二连立即迂回包抄两边的山岗，摧毁敌人在山上的碉堡。

侦察排根据我们的意图，立即指定十几个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桥的上游和下游泅渡过去。待泅渡的战士下水后，我带领部队大摇大摆往桥边跑。对岸草棚里灯火通明，五六个敌人正围在一起赌钱。我决定继续迷惑敌人，先炸桥，炸不成再用武力夺。敌人桥头哨兵见河对岸突然跑出一支队伍来，惊慌地喊道：“什么人，站住！”说着打开五节手电，刺眼的光柱在我们的脸上扫来扫去。几个侦察员厉声骂道：“照他妈什么？再照，老子崩了你。”“你们是什么人？”那家伙不甘示弱，战士们更横：“老子是中央军，让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说着，噔噔上桥直闯过去。敌哨兵把枪栓一

拉，“不许走，再走我就开枪！”然后转身朝棚里喊道：“班长、班长，中央军弟兄要过来，让不让过啊？”棚里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问一下他们，是不是陈长官的队伍！这样吧，让他们先过来一个，老子问问清楚。”“是。”那个哨兵转过身来朝我们喊道：“你们听着，先过来一个。”“一个就一个。”已经上桥的一个侦察员气呼呼地提着枪往前走。在他身后的两个侦察员也机警地跟上去。我示意机枪准备掩护。走在前面的侦察员一边走一边骂：“叫你们班长出来，真他妈瞎了眼，老子吃辛受苦，你们倒自在，在这儿赌钱！”说着连跑带跃地奔到桥头，那个哨兵见他来势很猛正不知所措，我们的英雄甩手一把把他撂倒在地。与此同时，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在草棚里爆炸了，原来是泅渡水的勇士们已经上了岸。我见夺下了桥头阵地，把手一挥，战士们便似猛虎般地扑过河去。刹那间，冲锋号声伴和着枪声、手榴弹声和战士们威武的呐喊声，在古镇上空响起。敌人被这突然的一击打懵了，民团团长慌慌张张带着一股队伍夺路而逃，不料一上山就遭到我一、二连迎头痛击，混乱中这家伙被击毙，逃跑的敌人纷纷投降。在镇里没有跑出去的敌人见团长逃跑，哪还有心思抵抗，乖乖地枪扔到地下。前后不到3个小时，我们俘虏了300多敌人，缴了200多条枪，控制了镇子周围所有

的制高点，胜利结束了战斗。^①

红军攻占城口后，中共军委和朱德对红军继续西进，作了一系列的部署。

11月3日8时半，中革军委致电彭德怀、杨尚昆：依据你们来电报告，应放弃进攻汝城，但应派出一个师监视汝城之敌并钳制之，指出“你们的基本任务，是要打通两条可靠的道路，以保证野战军通过此道封锁线”。第一条道路是，经土桥圩、新塘地域，或经田庄圩、暖水圩地域、向黄草坪前进；第二条道路是，经天马山、大来圩、官路下地域，向文明司前进。并告：从五号起，约为我们通过时间。同日10时，朱德急电林彪、聂荣臻，指出红一军团亦有打开两条道路相继攻占城口的任务：一条是应经大坪、新桥地域向九峰圩，这是主要道路，一定要争取之。另一条路则经城口或以南之恩村向麻坑、岭子头，为左侧翼的道路。特别要详细侦察城口的情形，可能时则占领之。并告：野战军司令部现在百担丘，三号晚向热水圩移动。同日16时，朱德致电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罗迈、邓发，部署红五、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向热水、塘口等地域移动。

11月4日4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基本同意红一军团三日二十时来电关于巩固城口，掩护红三军团向城口、大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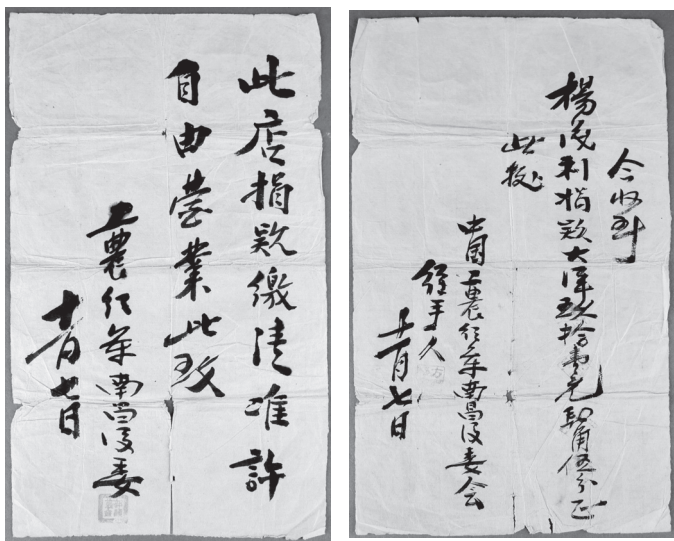
^①曾保堂：《奇袭城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一方面军卷》（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82至483页。

之线前进的部署。指出：“城口应顽强地保持于我们手中，并向南北两面扩张，以便在三军团的地段内，确实能争取两条前进的道路，并侦察有无补充道路，迅速电告。”同日12时，朱德又致电董振堂、李卓然：“五军团（欠三十四师）于五号早进到塘口、八担丘地域，有掩护第二纵队抗击由东面来追之敌的任务；三十四师进到乐洞地域，有掩护第二纵队抗击大余、长江之敌的任务。”并告：军委第一纵队五日早进到八丘田、三江口地域。同日13时半，朱德又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军委预拟于城口、高排之间，并从五号或六号晚通过封锁线。为避免过多部队猬集狭小地域，缩短通过时间，必须取得第三条道路，以便三、八军团通过。”要求红三军团“如实际情况由汝城之间向黄草坪确实难打开一条路时，则无论如何应于汝城、大坪之间打开由官下经店圩到百丈岭的道路。”并对具体行动作了部署。

（三）城口休整与铜鼓岭战斗

红一军团二师主力部队攻占城口的第二天一早，红一军团部直属从长江陈奢出发，经湘境东岭、八丘田到三江口宿营，为红军主力部队筹集军饷、集结部队，顺利继续西进，命令二师四团和六团在城口进行短暂休整。红军在城口休整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如访问、开会、演讲、贴标语等，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宣传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宗旨。同时，开展打土豪劣绅、资本家，筹措军饷，救济劳苦大众。当时红军指令广和安号、义兴号、广盛号、鸭厂等老店老板交款二万元；没收田心乡、上寨乡、恩村乡大地主、土豪的粮

食、物品一大批。这些粮食和物品，一部分作为部队所用，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和居民。



红军长征时在城口留下的票据

红军在城口休整时，粤军独立警卫旅第三团部分兵力，从仁化县城向城口进军，企图在仁化通往城口要冲的铜鼓岭阻击红军。11月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部为了扫清红军西进道路的敌军，前往铜鼓岭痛击粤军。历时两昼一夜的铜鼓岭阻击战，国民党粤军伤亡80多人，红军伤亡100多人。这次战斗，红军虽然伤亡较大，但遏制了敌人，将敌人牢牢地控制在铜鼓岭南麓一线，掩护了红军主力后来安全通过城口一带。新中国成立后，仁化人民政府，为了纪念该战斗中牺牲的红军

军，在战斗遗址建立一座纪念碑。



红军长征革命烈士纪念碑

11月5日，朱德为红军最后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迅速向西挺进，急电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五日晚，野战军开始通过汝城到仁化城口恩村间的封锁线。并规定三条基本的前进道路：（一）右边的道路由大来圩经店圩、百丈岭向文明司、山田铺方向前进，另经店圩南之延寿圩向三界圩，为辅助的道路。（二）中央道路，由新桥经解头、盖子排、九峰山向九峰圩方向前进。（三）左边的道路，由城口经麻坑圩向岭子头方向前进。并规定了各部队分路前进的秩序，担任掩护部队的任务。至八日晨，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红军继续西进的路线确定后，在仁化境内的红一军团、



指挥部旧址

九军团、五军团一部和中央纵队，根据西进行军路线，于11月5日开始至同月9日从城口先后向西挺进，进入到

红山的新田、新白老屋、中山、小典等村。红一军团临时指挥设在新田村的李氏宗祠。红军在红山地区作短暂休整后，向乐昌方向挺进。

红军穿越仁化21个乡村，历时10天，与仁化人民结下了鱼水之情。

红军占领城口后，总指挥部设在城口的广州会馆，部队在街道宿营，当时的河边街、正龙街的屋檐下都睡满了红军。红军在城口休整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红军在城口正龙街露宿地

吃了群众的粮食、菜，烧了群众的柴草，用了群众的物品，都以高于当时的价钱付了银元或苏维埃纸币。有时主人不在，就把款放在主人屋里、菜地上和火柴草旁。红军住的街道村旁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红军筹来的粮食，还分给民众。对此，民众都感动地说：“红军真是好！真是好！”一位曾为红军带路的红山老人李先芳说：“红军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军队，马营长、徐连长待人十分好。”

11月7日拂晓，红九军团三师准备从城口向湘境三江口、蕉坑、延寿进军时，见城口镇内莲塘口处上空，升起巨大的浓烟。瞬间，火焰沿河边蔓延，火势越来越大。军团部立即命令红三师八团两个营和军部直属队，开往火灾现场，抢救被火围困的群众，抢救民众物品。经过军民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大火才被扑灭。经现场清点，烧毁房屋50多间，损失巨大。大火扑灭后，八团二营的红军从警戒线上抓到三个形迹可疑的人。经过审问，这三人是从韶关前来城口侦察红军情况时专门放火烧屋的敌探。红军战士和居民们得知火灾的原因后，十分气愤，纷纷要求严惩放火烧屋的敌探。红九军团部直属宣传队根据民众的要求，于上午在萝卜坝召开群众大会，对放火烧屋的两名主犯实行枪决。同时，红军还把部分粮食、衣物用品分送给受灾的居民，并对灾后居民生活作了初步的安排。

（四）仁化红山的红军情结

红军部队经过仁化时，纪律严明，爱护人民群众，保护民众利益的行动，使群众深受感动，红军也得到民众的拥护。据统计，红军经过仁化时，长江、城口、红山有1000多人主

动为红军服务，有 10 多人主动为红军当向导。红军所到之处，有的民众为红军磨谷，为红军提供粮食；有的民众为红军解决蔬菜、柴草及其它用品；有的民众为红军烧饭、烧茶送水，城口的店员宰猪为红军改善伙食；有的民众还收留红军伤员在家养伤，并为伤员敷药，送水送饭。

值得一提的是，红山给世人留下了不少保护和抢救长征红军伤员的动人故事，以及一些红军长征的印迹。红军长征穿越红山，由于生活艰苦而又长途征战，队伍出现不少伤病员，给红军长征带来困难，而地方反动武装却协同敌军不断搜捕红军伤病员和为红军做好事的群众，但红山不少群众依然千方百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和掩护红军伤病员。当年青迳大水村李德林，冒着国民党清乡队搜查的危险，秘密收养一位臂部受伤的红军战士，坚持 20 天为他洗伤口，敷草药，送饭送水，使他伤势好转并踏上寻找红军队伍的征途。告别时，李德林的妻子还为红军战士送上糍粑，以便途中食用。红军战士非常感动，当即把自己的步枪送给李德林作为纪念。新白老屋村也收留了几位红军伤病员，为其疗伤治病。据统计，红山有几十名红军伤病员牺牲，当地群众自发将烈士遗体掩埋。当年红山的小典村，有两名红军伤员被村民收留在家中疗伤，由于伤势过重，缺医少药，尽管村民精心照顾，红军战士还是牺牲了。村民怀着悲痛的心情，把牺牲的红军战士安葬在村傍的山边。为了怀念牺牲的红军战士，村民 80 多年来一直坚持拜祭。红军长征过红山时，据统计共牺牲 30 多名战士，当地政府为了铭记和缅怀他们，在白石洞村附近修建起一座“红军长征革命烈士纪

念碑”，并在碑底筑墓安葬 30 多位红军烈士。



红军长征革命烈士纪念碑

红山新白村有一座古石桥，当地民众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经过此桥，特将它命名为“红军桥”。红军长征经过的今仁化县红山镇，其实当年不叫红山，是属仁化县城口区以西、董塘区以北和乐昌县五山区以东的部分乡村。新中国建立后，粤北县的行政区域将区改为乡后又改为人民公社（简称公社），1971年1月，仁化县成立烟青公社，由原董塘公社的烟竹、鱼隍大队和城口公社的新白、清径大队组成，同年9月原乐昌县的五山公社的中山大队划归烟青公社管辖。次年1月，为纪念红军长征经过此地，将烟青公社改为红山公社。这就是红山地名的由来，也是韶关众多地名中，唯一以纪念红军长征而命的地名。

三、翻越乐昌大山向西挺进

（一）翻越乐昌西进的历程

中央红军在江西突围西进，于10月下旬突破国民党在赣南的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就致电陈济棠、何键，要他们火速出兵在湘南汝城和粤北仁化间地区设第二道封锁线阻截红军，并指令他们分兵在粤北乐昌和湘南宜章间沿粤汉路南段，利用原有碉堡加强工事设第三道封锁线防堵红军。

11月3日，朱德在红军攻占仁化城口计划部队西进时，急电指示林彪、聂荣臻：一军团“应经大坪、新桥地域向九峰圩前进，这是主要的道路，一定要争取之。”

11月4日，红军占领仁化城口，胜利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次日，朱德为红军继续西进继续作出军事部署，急电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五日晚，野战军开始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分左、中、右三路向西挺进，进而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入乐昌第一村——五
山坪田寨岐村



红军在五山临时指挥部——
中山书院

11月5日，红军相继向西挺进。红三、八军团为右路由汝城经延寿山田坳、岭秀、大源百丈岭、文明向宜章进军；左路的一、五、九军团和中路的中央军委纵队由仁化汝城经乐昌大小王山向九峰山脉进军。

11月5日至8日，红军西进左路和中路部队先后挺进广东乐昌境内。5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从湘南汝城简家桥出发，经小垣进入乐昌五山石下冈车口，到达石下、大王山宿营。同日，红一军团一师从汝城延寿，经小垣抵达乐昌五山小山宿营。6日，红一军团直属队、红二师四、六团和十五师，分别从仁化清水江越过乐昌五山的山寨岐经坪田、山溪和从仁化红山的中山山（原属乐昌）到达麻坑集结。红一军团以麻坑中山书院为临时指挥部，宿营、休整。红九军团等后续部，于8日也从仁化进入乐昌坪田、山溪等地宿营。

当时，粤敌李汉魂等部在乐昌要塞九峰、坪石一带把守。左、中路红军要西进与右路红军配合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必须首选迅速抢占粤汉铁路南段以东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才能掩护红军安全通过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的地域西进。

11月6日下午，红一军团直属队、红二师四团和六团等队伍，相继进入乐昌境内向麻坑、五山、大王山一带集结时，红军总部电令：“一军团（缺十五师）分向麻坑九峰前进”，要一军团抢占九峰山，防备粤敌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以后，向我军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山之间安全通过。

红一军团部接到进攻九峰命令时，军团长林彪主张不抢占九峰山，坚持择平原前进，冲过乐昌；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坚持执行红军总部的命令抢占九峰山；军团参谋长左权见事关重大，建议派一个连到乐昌侦察敌情。聂荣臻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无把握的事”。聂荣臻又说：“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当天下午前往乐昌侦察敌情的连队向军团部报告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看到敌人，正向北开进。”这时林彪才不坚持他不攻占九峰山的意见。同日下午三时，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利用敌人的电话，装作敌人的口气，与乐昌廊田民团讲话，得知乐昌前日到邓光龙部三个团，该敌本日开一团到九峰山，在这种形势下，林彪着急了，接受了聂荣臻的正确意见，赶紧派二师四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了阵地。

同日下午7时，红军总部指示：“一团军之基本任务为夺取并巩固九峰圩以及乐昌以北之头子岭（乐昌以北道路交叉点），以便野战军迅速西进”。“如九峰山之敌坚守顽抗，则应钳制该敌，并切断其与乐昌之交通，以便以后协同三军团向该敌进攻。”7日10时，朱德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再次指示：“一军团之主要任务仍为占领及巩固九峰、枫门坳、岭子头，以保证野战军之西进，枫门坳必须派队占领”，“对乐昌之敌钳制之”，“对九峰之敌应攻击及切断归路，并威迫其撤

退”。

11月7日，红一军团直属队、红二师六团由麻坑经挑竹坑、大王山、张姑岭前往九峰浆源，先头部队在张姑岭与敌军展开战斗，击退了敌人的阻击。



红军在九峰浆源、茶料与敌作战旧址

同日，红二师四团由麻坑经尤山（羊古田）、沙坪、赤水、天平架、东坑、上西坑到达九峰文洞庙山背和茶料之鸦鹊岭。此时，粤敌独立三师吴以起团和邓尤光部一个团，已赶到九峰茶料、浆源一带布防，坚守碉堡，控制交通要道，企图阻止红军西进。

11月7日11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十万火急电向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提出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计划报告，指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何键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付我们；粤军疑蒋入粤目的，对我无与蒋介石南北夹击

企图。因此，建议：我应迅速决定突破宜乐郴间封锁。三军团按原计划西进，扫除良田、赤石司，突破宜郴间，相继略取宜章，不得即监视之。一军团同时向西速进，突破宜乐间，略取乐昌。九峰之敌无大企图，可驱逐之。八军团在百丈岭、九节一带，控制资汝之敌。

根据上述情形，中革委于11月7日作出决定，从宜章南北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是日16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对“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做出部署。“估计通过乐昌、坪石间河道困难，应占领九峰并确定钳制乐昌之敌，以保证野战军通过封锁线，在万不得已时，则钳制九峰之敌而绕过之。”指出“一军团有消灭九峰及钳制乐昌之敌的任务”，要求三军团八日晨进至里田、界牌岭地域，如必要时应派出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协助一军团进攻九峰之敌。还规定了部队的前进位置，“三、八军团的右翼队经过宜章以北通过”，“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军团由当时情况而定”，“一、九军团的左翼队则经宜章以南通过”。同日21时，一军团电告野战军司令部：“据群众云，九峰于前日到粤敌独立师全部（三个团），分驻九峰、茶寮、望坑、东沙庙、石壁潭、枫门坳，九峰、石壁、枫门坳、岭子头均有碉堡，茶寮碉堡正在构筑”，“如不消灭九峰之敌，通过九乐甚为困难”。

11月7日，朱德与毛泽东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的传单，号召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动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

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1月8日4时20分，一军团电告野战军司令部：“由九峰乐昌之线东向西前进，经九峰、茶寮……乐昌，此数处均有敌阻，另外有一条极小的路直到枫门坳，但枫门坳亦有敌做工事”，“九峰以北敌情道路不明”，“今日以二师一个团走小路攻占枫门坳，以一师全部及二师（缺一营）攻击茶寮”，“一师应经蒋元向茶寮前进，进到后，如敌不多，工事不坚，周、刘应单独攻击之，否则待二师到达后与二师取得电话联系后再候令攻击”。同日15时至18时，朱德分别急电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先通报敌情：湘敌六十三师之一部企图由汝城经大坪、文明司向我追击，在九峰、乐昌有粤敌两个师。并告：军委决定三军团于良口、宜章（均含）间突破封锁线，其先头师约于十日可前出到宜章地域。一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速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三纵队及五、八军团在三军团后跟进，九军团则于一军团后跟进。并作出具体部署。

同日15时半，一军团电告野战军司令部：“现正配合一、二师之各一部攻击茶岭”，“我五团之一部已占岭子头”，并再次提出“如九峰、茶寮不能占领，则我军无把握自九峰、乐昌间通过西进。”同日19时半，鉴于红一军团十八时来电请示“我军左纵队已不能经九峰、乐昌间西进而应改自九峰以北西进”，朱德复电一军团首长：“依你们来电看，一军团主力的部署仅在九峰东南及以南地域，这使军委一、二纵队受着九峰之敌的威胁”，“一军团有防止九峰之敌向砖头坳

前进之任务，因此，一师应派出一部控制九峰通砖头坳的大路。”接到电令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才下决心并电告司令部：“我们明日率一师经大王山及砖头坳以东向九峰以北转进。”并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

11月9日1时，朱德急电彭德怀、杨尚昆：“一、九军团不能于九峰、乐昌之间通过，并将转移到九峰之东北，而砖头坳已到粤敌一部。”“三军团应利用湘敌正式军队未赶到的时机，同时占领宜章及两路司（编者按：原文如此）。为达到此目的，应使用第五师及第六师之主力。”此外，还须派出一团兵力迅速占领唐村、白鄞并相继占领向坪石街，并保持在我手中，直至一军团到达为止。同日1时，朱德急电林彪、聂荣臻，“变更一、二军团之任务”为：“一军团（缺十五师）以强行军前出到九峰的北部，有如下任务：（一）无论如何不得让敌人进到九峰以东及以北地域，为得如此，必须确实占领砖头坳山地。如不得占领砖头坳时，则至少以一个师掩护砖头坳、延寿圩间的道路。（二）至迟十日，一军团应前出至延寿圩、三界圩至里田之小道，并到达三界圩、中塘地域。以便能从十号经赤石、塘村前进到宜章以南之坪石地域，执行基本的任务。”九军团及第十五师“九日由麻坑圩转向石洞地域，十日则随一军团后进，经九峰东北进至三界圩、中塘地区。”

同日5时和6时，一军团两次电告野战军司令部：“一军团已取道大小王山、延寿圩向九峰东北地域转进”，“本日我除一部监视茶寮，第一、二师经大王山四泮关家桥向九峰以北

转进”。红军数千人到达九峰茶寮、浆源一带，与敌独立三师吴团交战，把敌人牵制在九峰山麓一带，掩护中央纵队红九军团和其他左翼红军部队，安全通过了九峰山、大王山三界圩与里田之间的湘粤边境，向宜章开进。



红军在茶寮观音山战斗旧址

红一师到达罗家渡后，派出三团九连到乳源梅花圩打土豪、筹军饷。红九连在梅花三名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没收了两家地主财物一批，银元250块，补充了部队的供给。

11月10日2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告以三军团九日开始进攻良田、樟桥市地带，并占领良口南端及樟桥市。十日，五师续攻良口北端及万会桥，六师向宜章攻击前进，四师可抵两湾洞地域。指出“为争回已失去战术的时机，一、九军团十日及十一日应经三界圩、中塘、里田至赤石司，以便以后能前出于三军团左翼以前指定之宜章以南地区。”并告：军委第一纵队十日留文明司附近。

同日，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激战一天，抢占了九峰山。三军团第五师攻占良田、黄泥坳，逼近郴州，切断郴宜大

道，毁敌堡垒百余座。第六师迫近宜章城。同日10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批评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红军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同日21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因一、九军团不得已情况下转经延寿圩西进，以致使通过封锁线的时间延长数日。”“三军团的任务是保证野战军全部通过封锁线。”为此，“三军团主要的力量应用在宜章方向，必要则将炮兵及四师一部使用在宜章方向。”要求三军团应在政治上及部队指挥上帮助八军团。并告：军委第一纵队十一日晚进到赤石司或平和地域。

11月11日拂晓，三军团第六师占领宜章城，至此，突破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23时，中革委急电各军团首长：“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郴（县）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并要求三军团“保证野战军全部通过封锁线”。同日，一、九军团除少数部队在延寿圩阻击国民党军外，主力经百丈岭向文明司急进。其后方部队及二十二师遵照朱德的命令，于11日晚或12日晨到达文明司地域。

11月12日，红五、九军团傍晚时按时赶到总部指定的花坪附近宿营。同日22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等军团长及师长：“明十三日，我野战军开始通过万会桥、宜章之线西进。三军团主力仍留黄泥坳、良田地域，六师留宜章，以掩护野战军西进及一、九军团集中。军委一纵队西进至黄茅，二纵队至廖家湾、鸥嘴坪、鱼圆坊，五军团拟令进

至轩田仍留原地。”

11月13日，一军团越过大王山，沿湘粤边境进抵宜章白石渡。五、八、九军团多路齐向粤汉线不停地前进。至此，红军大部分顺利地由宜章、坪石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同日24时，朱德急电彭德怀、杨尚昆、周昆、黄甦：“我野战军于十五日内始可全部通过封锁线。”“三军团（欠六师）至十五日止，有扼阻郴州及东面之敌的任务，派出得力掩护队抗击东面之敌，对郴州方向之敌则进行运动防御直到黄泥坳为止，以保证两条西进道路于我们的手中。”



乐昌大王山

11月14日21时，朱德部署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进计划，急电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军委决定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三军团应占领嘉禾城，一军团应占领临武及

蓝山城。”野战军分三个纵队前进。11月15日，红军全部从宜章、坪石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继续向西进军。

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前夕，为了扫除第三道封锁线的障碍，宜（章）乐（昌）县委组织地方游击队，开展打“乌龟壳”（指敌碉堡）运动，把敌人设在第三道封锁线上坪石、宜章、郴县公路沿线的大部分碉堡、炮楼毁掉，一些没有毁掉的碉堡，敌人也不敢再守，成了空堡，从而牵制了敌人，配合红军长征。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过程中，宜乐县委又组织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为红军当向导，为红军送茶送水，安置、护理红军伤病员。

（二）军民鱼水情

红军西征过乐昌，历时10天，先后经过北乡、五山、九峰、廊田、黄圃、罗家渡、梅花、白石等11个乡镇20多个自然村。红军西征乐昌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但红军指战员不仅英勇杀敌，每到一处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在五山石下的黎家、九峰的浆源、茶寮等地的墙壁上，至今还留下有当年红军刷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唯一领导！”“红军是反帝抗日的武装！”“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白军战士不要打红军，大家共同北上抗日！”等宣传标语。

红军长征过乐昌，尽管生活艰苦，但始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了乐昌人民的称赞和爱护，也涌现出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感人的故事。



红军经过乐昌留下的标语和遗物

红军到达乐昌五山麻坑宿营时，没收了地主谷子20多担，麻坑新屋村村民邱宝生等自发组织赶来，为红军碾谷子到天亮，红军给了邱宝生等村民一担米作为报酬。当时，红军宿营在麻坑不占民居，睡在屋檐下和民众腾出的房子，用了村民的稻草后放回原处。村民见红军纪律严明，在红军离开时还为其带路。

红军路经大王山牛头洞村时，在村民廖长发、廖金良家各杀了一头猪，在廖山牛家做饭，摘了村民的菜，都一一给村民付钱。红军在沙坪村宿营时，村民蓝文善家人外出，红军在家中找到三担谷子，屋主不在，红军把大洋放在空酒坛里，并留下一张纸条说明情况。

红军在瑶民聚居地长老坑宿营时，带路的人失火烧掉了瑶民赵武有家的篱笆寮（屋），还烧死了2头猪，红军赔了20块大洋，并写了一张纸条用大洋压着。红军在另外一家瑶民赵称发家要了4担大米，给了4块大洋。另一瑶民赵称保见红军如此爱民，主动为红军带路翻越黄美山，经北乡的东坑口，一直把红军带到上西坑。红军路经九峰浆源陈家湾时，发现村民戴田汉家中的木盆中养有泥鳅，想把它买去给红军伤病员吃，补补身体，但物主不在，红军便把泥鳅带走，把钱压在木盆下，此事后来受到村民的交口称赞。

红军长征过乐昌时，有些失散和有伤病的红军战士，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收留和保护，仅五山地区范围，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0多名。

红军经过五石下陈家湾村时，一位名叫肖义发的红军战士，因伤病的原因未能跟上队伍，在村民陈其年家中的碾米楼上藏起来，不料被五山乡丁搜出捆绑，派人拉出去枪毙，红军战士肖义发被拉到山后，受派人员陈庚妹对红军有好感，给肖义发松开绳索，故意朝天放一枪，然后叫肖义发沿着山沟逃走。肖义发刚从山沟走上一条路上，碰到几名砍柴的妇女，她们见肖义发不象坏人，李林姣把他带回陈家湾村，在家中藏了一个月，每天给肖义发做饭、护理。后来，肖义发没有跟上红军队伍，便在陈家湾村生活，并在当地取了妻子名叫连普娇，最后又去了湘南汝城小亘定居生活。

红军来到五山桂坑村时，有一名红军战士杨来富，全身长有疮发病十分严重，走路都很困难。一名外号“烧岩人”的

见状收留了他，并把红军战士带到龙虎洞村，村民赖仙有夫妇把他收留在家中。后来，用土药方治好了他的病，红军战士改名为赖来苟。红军战士赖来苟在龙虎洞村住了十几年后，约在1947年才离开。

麻坑陈家村、山溪河背村的村民陈福贱、刘和年，也收留了几位红军伤病员，每天给伤病员做饭煲药半个月之久，红军战士伤病好了，临走时向村民叩头谢恩。

红军长途征战，缺医少药，不少红军战士牺牲在乐昌境内，仅五山地区就有40多名，得到了民众的掩埋和安葬。

红军长征过坪田时，有9名红军战士牺牲，黄家村村民黄求苟、黄蓝清筹，把牺牲的红军战士分散埋葬在喇叭形埂子山山上。在桃竹坑，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当地村民将他安葬在村口岭下小溪西边的溪坝上。在大王山，村民将牺牲的一名红军战士安葬在苗竹窝山岗上。在中山，有两名掉队的红军战士在中洞寨下被乡丁打死，村民就地把他们安葬。在牛头洞、文书、青岭、大坪筹村，有10多名红军战士被乡丁打死，当地村民发现后，都全部给予掩埋安葬。



乐昌五山红军烈士墓群

红军经过石下村时，有

18名受伤、患病的红军战士留在当地而不能前行，不久被当地乡丁抓到，押到江边一木桥上枪杀，并将尸体推入江中，后来被民众从江中抬起，安葬在江边上。

红军牺牲多悲壮，苍天垂泪吊英灵。新中国建立后，每年清明节，当地民众、学生都去红军墓地拜祭，缅怀先烈们的英雄业绩。

四、部分红军队伍迂回奋战连县

（一）红六军团西征某部过连县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地区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处境十分危险。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训令》“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并对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作了具体的指示，要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随后，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由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粤军和湘军的接合部五斗江到白牛岭地段突破封锁

线，然后西征。8月7日，红六军团率第十七、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000人，在地方独立团的配合下，由碧溪、新江地区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11日，红军冲破敌人纵深防御，到达湖南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次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会上，任弼时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肖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原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治委员。

会后的当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出发，越过郴宜公路绕桂阳，20日占领新田县城后到达湘江右岸准备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随后六军团发现敌军调重兵向道县、零陵运动，堵红军西进，决定摆脱敌的包围，向东前进急转南下，于29日到达嘉禾附近。当敌人发现红军行踪向南追击时，红军即折向而西，迅速进到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的潇水，破坏了尾追红军之湘桂军三个师的载堵计划。

9月上旬，红六军团强渡湘江时，左翼红军某部约300人，迂回进入广东连县山河、田家和洛阳乡山区，准备沿湘粤边向广西方向挺进。

红六军团西征时，湘粤敌人主力分别布防于湘西和粤闽边，湘南粤西北相对空虚。于是，粤敌陈济棠急调警卫旅第二团至连县，第一营在东陂，第二营在星子，团部和第三营驻连州。后又调独立三师第二团增援连县，堵截红军。红六军团某部进入连县地域后，很快就沿湘粤边的天光山，包括山河、田

家、洛阳等乡向西进发。红军到达西山与天光山之间，打破了粤军警卫旅二营的堵截。红军从天光山来到黄洞山小东口的冷大坑时，突遇粤军独立三师追到，红军迅



红六军团在黄洞山与粤敌激战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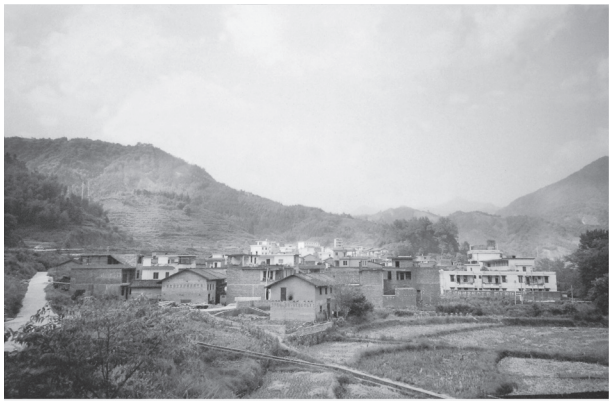
速登上山岗，凭石崖古树的掩护，给敌人迎头痛击，当场毙伤敌人3人，红军伤1人，被打死战马一匹。战斗至傍晚，红军进至蓝山大麻，敌人退回星子。红军击溃敌人围追，胜利挺进湘桂边。

（二）红一、红九军团部分队伍迂回连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11月中旬，长征左翼红一军团（林彪部）、红九军团（罗炳辉部）冲破敌人在宜章、良田和乐昌坪石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之后，转入湘南，经嘉禾、蓝山过临武县境，其中一部南下连县天光山地区，始终沿着粤湘边向西进发。其时，敌人在湘南只有胡凤璋、欧冠等地方团队防守。

11月21日，红一、九军团部分队伍由临武经过连县之星子、东陂区的天光山与三水山交界时，刚追到的湘敌李韞珩部和粤敌独立三师李汉魂部匆匆上阵堵截，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红军就打垮了敌人，冲过山坳继续前进。在云雾洞，红军

迅速出击，消灭了夏滢乡丁哨卡，将20多名敌人缴械。



红九军团左翼小分队在云雾洞瑶寨与粤敌作战地点

11月23日，这支红军小部队顺利通过三水，取道蓝山大桥进入江华地带，汇合一、九军团主力直奔潇水，经过一场恶战，进入广西全州。

11月底，红九军团某部沿原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从临武进入连县天光山，从板寮、蚊仔冲进黄洞山小东口早禾界一带宿营。次日早晨，驻夏滢墟的粤军警卫旅二团一营跟踪追到。

枪声一响，红军纷纷登上早禾界山顶，有的进入当地纸厂沤纸浆的纸塘作掩护，待敌人冲近，红军放过前头的30余个敌人，居高临下朝骑马的敌军官一轮火打过去，当场击毙敌军官以下4、5人，敌人纷纷溃退，红军牺牲2人。不一会，聚集在松林的敌人重新组织冲锋，山上红军以石磊、纸塘、大树为

掩护，英勇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声震撼山谷，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冲锋。直到下午，湘敌来援，红军才往蓝山、江华方向转移。

（三）红三十四师余部迁回连县

红军长征初期，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一直担负长征后卫掩护任务。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立即部署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两水以东地区”。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以惨重的代价，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担任渡江殿后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以一个师阻击敌军九个师，血战四天，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随后，红三十四师陷入重围，牺牲惨重，未能渡过湘江随大部队西进，向东折返回全州、灌阳之间的岭脚暂避。尔后，红三十四师剩余的300多人，根据军委的回电指示，退回到群众基础好的湘南。于是，师长陈树湘决定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在突围过程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陈师长不幸被俘，在押往道县县城途中，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陈树湘师长牺牲后，红三十四师余部100余人，由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在湘南宁远、嘉禾、蓝山和粤北连县三角地带的山区分散游击。12月中旬，杨海如团长带领红三十四师94人，由蓝山荆竹地区进入连县三水黄洞山，不久入湘，而后又复入连县天光山，意欲寻找长征留下的湘赣红四团与之会合。12月12日，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余部从桂湘边蓝山撤到连

县三水瑶山，粤军独立三师纠集了连县县警及夏滢、朱合各乡自卫队上山“进剿”。12月25日以后，红军辗转于三水黄洞山的烟竹坪、挂榜山、云雾洞、老茶坪、半冲一带，曾在小东口休整5天，后遭敌重围，经大定坑、牵牛练战斗后转移，继续与敌人周旋。

1935年1月初，红军90余人去黄洞山小东口休整，遭敌重围，红军突围途经大定坑，又遭反动瑶王赵福生民团偷袭，红军牺牲1人，损失轻机枪1挺。部队退到田洞心的牵牛岭宿营，时值隆冬，雨雪交加。第二天上午，数倍于我的敌人又跟踪追到，他们凭人多枪好，以逸待劳，发起连番冲锋，火力猛烈。红军不顾连日劳顿，依靠有利地形，在团长扬海如指挥下奋力阻击，一次次把敌人压下山头。战斗激烈，从上午打到傍晚，敌人被击毙10余人，伤一批，最后退回洛阳。红军牺牲6人，当晚翻过大山，转移至临武坪溪洞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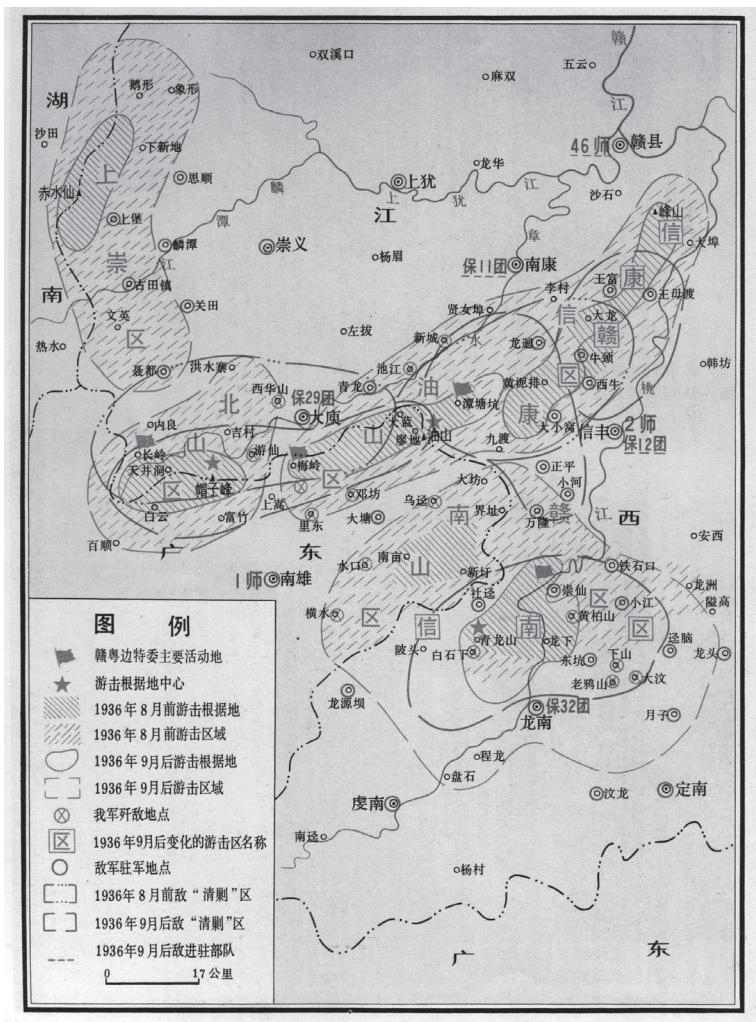
1935年春，红军重由天光山出临武西山，此后遂返宁远、蓝山，上了九嶷山。

第七章

红军游击队粤赣湘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2月—1938年2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分散突围转移到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领导下，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赣粤湘边特别是赣粤边油山游击区，在项英、陈毅率部突围来到这里后，成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的支持配合下，战胜了各种严酷环境困难，实现了革命火种一直不灭，斗争一直不停，红旗一直不倒。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皖南抗日前线。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形势示意图
1934年年底—1938年春

一、红军游击队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一）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建立与油山会师

1934年6月，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赣粤边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成立了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为李乐天。1934年12月初，鉴于中央苏区大部分丧失，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势在必行，为了加强和统一赣粤边游击区的领导，中央分局指示中共赣南省委，在于都县成立了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别委员会。李乐天、杨尚奎、王龙光、刘建华、李国兴为特别委员，李乐天任特委书记，杨尚奎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龙光任组织部长，刘建华任少共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信康赣雄军分区，由李乐天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向湘林（后叛变）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

12月下旬，中央分局采取措施，号召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加强对群众游击战争的部署和领导，决定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此时，李乐天、杨尚奎率领新组建的信康赣雄特委、军分区机关和一个营700余人，携带步枪、机枪300余支，从于都小溪出发，突围经赣县、南康到达信丰、大余、南雄三县交界的赣粤边油山地区。

1935年1月，李乐天率部经信丰上乐村到达南雄廖地村，同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和曾彪率领的油山游击队会合。

当时，根据游击斗争的需要，在廖地村将中共信康赣雄

特委改名为中共赣粤边特委。从此，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赣粤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在艰苦的自然条件、恶劣的斗争环境中，与顽固的国民党军队与地主武装，开始了长期的游击斗争。



红军游击队南雄油山会师地——廖地村

2月2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给中央分局电报指示，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分散行动，紧密联系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从2月中旬开始，被围困在于都的红军，分成九路先后突围，到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斗争。

3月底，项英、陈毅率部突围到达赣粤边的油山。4月初，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300余人，辗转来到赣粤边，在油山与项英、陈毅及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的李乐天、杨尚奎等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这

时，汇集赣粤边油山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共有1400余人，他们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力。从此，中共赣粤边特委的游击斗争，就在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建立与红军游击队油山的会师，为项英、陈毅率中央分局突围赣粤边并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使赣粤边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二）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

大岭、长岭会议与分兵游击

1935年4月初，围攻红军的国民党军正在中央苏区进行烧、杀、抢、掠，暂时无暇顾及山高林密的赣粤湘边界山区。红军游击队正好利用这个间隙，进行战略调整，以和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但是，因受“红军主力马上会回师反攻”愿望的影响，红军游击队中普遍存在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过不了多久，主力红军必然打回来，我们可以把赣粤边变成为第二个中央苏区；有部分人在如何开展游击根据地问题上，认识不足意见分歧较大，有的人主张把兵力集中在一起，跟敌人硬拼，有的人主张先隐藏起来，等红军主力回来再打，不少的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知出路在哪里。当时，蒋介石除了命令部队围攻苏区外，还指令汤恩伯、余汉谋召开南北会议，要求彻底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存在人心不稳，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统一思想认识，1935年4月初，项英、陈毅在南雄油山大岭下，主持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军

分区领导干部20多人的会议。会议听取了赣粤边特委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同时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批评，对今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研究，要求大家转变斗争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会议还指出，敌军“清剿”在即，机关要精简，部队要分散活动。不能搬用打正规战的做法。



大岭下会议旧址——大岭下彭屋

大岭下会议期间，敌人开始了对油山地区的“清剿”。为避敌锋芒，项英、陈毅率领赣粤边特委的同志和红军游击队，分三路从油山转移北山，在帽子峰脚下大余县的长岭村，继续召开赣粤边特委、军分区、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信康赣、南雄、大余等县、区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共70多人。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精神，进一

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具体研究和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提出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即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在斗争策略上，要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以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游击主义，防止死打硬拼和消极隐蔽的倾向。

会议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设立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等县委，县委以下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区委、工委和支部，共青团组织，按照党的系统逐步建立。



长岭会议旧址

在军事上，会议确定分兵行动。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和斗争环境的需要，根据“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决定把部队随地区划分，分成几个大队和许多小分队，进行分兵游击。

会后，根据当时的形势，集中于赣粤边的1400多红军游击队分成四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开往油山区、北山区、信丰南康区、南山区和崇义上犹游击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争。项英、陈

毅与特委机关坐镇北山，统一领导和指挥赣粤边游击战争。

大岭、长岭会议是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决定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克服了与新的斗争形势不相适应的老一套做法，并使大家树立了长期斗争的信念，增强了团结，为统一思想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是赣粤边游击战争的转折点。

反“清剿”斗争

大岭下会议后，敌人对游击区发动了第一次全面军事“清剿”。1935年4月，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地方保安团，兵力达30000多人，对赣粤边游击区实行重重包围，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游击队。在南雄的梅关，敌人以一个连修筑据点，控制南雄与大余、信丰等地的交通；敌人还在乌迳、大塘、邓坊、里东、白云等游击区的外围驻以重兵，封锁坑口，在红军游击队经常活动的油山茶田、大兰一带部署了1个营，在油山的坪田坳、坪林、黄地等处分别驻扎“铲共团”，并在上述地方拉了电话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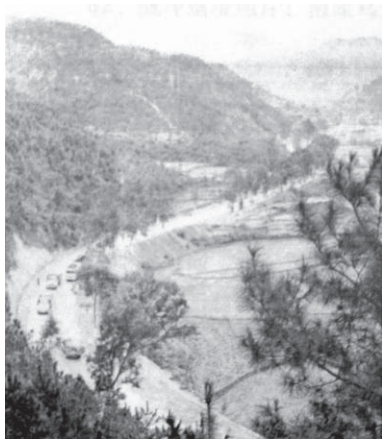
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清剿”，特委和游击队采取了积极灵活的斗争方式，既分散对付敌人的集中清剿，又相机集中兵力，深入敌后去打击敌人。

4月下旬，项英、陈毅等领导及所率直属队在北山里仙洞宿营时被粤军奇袭。特委遂决定机关进一步分散活动：项英、陈毅、李乐天等带领司令部侦察班和特务班到帽子峰以西地区指挥各地；陈丕显、杨尚奎、叶明魁等分别到大余、信丰、南雄各地开辟工作。为便于指挥，游击区以油山为中心建

立了三条交通联络线：一条经梅山、雄余公路伸向北山；一条经乌迳通向“三南”；一条经信丰的上乐到达南康、赣县。每条线由2至3名游击队员组成交通站。此外，特委机关还采用在深山搭棚隐蔽的方法来避开敌人的“清剿”和突然袭击，保证对整个赣粤边区工作的领导。

红军游击队则由内线转到外线活动。1935年5月，油山红军游击队突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出其不意袭击了敌人的后方圩镇乌迳，全歼靖卫团，击毙靖卫团总邱光华。6月，曾彪率油山红军游击队巧攻游仙圩，全歼守敌，缴获步枪10多支。9月7日，油山游击队在雄余公路上伏击了敌人的军车，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这些战斗，牵制和打击了敌人，震撼了敌人的后方。与红军游击队集中兵力出击的同时，南雄县委分别在油山、水口、北山、南山建立和发展了党的区委。通过党的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小组，侦察敌情，破坏敌人电线，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



雄余公路战斗遗址——南雄县角湾

由于特委的正确领导及红军游击队英勇顽强的奋战，至9月，敌人为时半年的军事“清剿”宣告失败。

北山事件

1935年5月，奉命率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到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等失散队伍，并在湘南粤北发展游击的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湘南郴县黄茅地区投奔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叛变革命，成了判徒。

龚楚，原名龚鹤村，1901年11月出生，广东乐昌人，早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24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曾在乐昌地区从事工农运动。1927年5月随广东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武汉，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参加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1929年到广西工作，12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任起义军参谋长。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中革军委模范团团长，红军独立二十二师师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兼红二十四师参谋长。

龚楚叛变后，于同年10月带着国民党给他配备的卫队30多人，伪装成游击队来到赣粤边的北山，企图破坏游击队的指挥机关。

当时，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还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

龚楚到达北山后，假装跟地方保安团周文山的部队打了一仗，还到处张贴红军标语，派出人员跟地下党联系，取得了我地下工作人员的信任。在大余河洞天井洞，龚楚遇见了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龚楚曾是中央苏区的领导，何长林早

就认识他。在龚楚的威逼利诱下，何长林也跟着叛变了。龚楚、何长林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通知红军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北山龙西石参加会议，妄图借开会名义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

10月13日，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陆续赶到龙西石参加会议，谁知龚楚的卫队已将会场包围。会场上龚楚撕下伪装，说跟着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出路，要大家跟他走。参会人员一听才知道龚、何已经叛变，大家奋起反击。但在重重包围之下，除贺敏学和赖文泰等八九人冲出包围外，30多人当场牺牲，20多人被捕后惨遭杀害。随后，龚楚、何长林捣毁了天井洞的红军游击队后方基地，杀害了红军医院的伤病员。龚楚、何长林这两个叛徒，继续伪装着，妄图把游击队领导一网打尽。幸好当时订有秘密工作原则，各机关互不来往，他们一时弄不清楚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领导机关的驻地。

10月20日，龚楚和何长林在帽子峰一带山上撞见了侦察班长吴少华，龚、何便欺骗说有重要工作向项英、陈毅等领导汇报，要吴少华带他们去见首长。机警的吴少华发觉龚楚的人员虽然穿着老百姓的服装，但都很整齐，不



北上事件遗址

象我们游击队在山上钻山林半年多的穿着；而且他们武器精良，清一色的好枪；人员说话叽叽咕咕，听来大部分是广东人。吴少华猜想，这应该是国民党粤军的伪装队伍。吴少华带着龚楚、何长林等人一边走，一边试探，发觉龚楚对中央分局驻地的情况非常感兴趣，想了解项英、陈毅周围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如何等等，有意无意想提防什么似的。这一定不是自己人了。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后，吴少华在龚楚卫队的枪口下沉着应对，故意夸大说机关驻地有好几挺机枪，最近又来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

走着走着，前面就是中央分局机关驻地帽子峰方坑了，吴少华停下脚步对龚楚说：“司令部有规定，你们去这么多人哨兵会开枪的，伤着自己人可不好。”龚楚无奈，只得让卫队停下，自己和何长林两人跟着吴少华。吴少华不理睬他们，脚步越来越快，龚、何两人在后面怯怯地跟着，卫兵也远远地跟了来。吴少华跑起来了。远远地看见一名哨兵，吴少华不顾一切地向前冲，一边跑一边大声向站岗的哨兵喊：“后面的是敌人，快开枪！”哨兵鸣枪报警了，项英、陈毅等人听到枪声迅速转移。龚楚和何长林不知道红军游击队的虚实，不敢贸然往前冲，乱放一阵枪后只得仓皇撤走，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项英、陈毅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特委机关领导人安全脱险。

项英、陈毅估计敌人贼心不死，还会对北山游击区大肆“清剿”，为了安全起见，中央分局与赣粤边特委决定尽快离开北山，向油山地区转移。

北山事件，不但牺牲了六、七十名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干部，而且游击队的后方基地被捣毁，许多伤病员被害，游击队断了后勤供给。更严重的是地下党组织与交通站被破坏，地下交通线被掐断。

打破敌人“移民并村”的封锁政策

1935年冬至1936年春，敌人采取“移民并村”和封坑的手段，对游击区发动了又一次进攻。凡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地方，敌人就逼迫群众全部搬走，不走者以通匪论罪。油山的大兰、坪田坳等几十个村子的群众被迫迁移到外山，其中大部分到了大塘，有的过了江西。留下的房屋全被反动派焚烧光。在北山的澜河圩、小流坑、虎鞋等村居住的群众被强迫搬到白云，村里有敌一个连的军队驻守。在油山外围的大塘、乌迳、里东等地，敌人都派军队驻扎，筑了工事，拉了铁丝网。群众外出要请假，每月只允许群众逢初一、十五两日进山砍柴，进山时还要受到严格检查，市场买卖受到严格控制。敌人企图通过移民封坑，严密地封锁游击区，割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关系，从而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里。

是年冬，气温降到零下，南雄还下了罕见的大雪。敌人的封锁和寒冷给红军游击队的生活和给养造成极大的困难，游击区域也缩小了。面对严峻的形势，特委将杨尚奎、陈丕显派到南雄县委，领导开展群众工作，依靠群众的力量，抗击敌人。在关键的时刻，游击区群众把红军游击队当作自己的亲人，尽力给予帮助，有的在临搬走时把粮食埋在山上或房子里，留给山里的红军游击队；有的知道红军游击队断了粮，就

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初一、十五开禁砍柴的机会巧妙地把粮食和生盐带进山里。红军游击队就这样依靠群众的支持，打破敌人的封锁，战胜了饥饿和严寒。随着春耕季节的到来，敌人不得不让群众进山耕种，封坑计划遂告破灭。

“两广事变”及游击队的发展

1936年6月，爆发了“两广事变”，驻扎在赣粤边的余汉谋3个师撤走。6月上旬，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北山区的安背坑附近召开了有县委负责人、红军游击队长、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解决干部战士对“两广事变”的认识，并决定乘粤军撤走的机会，集中红军游击队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

红军游击队坚决执行特委的指示，从7月至9月，在各地积极进行游击，油山与北山红军游击队集中行动，在曾彪的指挥下，伏击了“进剿”油山的乌迳剿共团，击毙“剿共”团长傅振标；攻打邓坊时，游击队抓住了土豪江碧山，迫他交出几十匹布，一大批西药，20多支驳壳枪和一笔现款。几经战斗，油山红军游击区的范围扩大到南雄的孔江、上朔、邓坑、竹山、仙人岭一线，红军游击队甚至深入到珠玑的横江、上窝、下洞一带活动。“北山事件”后北山红军游击队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特委为扭转这一局面，把经过整训的信康雄赣红军游击大队温凤山中队40多人调往北山，编为第二中队，原北山红军游击队的30多人编为第一中队。合编后的北山红军游击队打了南雄上嵩的土围子，缴枪10多支。不久，红军游击队又化装袭击南雄里东乡公所，歼敌30余人，并将敌乡长击毙。北山

红军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队伍增加了12人，区党组织和交通站同时得到恢复。

这时，特委组织开展了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的活动，项英、陈毅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步哨手册》、《反对十大坏现象》、《红色指挥员》、《红色战士必读》等军事、政治、文化教材，印发给红军游击队员学习和讨论，从而使红军游击队保持了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受到群众的热爱和拥护。红军游击队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粉碎敌军四十六师的进攻

1936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蒋介石嫡系部队四十六师由赣州向南推进，调防赣粤边区，接着向游击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在军事上，敌人强迫群众修筑碉堡，收罗地痞、流氓建立“民团”、编“铲共义勇队”；白天在山上作篦梳式的巡逻搜山，晚上组织看火队、听声队、跟踪队，搜寻游击队的行踪。在政治上，敌军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严格保甲长制度，实行连坐法，要群众互相保证“不藏匪”、“不济匪”，推行“自首自新条例”，收买叛徒做特务进行侦察。

特委针对敌军四十六师的进攻，召开了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作出“九月决议”。决议指出“群众工作是我们反对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制订了依靠群众，放手搞“两面政权”的策略。为此，游击区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革命群众或年纪大的开明人士去当敌人的保甲长，以瓦解其保甲制度。在外山，对那些民愤极大的联保长，红军游击队

就进行突然“访问”，予以镇压；对较为明智的联保长则同他们谈判，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危害游击队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红军游击队或打枪向红军游击队报讯，要代红军游击队购买粮食、药品等物资，并在限定时间内送到指定地点。从而使这些人完全听命于红军游击队，成为挂国民党牌子，为共产党办事的“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

红军游击队作了调整。原到油山活动的北山红军游击队调回北山，任务是“努力筹一笔款子，以准备这一时期的斗争经费”。“三南”红军游击队接受特委关于“牵牛出山”的任务，插到敌人背后，在外围与敌人周旋，并伺机打击敌人，先后袭击了南雄水口圩保安队和南亩、留地、里东等地的土豪。通过调整，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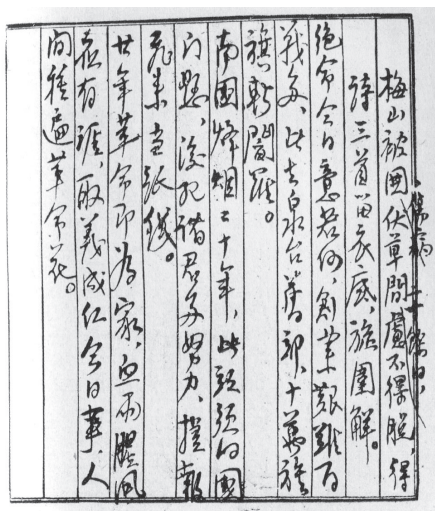
1936年10月，敌四十六师策划了“梅山事件”。叛徒陈海（原红军掉队人员）设下圈套，谎称中央派人到了大余城，企图以此诱捕特委领导。陈毅渴望早日与中央取得联系，毅然冒险前往大余城，到后发现情况有变，立即返回梅山。叛徒阴谋破产。

同年11月，陈海发觉特委机关在梅山斋坑，就带反动军队偷袭并包围了斋坑。项英、陈毅等被围20多天。敌人日夜搜山一无所获，最后放火烧山。正在情况十分危急之时，天突然下了一场暴雨，把大火浇灭，陈毅得以脱险。

陈毅在山中被围之时，想到处于敌人重围中，自己又伤

病在身，可能这次九死一生，难于脱险，于是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伏在丛莽间写下了气壮山河、感人肺腑的绝笔诗《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梅岭三章》手迹

陈毅脱险不久，特委机关转移到南雄县的北山。
 经过6个多月的苦战，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终于打破敌

军四十六师的进攻。至此，度过了3年游击战争中最艰难的岁月。但在这一时期，游击队遭到严重损失。特委书记李乐天、油山游击大队长曾彪以及叶明魁、吴炳秀等牺牲了，还有许多支持游击斗争的群众也遭到杀害。



李乐天像



南雄市革命烈士陵园
内的李乐天烈士墓

二、红军游击队赣粤湘边三年游击战争

（一）中共赣粤湘特委的建立和红军游击队的成立

1935年4月中旬的大余长岭会议，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和斗争环境需要，根据“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在军事上作出了把部队随地区划分，分成几个大队和许多小分队，进行分兵游击的决定。随后，湘赣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根据长岭会议“分兵游击”的决定，率两个大队约300人，以湘赣边的崇义、上犹等地为根据地，向湘东、粤北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从中央苏区突围率红七十一团到湘南去的龚楚（后叛变）和中共湘南省委取得联系，从粤北赣南边区的油山赴湘赣边境的东边山一带。

与此同时，李国兴率一个大队也按长岭会议的决定，到达与湘南、粤北边境的赣南崇义的文英、古亭、聂都和大余的内良一带建立游击区。

大余长岭会议后，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反动集团集中大批反革命武装，向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当时，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移驻大余县河洞乡栅洞村。因暴露了目标，遭到敌人突然袭击，项英、陈毅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向后山突围。突围后，项英和陈毅立即集中突围的人员召开会议。为了便于隐蔽和行动方便，会议决定将部队进一步缩编，实行再次分兵，分散活动，并进一步做好游击区的群众工作，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直属队和机关部分人员抽出来组成一支游击队，派王赤、游世雄率一支游击队到南雄、大余、仁化边界活动，开辟根据地，牵引敌人撤离北山；另派刘矮古带一支游击队和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上游击区开展工作；游击队后方由何长林（后叛变）任主任，转驻帽子峰一带隐蔽，进行游击活动。

同年4月中下旬，王赤、游世雄率领的1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到达湘南汝城、桂东的东边山与蔡会文会合。此时，蔡会文与中共湘赣省委取得了联系。为了加强对赣粤湘边区游击支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蔡会文在湘南桂东东边山区的赤水仙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分局长岭会议精神，成立了中共赣粤湘特委，受中央分局领导。由蔡会文任书记，方维夏任宣传部长，李国兴任组织部长，游世雄、王赤等为特委委员。会议决定将赣粤湘边的部分部队成立为赣粤湘边游击支队。蔡会文

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任副政委，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罗荣任参谋长。从此，赣粤湘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共赣粤湘特委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迅速地开展起来。

（二）赣粤湘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

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和面临的严重敌情，中共赣粤湘特委在湘南桂东赤水仙干部会议作出决定，将赣粤湘边部分县划分为8个区，把红军游击队分成8个大队，分赴各地开展游击斗争。同时还组织了8个工作团，每个团2至4人，随部队行动，发动群众，恢复党的组织，建立贫农团，配合部队进行游击斗争。从而成功开辟了赣粤湘边包括湘南酃县、茶陵、桂东、资兴、郴县、永兴、宜章和粤北仁化、南雄、乐昌、始兴，以及江西上犹崇义、遂川、大余等16个县，方圆900里的游击区。

赣粤湘边游击根据地的日益扩大，红军游击队的不断壮大和活跃，引起了湖南、广东、江西三省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迅速集结三个师，又纠合游击根据地周围十多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以数十倍于游击队的优势兵力，分别向各个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和“会剿”。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和“会剿”，各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与敌人作斗争。敌人大规模进攻，游击队就化整为零，编成十几人至三四十人一个个小分队，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开展隐蔽的游击斗争。

红军游击队分为8个区开展游击斗争后，任雄余仁崇边游击工作团主任的刘建华，与徐赤民一起带领一支四五十人的

游击队，到南雄、大余、仁化、崇义四县交界山区开辟游击区，进行游击斗争。与此同时，红军独立四团、第五团进入罗霄山脉南端诸广山的崇义、仁化、桂东、汝城一带开展游击斗争。活动在仁化闻韶、扶溪、长江、城口一带的红军游击队，不断打击敌人，还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支持，筹措食盐、药品等物资。同时，还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号召民众参加游击斗争。在闻韶圩，经过红军游击队员的宣传发动，一些青年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粤赣边的油山，是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心地域，而粤北始兴北山又与油山相连，因此始兴又成了赣粤边游击区的范围。大余长岭会议决定分兵游击时所建立的三条秘密交通线，始兴北面与南雄交界处，就纳入其中。1937年6月，“三南”游击支队在始兴澄江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中共赣粤湘特委和赣粤湘边游击支队成立后，始兴县就被确定为8个游击区范围。王赤、游世雄率领的游击队，由刘建华带领的工作团，曾在始兴开展游击斗争。1935年至1937年，始兴北山奇心洞与武岗村，先后有红军游击队进行游击活动，并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红军游击队还在当地开宣传工作，发动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

1935年12月，国民党军对湘南游击区进行“清剿”，使有较大发展的湘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遭到重大的损失。12月4日，率领赣粤湘边游击队主力，战斗在桂东以东包括崇义、上犹及桂东、汝城东部地区东边山的蔡会文，在率部突围中受伤被俘，壮烈牺牲。湘南游击区与赣粤边游击队的联系一度中

断。尽管如此，活跃在赣粤湘边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依然坚持开展游击斗争，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挺进皖南参加抗日战争。

三、红军游击队湘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一）中共湘粤边工委和游击队的重建

红军长征穿越湘粤边的1934年11月后，湘粤边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急烈的变化。为了消灭湘粤边的中共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国民党调集兵力对湘粤边进行疯狂围剿。12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将郴县、宜章列为“剿匪特别区”，重点“清剿”郴宜边境的湘南特委（原称湘粤边工委）机关、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并下令三个月内完成“清剿”任务。

湘南特委书记王涛随红军长征后，湘南特委书记由彭林昌接任。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特委机关迁往耒阳，郴县地区设办事处，谷子元等留在办事处工作。12月中下旬，敌人重兵“清剿”郴宜地区过程中，湘南特委书记彭林昌率领游击队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许多游击队员英勇牺牲。留在郴县和宜章山区养伤的近300多名红军战士几乎全部牺牲。特委书记彭林昌，后又因党内出现叛徒而被害，湘南特委遭到严重损失。随后，谷子元等得知郴宜办事处已遭到破坏，因与特委失去联系，便与李林、蒋玉林等秘密潜往粤北乐昌、乳源和湘南宜章一带进行地下活动。

1935年春，湘南特委和游击队部分负责人林长春、肖良

略、贺畔朵等人，突破重重包围，转移到乐昌境内竹岗山和加昌水口一带隐蔽下来，不久与谷子元、李林等人会合。此时，中共宜章、乐昌县委也遭受破坏。

同年5月，谷子元、李林、林长春、贺畔朵等人聚集散落在乐昌境内的20多位同志，在上坪赖家的一名共产党员家里开会，重建中共湘粤边工



中共湘粤边工委活动旧址

委，谷子元任工委书记，贺畔朵任组织委员，余稼生任宣传委员，林长春、肖良略为委员。肖良略牺牲后，李林替补为委员。工委机关先后设在饭塘寨头岭和大源泗公坑木炭窑。边工委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一、联系失散人员，收集枪枝，发展壮大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力量；二、开展统战工作和肃反斗争，首先捕杀叛徒；三、开辟新区；四、积极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该工委一直在湘粤边坚持斗争至1938年春。

在重建中共湘粤边工委的同时，恢复“中国工农红军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肖良略任大队长，林长春任政委。以粤北为基地，开展粤湘边游击斗争。随后，肖良略带领游击队在加昌水口打土豪时不幸牺牲。9月，曾被编入红军独立第四团的原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林，辗转来到乐昌坪石，与谷子元会合，湘粤边工委决定增补李林为工委委员，并调整游击队干

部，李林任大队长。当时遭受到严重破坏，化整为零的宜乐游击队部分队员，经过一番周折后，被编入李林领导的游击队。湘粤边工委和游击队的重建，成了粤湘边境国民党反动派的心头之患，敌人乘游击队力量还没有壮大之机，对游击队展开围剿，使刚刚组建起来的游击队屡遭损失。

1936年5月，中共湘南特委恢复，特委书记周里(又名周礼)了解到乐昌、宜章边境有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准备南下乐昌。1936年8月，游击队副队长蒋云先到湘南特委机关所在地四方山汇报工作。于是，周里随蒋云先从衡阳乘火车来到乐昌坪石。然后由蒋云先带路到湘粤边工委设在梅花马糍湖的通讯站，第二天由通讯站的交通员送周里等人进马头岭附近的大山，在大山里找到了贺畔朵。贺畔朵原是湘赣省委的监委书记，随红军长征到乐昌后留下七、八个同志在地方工作，留下的红军人员就剩存贺畔朵一个人了。他向周里汇报说，“在马头岭一带发展了几十名党员，组织了7个支部。”贺畔朵向周里汇报工作后，带周里到坪石皈塘，在坳丘找到了湘粤边工委负责人谷子元。此后，周里留在坪石工作，领导湘粤边区的党组织，开展游击武装斗争。

1936年秋，根据赤色游击队人少枪少的情况，周里决定把游击队改为武工队，由李林任队长。同时组织乐(昌)乳(源)宜(章)工作团，以乐昌、乳源、宜章为中心开展斗争。乐乳宜工作团基本替代了湘粤边工委的工作。

1937年春，谷子元调离乐宜边区后，湘粤边工委就自然消失了。乐乳宜工作团和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

织，发动群众，建立贫雇农团和农会，挑选青壮年组织不脱产的游击组，坚持开展武装斗争。

（二）湘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

红七十一团湘粤边开辟游击新区

1935年2月，赣南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工作人员分9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按照中央的部署，其中一路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奉命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从中央苏区的于都禾丰出发突围前往湘南，其任务是到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等失散队伍，并在湘粤边发展游击区。2月下旬，部队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和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特委会会后，留下两个连在北山，继续率队西进。3月中旬，龚楚率部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在那里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三十四师等红军长征失散队伍。

3月下旬，红七十一团经兰山县荆竹，进入连县黄洞山和天光山一带，利用湘粤敌人主力“围剿”中央苏区，只有民团留守地方的空隙，以连县天光山、黄洞山一带的崇山峻岭为中心，向湘粤桂边扩展，开辟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在连县、江华、兰山、临武、郴县边境进行游击战争。经过40多天的艰苦努力，分别在黄洞山和天光山建立了根据地，并在各险要隘口修筑了工事，严防来自不同方向敌人的进攻。

红七十一团在建设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农会、惩办土豪劣绅、出击湘境敌人。红七十一团进入连县后在各村寨开展了宣传工作，以“湘粤边区军区军事委员



农民协会旧址

会”名义发表文告，书写宣传标语，给群众讲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宣传土地革命。在各村召开座谈会，了解贫富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帮助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经过宣传发动工作，成立了天光山农民协会，由柳福胜、赵开保、李景郁等组成农会领导班子。红七十一团派出干部，帮助农会工作，并从部队经费中，拨出八个

光洋给农会，作开办经费。通过农会，把各村寨农民及土法造纸工人组织起来了。群众组织起来后，进行打土豪，在天光山扣押土豪赵石养，打开他的粮仓，将粮食分给群众。在板寮没收了豪绅李亚龙的粮食，宰了他家的猪牛。七十一团经常从黄洞山、天光山两块根据地派出小部队，前往兰山、临武边境频频骚扰敌人据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仅3月底至4月下旬，就出击敌人达八九次之多。

3月31日上午，红七十一团400多人，300余支枪，从黄洞山直奔蓝山草鞋坪，袭击驻守该地的反动武装义勇队。敌人溃入碉堡，不敢轻举妄动。然后红七十一团奔袭大桥荆竹之

敌。与此同时，红七十一团从连县县竹坪派另一支部队挺进兰山小洞，骚扰敌人后方，牵制“进剿”荆竹之敌。4月6日，红七十一团又从黄洞山出发，奔袭兰山小目口敌人，烧毁



设在田心村的临时指挥部

敌人炮楼，缴获步枪7支。接着连续出击到大溪将土豪黄志刚捉获，并开仓济贫。4月17日，又在兰山大麻军屯惩办了土豪谢连家。19日乘胜袭击浆洞民团。22日转道迂回黄洞山根据地。

4月24日，红七十一团400多人从黄洞山绕道临武麦下圩，进攻兰山田心铺守敌，毙伤敌人10多名，敌一个排被缴械，残敌溃逃兰山县城。

黄洞山、天光山纵横数百里，横跨湘粤三县，人烟稀少，山高林密。敌人屡遭袭击后，兰山县府连连向上请求援兵。尔后，湘敌保安二十团二营、二十一团补充李营和粤敌独三师一营，联合“进剿”。红七十一团在黄洞山、天光山加强防守，顽强抵抗，由团政治部主任李鸣凤率一支队伍进入天光山与临武交界的瓦窑冲，牵制敌人。

5月5日，红七十一团从天光山进逼黄茅，与敌两个营激战。受挫后，分兵三路撤退，300多人退回天光山，其余则分

散在黄茅一带袭击敌人。5月中旬，敌人南北夹击，“围剿”红七十一团。红七十一团撤出天光山、黄洞山根据地，向临武方向转移。当时，龚楚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以及中共苏区的丧失，红军的溃败，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认为自己在高山密林中也将“性命难保”。于是，他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投奔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叛变革命，成为了可耻的叛徒。龚楚叛变，红七十一团被敌人打散，部队遭到严重的损失。

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斗争

湘粤边工委和湘粤赤色游击大队重建后，很快在广东乳源、乐昌和湘南边界开展打土豪的游击斗争。游击大队长肖良略带领游击队，在乐昌竹岗山和乳源加昌山一带打土豪时不幸牺牲，由李林继任大队长。后来，游击大队被敌人几次“围剿”损失惨重。1936年秋，湘南特委派往乐昌坪石的周里，根据当时游击队人少枪少的情况，决定将游击队改为武工队，把今后革命斗争方式定为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武装斗争为主，由乐乳宜工作团和武工队在乐昌、宜章边界以乐昌坪石为中心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摧碉堡、打击反革命分子。

经过乐乳宜工作团和武工队的努力，乐乳宜边区的贫雇农团很快建立起来。贫雇农团建立后，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斗争。个别地主来收租，贫雇农团发动群众轰他走。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群众要求处决的，由武工队查明后枪毙。经过斗争，地主恶霸不敢再猖狂了。同时，形成了几小块群众武装割据的根据地。仅几个月的时间，武工队由几名成员发展成为60多人的游击队，组织了300多人不脱产的群众性游击组，参加

贫雇农团的有几千人。

坪石地处粤湘两省三县交界，活动范围大，加上群众拥护，因此，游击队以坪石为依托，经常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武装斗争，声东击西，昼伏夜出，攻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在坪石附近，游击队在群众的配合下，攻打敌人的碉堡。游击队晚上下山，游击组、贫雇农团就闻风而动，帮助游击队卡道口、断援兵，几百甚至上千人把碉堡围住，敌人只好举手投降。如坪石附近有一个五、六百人的村子，几个地主老财倚仗碉堡，作恶多端。游击队发动群众，做看守碉堡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向他们讲明政策：一个不杀，一个不抓，不要钱财，只缴武器。游击队攻打碉堡的那天，守堡的敌人果然自动投降，游击队缴获了10多枝枪。附近几个村庄的反动武装也受到震慑，自动向游击队投降。

在摧毁敌人碉堡的同时，游击队还发动群众打土豪。打土豪都是采取晚上行动，天一亮，游击队上山，群众各自归家，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参加打土豪的群众每次都有几百人，声势浩大。缴获的粮食物资分给打土豪的群众，没收地主的钱财抽百分之五分给贫雇农团，其余作为游击队的生活费用。

游击队在对敌斗争中讲究策略，运用统战工作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瓦解敌人。游击队不侵犯小商小贩的利益，在农村打土豪时，只是针对民愤很大的地主恶霸，使群众感受到游击队不是敌人诬蔑的“土匪”，而是为民除害的“良军”，因而群众纷纷支持游击队。

坪石赖金洋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老百姓对他恨之人骨。一天，游击队10多人，乘他娶儿媳大办酒席之际，伪装成客人，身藏短枪前去“贺喜”。宴席上，当他举杯敬谢宾客时，游击队迅速地将他逮住，并拿出早已拟好的布告，当众数列他的罪恶，将其镇压。游击队杀了这个恶霸地主，但不连及他的亲属子女，不拿他家的分文财产，影响很好。群众都说：“游击队为民除害，只办首恶。”杀一儆百，其他地主也就不敢为非作歹了。游击队到清洞乡捉拿国民党清洞乡乡长廖介操时，廖不在家，游击队留下字条，令其交马1匹、驳壳枪1支、子弹200发，银元1000块，送到西山桥凉亭交给游击队。廖介操慑于游击队的威严，不敢违抗，按期如数缴交。

经过一年多时间，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共有100多人。游击队在坪石一带活动频繁，敌人异常恐惧，连续几次召开乐、乳、宜三县联防会议，研究防范措施，部署行动，进行清剿。但游击队依然一直坚持开展游击斗争，直至抗日战争暴发，北上参加抗日战争。

四、红军游击队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后，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阴谋，开始了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先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队下山，在项英、陈毅等的直接指挥下，在江西大余池江等地集中改编。随即，改编后的新四军，从池江等地出发，挺进皖南抗日前线。

（一）粤赣湘边国共合作抗日新局面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接着，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叶剑英，在西安与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并向南京政府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紧接着向全国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武装卫国”，进行全民族抗战。

同年7月11日，在全国抗战形势逼迫下，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不得不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队的进攻，撤离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军事“清剿”。

中国共产党努力倡导国共合作和全民族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高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表示愿意停止内战，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也随即对人民革命做出了战略转移，即以阶级斗争为主转为民族存亡斗争为主，停止土革命和苏维埃运动，与国民党合作，调动全国各族力量，一致抗日，并先后与国民党当局开始了谈判。

7月下旬，项英、陈毅从香港出版的进步杂志《新知识》中看到了中共中央发表的《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对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随后，陈毅就给国民党大余县长彭育英写信，要求驻扎在赣粤边的国民党军队停止对雄、余边等地的“清剿”，合作抗日；项英则以个人名义，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在党内、游

击队和群众中宣传。文章还提出了合作必须坚持的原则：一是党的独立性保持；二是批评自由；三是领导权的争取。

7月22日，项英起草了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1）决定部队的独立性和领导的保持，可改番号，但须是独立的一个建制单位；（2）抗日运动与党的自由争得；（3）释放政治犯；（4）游击区的保甲制度实行改选；（5）不准向游击区人民追缴以前的租税和债务。

8月8日，中共中央分局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战》的“八八·宣言”。8月15日，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阐述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态度和抗日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指示游击队和民众停止对国民党军政和土豪劣绅的进攻；提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将上述内容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区专员王有兰、驻赣南中央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和游击区周围的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同时派出武装宣传队，以“江西抗日义勇军”名义，深入游击区内外村庄、交通要道、圩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8月下旬，为了尽快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南雄县委书记袁达郊下山到南雄的东里圩，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唐营长洽谈未果。经过斗争，国民党大余县长彭育英，于8月27日亲书“感秘代电”专函，派专人送入梅山游击区，转给赣粤边特委，希望红军游击队派员前往洽谈国共合作事宜。

9月3日，陈毅“快邮代电”复函送到彭育英手中，彭马上回信陈毅，约定与红军游击队在南雄钟鼓岩会谈。



钟鼓岩谈判旧址

9月6日，彭育英和陈毅的随同人

员来到钟鼓岩进行谈判，确定了下次谈判的时间、地点和有关会谈事项。这次谈判，开启了南方红军游击改编正式谈判的大门，为新四军的建立打下了重要基础。

9月8日，国民党大余县政府派鲁炯雯为代表，游击队由陈毅为代表，在大余池江区公署举行谈判。由于有前几天陈、彭的书信往来和亲自晤面，彼此比较了解，因此，谈判顺利，最后双方达成了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为抗日义勇军等国共合作抗日七条协议。9月12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

9月20日，项英在赣州与国民党当局正式签定赣州谈判协议。9月下旬，项英到南昌与国民党省政府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并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的协议。

随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粤湘边国共合作抗

日的新局面也于1938年初形成。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遣曾担任湘南特委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涛回到湘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王涛到广东乐昌县坪石牛栏冲，找到周礼、李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的指示精神。在王涛的主持下，研究了下一步工作方案，决定王涛回郴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其他干部暂留坪石坳上，集合游击队原地待命。王涛回到郴州后，以新四军中校秘书的身份，先后与郴州国民党当局专员黄少谷等，以及宜章、郴县、乐昌等国民党县政府官员谈判，详尽阐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日、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和重要意义。经过严正交涉，达成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以及红军游击队下山整训、开赴抗日前线、整训期间由国民党政府供给给养的协议，从而为粤湘边红军游击队顺利下山并完成整编创造了条件。

（二）红军游击队改编整训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12日，赣州谈判后，赣粤边特委副书记杨尚奎前往南雄北山，通知中共南雄县委将游击队分点集中集训。县委把北山游击队集中到珠玑中洞村开始训练，又发动群众筹集了大米等物资一批；送到下洞村，为游击队所用。县委动员一批青年如冯明山、叶天才等加入游击队，使北山游击队从原来的80多人发展到120多人。

1937年9月底，项英在南昌与国民党达成谈判协议，并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游

击队立即集中，改编抗日武装。

10月1日，项英和缪敏、贺怡从南昌返回大余池江。随后，项英、陈毅立即在池江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会议决定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去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指示，通知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因与许多游击队长期失去联系，为慎重起见，陈毅、杨尚奎等决定亲自前往。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杨尚奎去兴国，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刘建华）去寻乌，罗绍增去湘南。同时，为便于联络，赣粤边特委在池江的公园里设立了办事处，由杨尚奎兼任办事处主任。

11月间，北山游击队和油山游击队同时开到江西大余的圪里、板棚下集中训练，改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自“西安事变”后，特委为了寻找三南红军游击队（包括南雄南山及江西虔南、龙南红军游击队），项英、陈毅于11月5日派陈丕显（化名陈春芬）会同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秘书鲁炯雯到南雄县政府联系。陈丕显与国民党南雄县长曾绳点进行谈判，达成了停止剿共和制止破坏国共合作的协议。南雄县政府还给陈丕显通行证，再由中共南雄县委派南山区委书记肖星鹏和交通员同陈丕显前往南雄南山和江西的全南、龙南、定南等地，几经波折，才在全南县陂头乡杨梅石找到了三南游击队。经过努力，到12月，三南游击队才由罗世珍、张日清带领到达大余县池江集中，进行整训。



红军游击队池江改编司令部旧址—弓里黄屋祠堂

1938年1月下旬，项英从延安回来之后，立即在池江板棚下河坝里召开大会，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宣布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政委，部队即日起开赴抗日前线。赣粤边、湘鄂赣、湘赣边、湘粤赣、皖赣边等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支队司令员，刘然任支队政治委员，胡忠毅任支队参谋长。在大余池江集中整训的赣粤湘边红军游击队700多人，被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第三营；原南雄的北山游击队、油山游击队和南雄游击队分别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的第四、第五、第六连。

2月15日，在陈毅的亲自率领下，新四军第一支队的一部分离开池江，开往华中抗日前线。从此，这支抗日劲旅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8年2月初，分散在宜章、乐昌、乳源山区活动的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队员接到改编命令后，赶到广东乐昌县坪石坳上集中，由李林率领，从乐昌县的牛栏冲进入宜章，经白石渡、太平里到郴县良田，游击队在良田作短暂休整，并进行了扩编，队伍发展到了近100人。2月下旬，游击队离开良田进入宜章，到达赤石三望坪断续整训。整训一个月时间里，游击队发展到130多人，队伍改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李林任大队长，下编三个分队。

4月初，根据上级指示，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从赤石出发，向耒阳挺进，在那里改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并与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改编成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随后，离开耒阳，乘火车北上株州转浙江金华开赴安徽太平。这支部队后来被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李林任副营长，特务营中，有数十名为乐昌籍的游击战士。队伍在太平整训后，开赴抗日前线，转战在皖南一带，为抗日救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整装待发，准备挺进皖南的新四军一部

附 录

大事记

1927年

11月中旬 南昌起义军余部第十二支队10人，从江西上堡前往广东仁化县董塘与地方中共地下党员和农军负责人取得联系，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当前的斗争形势，恢复中共仁化支部干事会和区农民协会。

11月26至28日 粤北部分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朱德在湘汝城召开的部署湘南、粤北武装起义的会议。

12月9日 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近千人，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的番号，随范部移防粤北进入仁化城口，沿途宣传革命，动员群众，展开打土豪劣绅的斗争。

11月10日 起义军余部到达仁化董塘，当晚与当地党组织、区农会和农军负责人召开会议，决定起义军余部部分兵力与当地农军联合，乘夜出发袭击董塘附近村庄，逮捕土豪劣绅30余人，并将其押往董塘。

11月11日 起义军余部在董塘禾坪岗召开群众大会，公

审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会上宣传土地革命，动员和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

同日 朱德奉中共北江暴动委员会转告的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率部离开仁化南下前往参加广州起义。

12月13日 朱德率部到达曲江的韶州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南下广州时，得知广州起义提前进行并已失败，随后便与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往韶关的几十名起义人员一起，利用与范石生的关系，驻扎在曲江城郊东、西河坝，设法与地方党组织和农军组织取得联系，开展革命宣传和农运工作。

12月19日 起义军余部移驻曲江城北犁铺头圩。随后，开展练兵运动，总结中国武装斗争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28字的游击新战术。

12月20日 中共广东省委为便于领导北江各县农暴，决定成立中共北江特委。尔后，朱德与北江特委取得联系，并成为北江特委委员之一，北江特委派龚楚到起义军余部工作。

12月21日 中共中央给朱德及全体官兵发出指示信，要求朱德率领部队从范石生的部队分化出来，立即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12月22、28日 朱德在犁铺头先后两次派出兵力支援曲江西水农民暴动。

12月27日 中共中央给朱德及全军官兵发出指示信。信中变更了前一封信的计划，提出朱德率部队脱离范石生后，应

联络北江农军在北江地区开展农民暴动，并要求朱德与广东省委接洽，受北江特委的指导。

12月下旬 朱德在犁铺头会见从井冈山奉毛泽东之命探听南昌起义部队下落的何长工。朱德详细地询问有关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地区的情况，并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次日，何长工临别前，朱德对他说：我们这两支部队要经常联系，将来部队力量要集中。

1928年

1月3日 朱德与范石生合作之事暴露，朱德、陈毅根据党的指示，脱离范石生部，以“野外演习”名义，率部撤离曲江东去仁化，南下英德、清远一带开展农民暴动。

1月4日 起义军余部到达仁化与曲江交界处周田受阻，返回仁化董塘。当晚，召开起义军和地方党组织和农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农军和群众攻打县城。次日，起义军余部会同地方农军、群众500多人攻打仁化县城，随后，将仁化农军改编为（仁化）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并留下藤铁生等八名起义军军事人员充实团的军事力量。随即，起义军余部离开仁化董塘，西进乐昌，向乳源与湘南宜章边境挺进。

1月7日晚 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李光中、杨子达、胡少海在杨家寨文奎楼，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今后的军事行动，决定进入湘南宜章进行暴动。

1月8日 朱德率部离开杨家寨前往梅花圩，住在孔圣会馆，与宜章党组织负责人和部分赤卫队取得联系，听取宜章敌情的汇报后，决定起义军余部进驻宜章莽山，进行休整和宜章暴动的具体组织安排。

1月11日 出身宜章富豪家庭的胡少海，按照朱德智取宜章的计划，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旗号，以副团长身份和回家乡“协助地方维持治安”的名义，带领先头部队进入宜章城，告知宜章县长明日“王楷团长”率部入城，并向县长提出宴请王团长的意见。

1月12日 朱德、陈毅率部队从粟源堡出发，向宜章进发进入县城。下午4时许，县长杨孝斌在县参议会二楼设宴，为一四〇团“接风洗尘”。朱德、胡少海带领10多名干练卫士前往赴宴，把参加宴席的20多名宜章反动的上层人物，全部俘虏。与此同时，陈毅、王尔琢指挥部队也解除了县城的挨户团、保安队和警察局的武装。接着，部队攻破监狱，打开粮仓。至此，宜章暴动成功，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1月13日 朱德应乐昌农军的请求，派出一个营配合乐昌农军，攻打盘踞坪石的胡凤璋匪部。

2月1日 朱德率工农革命军从宜章出发，在宜章南至坪石，在宜章和乐昌农军配合下，攻打企图消灭朱德部队的许克祥部五个团，取得胜利，史称“坪石大捷”。当晚，在坪石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尽快挥师北上、发动湘南总起义计划。次日，率部离开坪石，前往皈塘召开联席会议和坪石战斗祝捷大会，成立工农革命军乐昌独立营，然后向湘南进军。

2月10日 朱德派工农革命军一个团与乐昌农军配合，再次攻打坪石胡风璋匪部，随即率部返回宜章，继续组织湘南起义。

1929年

1月24日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为冲破敌军对井冈山的包围，解决经济困难，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在大余与敌军激战后，为保存实力，朱德与毛泽东各率一支队伍，向南雄县油山方向转移，分别经广停坑、上兰田、下兰田到达寨下村和上、下杨梅以及邓坊、大塘宿营。

1月25日 朱德率部占领白石经后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会合，在乌迳黄木岭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参加土地革命。

1月26日晚 毛泽东、朱德获悉南雄县委提供的敌军拟趁红四军困乏酣睡之时进行袭击的情报，即令部队秘密撤出，经官门楼、界址向江西信丰进发。离开乌迳时，朱德吩咐部队送给中共南雄县委10支五响步枪和几百发子弹。

5月 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在湘南临武县大塘庵成立，尹子韶任书记。9月，与乐（昌）乳（源）宜（章）边工委，成立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尹子韶任书记。

5月20日至28日 彭德怀、滕代远按照中共湘赣特委关于向外发展扩大苏区，从发展求得恢复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率红五军主力1000余人离开井冈山游击湘南后进入粤北，占领仁

化北部地区，在地方党组织和民众配合下，开展革命宣传等活动，筹集了一批物资和现款。

5月26日 中共广东省委就本年初红四军游击粤北南雄等地，专门给毛泽东、朱德去信，认为红四军游击赣粤边组织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力量的做法是对的。

6月1至5日 红五军占领南雄县城，在南雄县委配合下，成立南雄县革命委员会，进行革命宣传，破狱释放“政治犯”，筹措现款、药品、布匹、食盐等物资一批，并加工被服1000多套。

12月25日 中共广东省委致信红七军前委，传达中央指示红七军“发展的方向，毫无疑义的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30年

3月27、28日 毛泽东在大余先后召开南雄、信丰、南康三县负责人和大余、南雄等6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后，红四军将100多支枪分发给南雄、信丰、南康游击队。

4月1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江西大余出发，越大余岭向广东南雄进军。途中，在赣粤边境梅岭关新路口和南雄珠玑石子岭指挥部队与不期而遇的粤军一个团作战，歼敌两个营，俘虏数百人，继而率部乘胜追击，当天攻克粤北重镇

南雄。

4月2日至6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在南雄县城几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宣布实施红军对俘虏的制度和办法；筹措给养，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新的筹款政策；制定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决定利用金汉鼎部发生兵变之机，红四军逐渐移师江西信丰，准备再入于都与第三纵队会合，并集合红六军第二纵队一同入广东东江。如不能入于都，则仍照计划到安远、寻乌工作一段时间，把寻乌红色区域扩大到安远，使与于都相连接。

4月3日 负责领导赣南西河地区（含广东南雄县）革命斗争的中共西河行委成立，中共南雄县委书记彭显模当选为中共西河行委常委。

4月7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和南雄游击队主力，由南雄回师江西，向信丰进军。

4月12日 南雄游击队与大余、信丰、南康等县游击队合编成立赣南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南雄游击队编为该纵队第四大队。同年8月，南雄游击队随二十六纵队一起，编入由陈毅任军长的红军第二十二军。

4月20日 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再次指出：红七军发展的路线，应从速集中力量，经过柳州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北江、西江发展。

10月7日 红七军从右江平马北上来到河池，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作政治报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给红七军的指

令。大会决定红七军的任务是攻打柳州、桂林、广州。这次党代会，是在“立三路线”指引下召开的，做出了攻打城市的错误决策，并用强制的办法打击不同意见，给红七军带来了重大的危害。

1931年

1月 南雄、信丰、大余、南唐四县游击队合编为北江红军独立团，团长谢泰谦（南雄人），政委彭显模（南雄县委书记）。

1月2日 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关帝庙召开会议，总结两个月北征的沉重教训，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前委一至“决议目前不可再战，应有短期时间之休息，并决议经湘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系”。具体行动方针是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冒险计划，挥师沿湘粤边发展，以期建立粤北根据地并相机会师朱毛红军。

1月17日 红七军小部队200余人，离开广西贵县桂岭，经鹰扬关进入广东连山县上草村，然后经历里坪、白石关挺进湖南江华码市与红七军大部队会合。

1月19日 红七军3500余人，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龚鹤村的率领下，从江华码市到达连县东陂圩。在此，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绕过连县县城，迅速赶到北江的乳源、乐昌和湘南宜章一带开展工作。

1月20日 红七军从连县东陂圩前往星子圩试图北上受阻，于次日按照前委的决定开抵连县县城外围的城南商业区，进行革命宣传、筹措给养、疗治伤员等活动。

1月23日 红七军正准备入连县城内开展活动，反动民团开枪向南门的红军射击，并放大火烧毁商业区，红七军前委以群众利益为重，立即停止攻城，组织军民经一昼夜的奋战，将大火扑灭。

1月26日至27日 红七军撤离连县县城到达西江圩，先后两次召开前委会议。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撤出西江圩经星子北上湘粤边的乳源梅花地区创建粤北根据地。

1月30日 红七军离开星子北上，在连县与宜章边界击溃反动民团和湘军，并与中共湘粤工委取得了联系。随后，红七军在地方党组织人员的引导下，向乳源县梅花圩挺进。

2月1日 红七军抵达梅花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并着手开展建立粤北根据地工作，中共湘粤边工委宣传部长谷子元前来协助工作。

2月2日至3日 粤军和湘军四个团向梅花圩进犯，红七军与敌军展开长达5个多小时的血战，共毙伤敌军1000左右，红七军损失异常严重，伤亡700余人，干部伤亡约占三分之二。

2月4日 红七军从梅花圩撤出到达大坪梅家寨，立即召开前委会议，鉴于梅花圩失利无法立足建立根据地，决定部队东渡武江河，挺进湘赣边，寻找苏区休整，相机会合朱毛红军。临行前，委托湘粤边工委安置红军伤员300余人。

2月5日 红七军到达乳源县杨溪与乐昌县长来之间的

武江河边。红七军渡武江河时，遭敌阻击，将红七军分为两半：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部分渡过了武江河，经乐昌向仁化进军；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大部、特务连和后勤部队未能过河。

2月6日至8日 渡过武江河后的红七军一部，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下，经乐昌进入仁化石塘、城口、长江圩后，进入赣南苏区开展游击活动。

2月6日至9日 未能渡过武江河的红七军一部在张云逸的率领下返回乳源梅花大坪，然后辗转到乐昌罗家渡过武江河，经湘南宜章、资兴、汝城等地，进入赣南苏区开展游击活动。4月初，红七军两部在遂州胜利会师。

春 湘粤边工委改称湘南特委，宜、郴、乐、乳四县边境活动的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湘南游击队。8月，湘南游击队更名为湘南赤色游击队，同时组织湘粤边赤色游击大队。

6月 粤赣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共南雄县委书记彭显模被任命为粤赣边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

1932年

3月9日 南雄县党员代表大会在油山召开，选举在红四军第十一师工作并被派回南雄的南雄籍红军叶修林当选为县委书记。

4月25日 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三军团直属队和第五军第二师、独立三师共5000余人，由崇义县聂都出发，经竹洞进入

塘洞，前锋于12时与镇守长江墟的国民党粤军独立第二旅杜凤飞团第一营第一、二连和增援的第二营第七连交战，战至晚6时，占领长江圩，歼敌100余人，缴枪200多支。红三军团直属队住在广州会馆。

4月26日 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二师由长江出发，经斜周，占领扶溪。

4月27日 红三军团独立三师一部由长江出发，经济松、坳背、半山、半奢水，于12时占领城口圩。同时，红三军团第二师由扶溪出发，经双合水、罗洞，出寒婆坳、水东，占领恩村一带。

4月28日 红三军团第二师一部由恩村出发，经厚坑、塘村，开进赤石迳，佯攻董塘，包围仁化城。

4月29日 自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二师和独立三师占领长江、扶溪、城口等地后，国民党粤军4个团调来堵截。是日粤军警卫旅陈汉光部两个团到达董塘；第二独立旅陈章部一个团，以及罗策群团到达仁化城。陈汉光到董塘督战。

5月1日 驻城口的红三军团第五军独立三师前锋向汝城进军。

5月3日 驻扶溪的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二师，分途向长江、城口开进。国民党粤军警卫旅陈汉光部第三团向赤石迳、塘村逼进。

5月5日 红三军团部直属队等撤出长江，开往城口，向汝城进军。

5月12日 彭德怀同滕代远向朱德、王稼祥报告：独立

一、八、九共三个师，月底可发展到500人，拟另成立一军。将来在主力红军向北开进时，该军即向湘南、粤北、赣南发展。

6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军事训令，要求红1、红5军团与河西的红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的粤敌，相机占领梅岭关，然后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和南昌，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6月8日 毛泽东、叶剑英在上杭官庄召开红1、红5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粤军作战的问题。

6月9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5省“剿共”会议，计划先集中兵力“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转兵“围剿”中央苏区。

6月21日 红一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准备进攻南雄，以调动入赣粤军回援，求于运动中歼灭之。为此，红1、红5军团和红3军团分别向信丰和大余地区开进。

6月23至24日 红一方面军总部两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建议在信丰、南雄地区同粤敌决战。苏区中央局复电同意。

6月25日 红3军团由上犹营前出发南下，27日到达崇义扬眉寺地区，准备配合红1、红5军团进攻粤军。

7月1日 红1、红5军团进至南雄乌径地区，红3军团进至大余东北地区。

7月2日 红3军团在大余城东北池江地区击溃由赣州向大余集中的粤军4个团。

7月3日 红1军团一部击溃粤军1个团，攻占梅岭关。

7月4至7日 红3军团对据守大余城及其附近高地的粤军7个团多次发动猛攻，均未成功。方面军总部决定以红3军团一部牵制大余之敌，集中主力准备消灭由南雄出击和由信丰进至乌径之敌。

7月8至10日 红一方面军对进至水口之敌发动强攻，击溃敌军10个团，南雄水口战役结束。此役，共击溃敌军15个团，毙伤敌近3000人。红军伤亡2000余人。

7月12至14日 红1、红3、红5军团和红12军、江西军区独立第3、第6师转移到粤赣边界的坪田圩、界址圩、铁石圩、固陂地区整顿补充，准备向北发展。

7月1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表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要求红军乘水口战役的胜利，继续与敌人决战，迅速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7月20日 红一方面军发布训令，批评在南雄、水口战役中，有的军团“误报大余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目标”，有的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致使方面军领导人“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指出这是“严重错误”。

1934年

春 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在团长李宗保、政委周汉杰率领下，前往湘南、粤北边境开辟根据地，辗转于桂阳、临武和乐昌、边县一带。

4月2日 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与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在湘南宜章与乐昌边界会合，湘粤边赤色游击队编入独立四团为第一营。

6月 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赣粤边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成立了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为李乐天。

上旬 红六军团西征强渡湘江时，左翼某部约300余人，迂回进入广东连县的山河、田家和洛阳乡三区，沿湘粤边向广西方向进军。

10月23日 中央红军全部西征渡过江西信丰河（桃江），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一道防线，朱德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首长：“野战军于渡过信丰后，除八军团于南康、大余间西进外，其余均于大余、南雄之间西进，对安息、信丰之敌只留监视部队。”

10月25日 10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罗炳辉、蔡树藩，指示所辖各军团于25日下午移动，一军团26日晨到达南雄乌迳东南地域。11时，朱德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一、二纵队首长，对中央红军西进赣粤湘边境，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作出部署：野战军从25日晚继续向西前进。第一阶段前出到大余、南雄地域，主力则于大余、南雄之间通过，第二阶段前出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继占领汝城。

10月26日 红一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西进计划，经信丰万隆进入南雄的界址、乌迳一带，军团直属侦察连在乌迳新田击败粤军一个连，成为红军西征入粤第一仗。同日13时半，朱

德致电林彪、聂荣臻等将26日野战军向西进命令变更为：“野战军改向北转……在大余、崇义之间西上。”

10月27日 朱德在油山就红军重伤员战士送油山游击区问题，致电红一、红九军团军团首长：须抬的重伤员战士，10日内不好者，可分头送油山游击区，与当地党及政权机关交涉，妥为安置，每名并发给休养费8元，留治好后，可即在该地加强与发展游击战争。红军遵照朱德的命令，在油山开展宣传工作，并留下一批工作人员和200多名红军伤员。

10月29日 7时，为部署红军军事行动，朱德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一、二纵队首长，指出：“为取得先机之利，野战军于十一月一日应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并通过湘敌由沙田到城口在战略上的第一道纵的封锁线。”指示各军团前进路线及任务：三军团有占领汝城的任务，并于暖水、大坪间打开自己前进道路；一军团须消灭从南面进攻之敌，于大坪、城口之间打开前进道路；八军团掩护野战军左翼，于一军团左纵队后跟进；五军团有掩护野战军后方的任务，在军委一、二纵队后跟进。

11月1日 10时半，朱德致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第二纵队首长，部署进攻汝城、城口，以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指出：“迅速过湖南边境之第一道战略上的封锁线，对于以后部队行动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要求各兵团二日晚止；红八军团到达樟溪、豪头圩地域；红三军团之两纵队接近汝城，准备于3日晨进攻汝城；红一军团右纵队占领大坪，左纵队占领城口；红九军团进到朱洞、唐铺及里洞的地

域，军委第一纵队进到文英地域；第二纵队到达井塘、老虎塘及聂都以北地区；红五军团右纵队进到关田地域、左纵队进到沙溪地域，掩护军委两个纵队。

11月2日 晚，红一军团一部以奇袭攻占城口，并在此实行临时休整。

11月4日 4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基本同意红一军团3日20时来电关于巩固城口，掩护红三军团向城口、大坪之线前进的部署。指出：“城口应顽强地保持于我们手中，并向南北两面扩张，以便在三军团的地段内，确实能争取两条前进的道路，并侦察有无补充道路，迅速电告。”13时半，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军委预拟于城口、高排之间，并从五号或六号晚通过封锁线。”并对具体行动做了部署。至八日晨，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11月7日 中革委决定，从宜章南北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16时，朱德致电林彪、彭德怀、杨尚昆，对“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做出部署。“估计通过乐昌、坪石间河道的困难，应占领九峰并确实钳制乐昌之敌，以保证野战军通过封锁线。在万不得已时，则钳制九峰之敌而绕过之。”指出：“一军团有消灭九峰及钳制乐昌之敌的任务”，要求三军团八日晨进至里田、界牌岭地域，如必要时应派出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协助一军团进攻九峰之敌。还规定了其他部队的前进位置。

同日 朱德与毛泽东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的传

单，号召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动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到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1月8日 15时和18时，朱德分别急电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先通报敌情：湘敌六十二师之一部企图由汝城经大坪、文明司向我追击，在九峰、乐昌有粤敌两个师。并告：军委决定三军团于良田、宜章（均含）间突破封锁线，其先头师约于10日可前出到宜章地域。一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速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在三军团后跟进，九军团则于一军团后跟进。并作出具体部署。

同日 林彪不顾大局，企图率部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19时半，朱德鉴于红一军团18时来电请示：“我军左纵队已不能经九峰、乐昌间西进而应改自九峰以北西进”，复电一军团首长：“依你们来电看，一军团主力的部署仅在九峰东南及以南地域，这使军委一、二纵队受着九峰之敌的威胁”，“一军团有防止九峰之敌向砖头坳前进之任务，因此，一师应派出一部控制九峰通砖头坳的大路”。接此电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才下决定并电告司令部：“我们明日率一师经大王山及砖头坳以东向九峰以北转进。”并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

11月9日 1时，朱德急电彭德怀、杨尚昆：“一、九军团不能于九峰、乐昌之间通过，并将转移到九峰之东北，而砖

头坳已到粤敌之一部。”“三军团应利用湘敌正式军队未赶到前的时机，同时占领宜章及两路司。为达此目的，应使用第五师及第六师之主力。”此外，还须派出一团兵力迅速占领唐村、白鄞并相继占领向坪石街，并保持在我手中，直至一军团到达为止。

同日 2时，朱德急电林彪、聂荣臻，“变更一、九军团之任务”为：“一军团（缺十五师）以强行军前出到九峰的东北，有如下任务：（一）无论如何不得让敌人进到九峰以东及以北地域，为得如此，必须确实占领砖头坳山地。如不得占领砖头坳时，则至少以一个师掩护砖头坳、延寿圩间的道路。

（二）至迟十日，一军团应前出至延寿圩、三界圩至里田之小道，并到达三界圩、中塘地域。以便能从十号经赤石、塘村前进到宜章以南之坪石地域，执行基本的任务。”九军团及第十五师“九日由麻坑圩转向石洞地域，十日则随一军团后进，经九峰东北进至三界圩、中塘地区。”

11月10日 2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告以三军团九日开始进攻良田、樟桥市地带，并占领良田南端及樟桥市。10日，五师续攻良田北端及万会桥，六师向宜章攻击前进，四师可抵两湾洞地域。指出“为争回已失去战术的时机，一、九军团十日及十一日应经三界圩、中塘、里田至赤石司，以便以后能前出于三军团左翼以前指定之宜章以南地区。”并告：军委第一纵队十日留文明司附近。

同日 10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批评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

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

同日 20时，朱德致电周昆、黄甦，告以：我第五师已占良田，三军团全部正向良田、宜章之线前进。十一日，一师进至白石，军委一纵队进至赤石司，其他各兵团进至里田、延寿圩地域。批示“八军团有开到良田地域、迟滞敌十五师由郴州向我堵击的任务”，并作出具体部署。

同日 21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因一、九军团不得已情况下转经延寿圩西进，以致通过封锁线的时间延长数日。”“三军团的任务是保证野战军全部通过封锁线。”为此，“三军团主要的力量应用在宜章方向，必要则将炮兵及四师之一部使用在宜章方向。”要求三军团应在政治上及部队指挥上帮助八军团。并告：军委第一纵队十一日晚进到赤石司或平和地域。

同日 21时，朱德致电罗迈、邓发，令军委第二纵队明十一日在原驻地休息一日，“利用一天时间，依军委决定迅速将减少的三百担资材毁弃与分散完毕，以便完全解放教导师运输任务，并准备十二日继续西进。”

11月11日 拂晓，红三军团第六师占领宜章城，至此，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三道封锁线。二十三时，中革委急电各兵团首长：“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郴（县）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11月12日 22时，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李聚奎（第一师师长）、赖传珠（第一师政委）、陈光

(第二师师长)、刘亚楼(第二师政委)、彭绍辉(第十五师师长)、萧华(第十五师政委)、周昆、黄甦并告董振堂、李卓然：“明十三日，我野战军开始通过万会桥、宜章之线西进，以掩护野战军西进及一、九军团集中。军委一纵队西进至黄茅，二纵队至廖家湾、鷓嘴坪、鱼圆坊，五军团拟令进至轩田或仍留原地。”

11月13日 24时，朱德急电彭德怀、杨尚昆、周昆、黄甦：“我野战军于十五日内始可全部通过封锁线。”“三军团(欠六师)至十五日止，有扼阻郴州及东面之敌的任务，派出得力掩护队抗击东面之敌，对郴州方向之敌则进行运动防御直到黄泥坳为止，以保证两条西进道路于我们的手中。”

11月中下旬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红一、红九军团部分队伍，从湘南南下进入连县天光山地区，与敌人激战数次后，往蓝山、江华方向转移，追赶长征大部队。

12月初 鉴于中央苏区大部分丧失，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势在必行，为了加强和统一赣粤边游击区的领导，中央分局指示中共赣南省委，在于都县小溪成立了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别委员会，李乐天、杨尚奎、王龙光、刘新潮(刘建华)、李国兴为特委委员，李乐天任特委书记，杨尚奎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龙光任组织部长，刘新潮任少共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信康赣雄军分区，由李乐天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向湘林(后叛变)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

12月中旬 担负红军长征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

师，在掩护红军抢渡湘江战斗中牺牲惨重，退回湘南时又遭重挫。剩下的约100人，在梅海如团长的带领下，由蓝山荆竹地区进入连县黄洞山、天光山山区开展游击斗争。后又转入湘南临武地等。

12月下旬 李乐天、杨尚奎率领新组建的信康赣雄特委、军分区机关和一个营共700余人，携带步枪、机枪300余支，从于都小溪出发，突围经赣县、南康到达信丰、大余、南雄三县交界的赣粤边油山地区。

1935年

1月 李乐天率部经信丰上乐村到达南雄油山廖地村，与信康赣雄县委书记刘符节和曾彪率领的油山游击队会合。根据斗争需要，在廖地村将中共信康赣雄特委改名为中共赣粤边特委。从此，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赣粤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开始了长期的游击斗争。

2月中旬 中央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组织长征留守部队分九路突围，到苏区周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3月下旬 为收容长征后卫部队红三十四师的失散人员，并在当地发展游击斗争，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1000余人，从于都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到达粤北边境，进入湘南江华到达连县三水和天光山等地。随后，在湘粤桂边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5月，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在连、蓝、临县边界分散活动，转入湘南郴县的黄第

山一带时，遇到敌人南北夹击，重兵“围剿”，红七十一团被打散，受到严重损失，龚楚也随之叛变。

3月底 项英、陈毅率部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廖地村。

4月上旬 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少共县委书记陈丕显率部也辗转到达赣粤边，在油山廖地村，与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等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此时红军游击队共有1400余人。从此，赣粤边特委的游击斗争，在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

4月中旬 为了统一干部思想，使部队彻底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方式，积极主动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斗争新局面，项英、陈毅在南雄油山大岭下村和大余县河洞长岭相继召开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会后，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分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到各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5月 中共湘粤边工委在乳源县加昌水的马头岭重建，谷子元任工委书记。

9月 曾被编入红军独立第四团的原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林，辗转来到乐昌坪石，与谷子元会合。

10月中旬 龚楚于5月在湘南叛变后，为邀功请赏，是旬带领粤军30多人化装成红军，来到北山天井洞。20日上午，以开会为名，制造了“北山事件”，杀害中共军政干部及游击队员50余人。下午，又在叛徒何长林的带引下，闯到帽子峰，企图破坏中共赣粤边领导机关。红军游击队员识破了龚楚的阴

谋，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使项英、陈毅、李乐天等领导人安全转移。

11月初 为了粉碎敌人企图用移民并村手段割断游击队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阴谋，陈毅、项英等在信丰县谭坑塘坑召开中共南雄县委、信康赣县委负责人会议，决定指挥部领导人分散到各地直接领导和指挥斗争。

1936年

6月 发生“两广事变”。在大余、信丰、南雄等地“清剿”游击队的粤军突然撤走。陈毅和项英等正确地分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阀与两广的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并以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与此同时，又集中分散的游击队，打击反动的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壮大游击队。

秋 湘粤边赤色游击队改称为武装工作队，仍由李林任队长，以宜（章）乐（昌）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

9月 陈毅和项英召开赣粤边干部会议，根据当时两广事变已经解决，蒋军嫡系部队四十六师代替粤军向赣粤边发动新的“清剿”的形势，作出了重要的“九月决议”。指出：一、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快要到来，这一高潮主要的内容是抗日的民族革命的运动。二、蒋介石采用堡垒政策和组织民团义勇军来配合军队作长期的进攻，我们相信依靠群众基础和党

的正确领导，一定能够战胜敌人新的进攻。三、我们的总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开展抗日的统一战线，反对对日本的投降，全国联合一致抗日，实行对日的战争。我们要在这一总方针下，来进行统一战线与游击战争的配合，争取抗日高潮的迅速到来，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扩大游击区域。

11、12月间 陈毅在梅岭山上被敌四十六师围困20余日，苦虑不得脱身，写出“绝笔”——《梅岭三章》诗，表达献身革命的决心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12月12日 发生“西安事变”。陈毅和项英闻讯后，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陈毅在会上分析了形势，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指出，要对反动派消灭红军游击队、镇压人民抗日运动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积极作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1937年

春 敌人在赣粤边发动进攻，搞分区“清剿”、重点“清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陈毅、项英指挥下，采取避实就虚、避强击弱的战术，把大部分兵力转移到游击区外打击敌人。同时，利用当年春荒，发动白区群众，开展破仓救荒斗争，挫败了敌人的又一次进攻。

7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

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1日 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逼迫和连遭红军游击队的打击下，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不得不停止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

8月8日 陈毅和项英等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要求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红军游击队愿意与政府合作，一致抗日的宣言（称八八宣言）。

9月6日至24日 陈毅、项英分别于南雄、大余、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当局代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等协议。

11月至12月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到大余进行整训，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次年2月，江西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一支队，南雄游击队编为第二营，在支队长陈毅的率领下挺进抗日。4月初，湘粤边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后，也踏上皖南抗日的征途。

主要参考书目

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

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辑部编著：《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0.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附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1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14. 王新生著：《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1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1）、（2）、（3）、（4），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7.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9. 李新芝、谭晓萍主编：《朱德纪事——1886-197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0. 于俊道主编：《朱德实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

21. 肖思科：《共和国首任总司令朱德战传》，长城出版社2013年版。

22. 谢储生：《青年朱德》，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 罗英才：《青年陈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4.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25.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10），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27.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 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著：《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二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9. 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编：《驰骋南粤卷巨澜——朱德同志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0.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万里征途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

31. 韶关市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北江地方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32. 仁化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仁化县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33. 韶关市曲江区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曲江县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34. 中共南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南雄人民革命史》（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5. 中共乐昌市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乐昌地方史》，2000年版。

36.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赣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37. 中共崇义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崇义历史》第一卷（1926—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38. 中共大余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大余历史》第一卷（1926—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39. 中共信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信丰历史》第一卷（1924—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40. 中共郴州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 湖南省汝城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汝城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42. 中共宜章县委党史联络组、宜章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宜章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43. 费侃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4. 力平、余熙山、志咸：《红军长征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5.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46. 庄春贤编著：《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47. 郭军宁著：《朱德与范石生》，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48. 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北江农暴》1987年印

刷。

49. 韶关市政协文史委：《韶关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红军战斗在韶关）专辑，2007年印刷。

50. 《韶关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2011年印刷。

51. 中共曲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曲江党史参考资料》，1991年印刷。

52. 中共仁化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仁化党史研究资料选编》（1923—1949）1997年印刷。

53. 中共乐昌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乐昌党史参考资料》，1990年1月印刷。

54.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8、13、15、19、24、32、34。

55.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6.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57. 本书编委会编：《仁化暴动和苏区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58. 中共宾川县党史研究室编：《赵镕文集》，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9.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60.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韶关市史志办公室编：《广东省革命遗址通览·韶关市》（第16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61. 广西区党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编：《左右江革命根据

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62.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著：《百色起义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3. 英文骅著：《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4. 《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65.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著：《中共连山地方史》（1927—1978），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66. 中共连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连县地方史》（192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67. 仁化县史志办公室编著：《红军与仁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

68. 韶关市申苏申老区办公室编：《韶关革命历史文献资料汇稿》（1922—1949）上册，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

69. 韶关市申苏申老区办公室编著：《韶关革命历史图文集》（1919—1949），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

70. 庄春贤主编：《赣边边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71. 庄春贤主编：《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文献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72. 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工农红军在粤北》，1986年印。

73. 中共乐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乐昌革命志区历史图

片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2016年印。

74.中共连州市委宣传部编：《红色足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2006年印。

75.龚楚著：《我与红军》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

76.《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8年。

后 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军余部和红四军、红五军、红七军、红三军团、中央红军以及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曾先后分别转战和游击韶关的仁化、曲江、南雄、乐昌、乳源、连县等县。对此，有不少史书和回忆录以及相关地方的党史和方志均有记述，但并不全面和系统，甚至有错漏之处，特别是对其作用和意义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人长期在韶关市档案、党史和方志部门工作，对于上述南昌起义军余部和多支红军转战韶关的历史资料进行过收集整理和研究，并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2014年，我受聘在韶关市申报中央苏区和革命老区办公室工作，两年后，我又受聘参与“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陈大纲”编写工作。由于工作方面的便利，我进一步对工农红军在韶关活动的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我觉得工农红军在韶关的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建红四军、发展壮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工农红军在韶关的活动，对地方革命斗争的开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此，我在2016年开始撰写《工农红军在韶关》一书，试图较为完整、系统地记述工

农红军在韶关活动的历史，也为“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作有益的补充，并得到了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的立项批准。

在该书的立项和撰写过程中，得到韶关市委宣传部、韶关市社科联的大力支持；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科副科长戴利婕在资料收集上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书稿完成后，韶关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沈妙光主任给予审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虽几易其稿，但由于撰写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梁观福

2018年12月

